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6月30日第19期 总第22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29期

## 纪念顾准专辑

### 目录

#### 【编者按】

王晓林 顾准是谁？

#### 【序与跋】

王晓林 《顾准和他的时代》自序

王晓林 《顾准和他的时代》后记

#### 【书摘】

王晓林 了不起的流水账（选自《顾准和他的时代》第十八章第四节）

王晓林 贵州故事（选自《顾准和他的时代》尾声 第五节）

#### 【书评】

王三义 顾准是一面镜子——读王晓林《顾准和他的时代》

陈申申 中国越来越需要顾准

#### 【文摘】

赵园 非常年代人伦的变与常——顾准和他的儿女

钱理群 1969——1974：顾准的思考

一、读《新生日记》：

顾准的文革想象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计

二、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对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根本追问与反思

#### 【本刊声明】

【编者按】

## 顾准是谁？

本期主编 王晓林



(1915. 7. 1—1974. 12. 3)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西方学者毫无恶意却又略显唐突地问道：

“你们中国知识界在 1949 年以后究竟有没有哪怕稍微像点样子的人物？”

老学者李慎之先生慢慢站起来，坚定地回答：

“有，有一个，顾准！”

顾准是谁？遍问今天大学生，大概 100 个孩子中有 99 个不知道。可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如果一位大学生不知道“顾准”，几乎和不知道萨特、王小波、周国平一样丢脸。那时顾准的文字刚刚解禁，虽然被横砍竖割到能媲美“洁本”《金瓶梅》，且有一部分隐秘晦涩到不忍卒读，可一时间“顾书”横扫全国书展，洛阳纸贵，满城争说，盗版遍地（详见本期“贵州故事”）。

顾准，一个时代罕见的异类。这个时代离你我不远，却像极了遥远的欧洲中世纪。他不是布鲁诺，不曾为捍卫教义死在火刑柱上。他只是单枪匹马，舍命求法，如哥白尼一样喊出“可是地球确实是围绕太阳在转啊”！

他又像伽利略，面对宗教裁判所的严刑威胁，先保住生命，然后用教会命他写“忏悔书”的纸写下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

顾准的著述，直到他死后 20 年才横空出世，整个中国知识界被震得晕晕乎乎找不着北，大咖们连连抽气——“愧对顾准，愧对顾准”，“他为中国读书人保留了一点基本的体面”，

“历史格外青睐他”……

柴静，这位顾准死去时还没有出生的勇敢女孩，在2009年写下《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长文，以贝多芬最直逼人心的《命运》起始两小节之文字诠释作为题目，祭奠他死去35周年，此文至今还在她那一代人中传颂。而50后之我，拜1971年“9.13”一声“爆响”送来的“无主义主义”，如许多同代人一样，几十年不着“政治”一道，也因此直到2007年还不知“顾准”为何方神圣。

读罢顾准，惊为天人。顾准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不是高山仰止的山，是一座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顾准“何以如此”？顾准的故事“何以如是发生”？

不自量力，不可收拾地用去6年时间，我写出《顾准和他的时代》一书，给自己，给亲人和孩子们，并循着伏契克的、也是顾准的声音——“人，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去寻找人本应该具有的形象。

假如你还在读书，请今天就开始读顾准吧。需要说明的是，书是禁的，什么也不为，仅为“顾准”二字。

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在上海。今年是顾准诞辰103周年。本刊特出此专辑，隆重纪念这位思想界的民族英雄。凡希望读到《顾准和他的时代》（上下册）PDF版者，请与《记忆》老方（fangxcl1966@gmail.com）或我本人联系（donoevil@sina.com）。



稍晚，我们还会提供《顾准文存》（包括《日记》、《自述》、《笔记》、《文稿》）的PDF版。至于顾准至今还不能面世的文字，就用《基督山恩仇记》最后一句话来鼓舞我们自己吧——“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都蕴含在这四个字之中：‘等待’和‘希望’”。■



## 【序与跋】



作者简介：王晓林（1953-）。16岁插队，18岁做工人，20岁就读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进入交通部科学院，港电实验室工程师。深圳特区最早的建设者和从商者。中国最早的个人电脑与因特网的使用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捐赠和志愿者。2001年退休。著有《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顾准和他的时代》（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5年）。原《炎黄春秋》、《明报月刊》等刊物的常年撰稿人。

## 顾准和他的时代

### 自序

王晓林

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多年志愿者，我2007年下笔写作处女作《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在遍寻孙冶方经济思想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来源时，才第一次听到“顾准”二字。

时至二十一世纪才知道顾准已是落伍不堪，读过之后忽然发现文章竟是无法写下去了则更是难堪——写孙冶方绕不开顾准，中国老经济学人皆知，可对于我这个工科出身的人却是崭新题目。顾准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不是高山仰止的山，是一座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

开读顾准是在飞机上，那天空餐吃得不好——震惊之下几回掩卷呆坐，大脑一片空白，和青春少年时节读《九三年》，《双城记》情景相似。每逢至此必下意识翻到文章末页，一次次看清1972、1973的字样，才能接着读下去。那是何样的年份？我们那时在想什么、

做什么？我们的父一辈、祖一辈在想什么、做什么？用顾准作标准，可以很不敬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没有做——像顾准那样在血汗里、饥饿中和棍棒下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给中国留下一点非物质遗产，给中国人留下一点人的尊严，给中国读书人留下一点可怜的体面。还有最坏的，就是我们做了，做了无数侮辱同类也侮辱自己之举，却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文字令我流泪，读顾准是第一次。

学者朱学勤提出过一个很尖锐的疑问：“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即使顾准确是天才，他和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一样，成长过程大部分也是在“母体”内完成的。到他四十岁左右从“母体”中被排出，按照中国式逻辑，也是“被人误解”、“遭人陷害”，就像父辈们很多人身上发生过的故事一样，被殇情滥情的多，被分析推理的少，被逻辑思考的几乎没有。

汉民族是个最惧怕孤独的民族，百姓和读书人要的都是“摩肩接踵”的热闹，“十万人家”的扎堆，惧怕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苍凉，“羌笛杨柳”的孤独，许多人至死都不能明白“灵魂只能独行”这样一个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常识。顾准却是这个民族，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异类。

过于出众的他没有生逢一个崇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的民族和年代，恰恰相反，他生在一个好同恶异，最为推崇“齐斩斩”的民族和只允许“万众一心”加“万众一声”的年代，其“行”又过于突出，即使在眼下这个已经大大进步了的年代，这位很喜欢用“睥睨”二字的读书人被“摧之”、“湍之”和“非之”也几乎是难免的，时至今日还依然能听到人们对他“持才傲物”的评价。顾准的不幸在东方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那个汉民族的民族性中猥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地放大的年代。

顾准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多彩而辉煌到了夺目的地步。他的成功来得太早，这样的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方面往往很难平衡。抛开为人熟知的他的青少年时期神童般出类

拔萃的经历——中国会计学大师不谈，也不谈他1949年前自认为是职业革命家却被他后来的同志们所不屑的“业余革命家”历史，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一样，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仅仅止于税吏——他的党的税吏，之后就从大上海总税吏迅速幻化为劳改营的一员并险些成为饿殍。

和孙冶方一样，顾准也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俩有一个异于同时代大多数读书人的特点——都精通于一种非母语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俄语，而且两人都通晓日语，这就比别人少了一道桎梏的藩篱，多了一条探索的绳索。但是孙、顾两人又都是母体内的官员，和所有的中国读书人一样，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又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准，孙冶方这样的读书人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1952年，做大上海「总税吏」还不到三年的顾准，因为反对“全国采用民主评议方式征税”——这种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的“人治”方针，坚持所有企业都应依法、依率征税而被撤销职务。这个大知识分子在落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的屈辱境地后开始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他把这两门最容易让人掌握逻辑推理方法的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基础课一头扎了进去。不愧天才的称谓，未几他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不过很快他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一步就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广袤平原，从读史，研史开始，一步步向解史——以历史解读现实进发。

看顾准读史，研史，解史的过程，就像看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脑子里的酱糊一勺一勺生生挖出，倒掉，腾出一块清清爽爽的地盘来接纳真和善的过程，怎一个“美”字了得！读顾准，首先从美的角度上你就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美的文字、美的魂灵、美的人，美不胜收，而他对人性的追问又是其中最美的部分。

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你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而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辩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在罪恶面前十分警醒和桀骜并苦苦追问着人性的悲悯者。

自幼即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未及弱冠就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基督教“爱人”的氛围中，刚刚成年又任教于3所教会大学，无论从哪种角度讲，顾准都是一位很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并非出身基督教家庭，从现有资料看，也未“成为”过基督徒。他的文章每每提到基督徒还会调侃地将他们唤作“愚夫愚妇”。他也曾直白地宣称自己“不喜欢基督教”。但只要认真读过顾准，一定会留下强烈的印象就是他对基督教独特和深刻的理解。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轨迹都没有离开过对人性、人道、自然法则、自然权利——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追索和探寻。这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寻，探索，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人类大同。他认为“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是“多么不能满足啊”。他对社会的终极愿望是“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成熟和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反人道，反社会行为导致的饿殍遍野，人相食的真相面前，他“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向地球宣战的战役”而立志“要做一个历史观察家”，他断言“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然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

面对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他毫不犹豫地论断“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多就是兽性”；

直视人性被彻底泯灭的恐怖，他多次在心底、在日记中痛苦不堪地咆哮“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来审判啊”；

在剧烈的饥饿逼得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要偷东西吃的境况中，离开九死一生的劳改营，他不是额手称庆而是被“一种悲恻的情绪浸透了”；

刚从劳改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面对挂着虚缈的“人民”二字的巍巍“大会堂”



发出了最锥心泣血的哀鸣——“我永远也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这成了顾准最著名的反革命言论，也成就了他这个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弄成右派的右派。

50年代初遭受无端猜忌打击时，有人传说他走入教堂祈祷，还有人说他到寺庙去烧香拜佛求平安。所有有关顾准的传记文章都十分避讳却又不愿完全不涉及这一传说。我不敢采信“祈祷”一词，但绝不采信“烧香拜佛求平安”一句，这与顾准一生的行为模式无疑相悖得过于荒谬了。但是他去这些地方感受宗教氛围却不能轻易排除，从他日后写出的关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儒教，道教（假如你一定要把孔子学说和老子学说归入宗教的话）的精彩文字看，他不但可能去了人们传说的基督堂和佛庙，甚至还可能去过清真寺，道观或其他宗教场所（只要条件允许）。对“一神教”持极其鲜明肯定态度的顾准，绝不可能在身处逆境时“临上轿扎耳朵眼”般慌张到要到处去买“平安保险”，他到这些宗教场所（若确有其事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做历史的探索、宗教的探索和知识的探索。这绝非当年的人们可以理解，也不是现在的人们能够轻易理解的。

几十年前基督教在中国已近寂灭，他不惜冒险以戴罪之身四处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仔细研读；

在受尽屈辱与逼迫，本该“鸟将亡其鸣也哀”的1974年，他却咳着，喘着，笑着，最后是吐着血翻译了乔治·卡特林论述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著作《基督教》；

他推崇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鲍尔丁的主旨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既要成为经济人又要成为道德人。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不行，没有道德调节和政府干预也不行。而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宗教意识的，这种意识的顶尖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信仰”；

他写于1971年6月10日的日记，强烈质疑赫胥黎的《天演论》，将好听点叫“激情万丈”，难听点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说，释为“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并斥为：“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

不可废，根柢悉在此”。说到此处他还嫌不过瘾，又接着大加嘲讽：“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义论相比较”。

这篇如果按照当时的“政治敌情”标准衡量，本应属于“最本质上反动”的文字，混杂在被某位后人评论为“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分肯定斗批改”的顾准文字中，当年如漏网之鱼，侥幸没有被查出和销毁，却成了今天洞察顾准世界观，价值观的最好入口。尽管顾准从未受洗成为基督徒，然遍读顾准，我还是无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思维方式和精神根基最接近的还是基督教精神，是“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过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的一种特别的，比普罗大众对基督教教义的朴素理解更加深入一步的思维和解析。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思维和解析的能力反倒可能妨碍了人对基督的接近。但往往持有此种能力的人，在肉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段所有“妨碍”都会突然消失，而从前的思维和解析却一点都没有浪费——他们甚至比普通的基督徒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祂无尽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自然和人文科学家，在肉体的生命行将终结时会不约而同地在“神圣的必然”面前，在“第一推动力”面前，在“有意义的永生”面前，在“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面前俯伏了下来。

顾准的后半生多半都是活在“非人化的气氛中”，社会、人群对他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就没有停止过。没有遮雨的屋檐——家早就散了，没有避风的港湾——爱人已经自戕，更没有桃花源——除非你把他最后的寄身处——风雨飘渺的经济所和自身难保的孙冶方计算在内。读他的《商城日记》，你能明白什么叫“苦难造人”；读他的《坦白交代材料》，你能明白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读他的《文集》，你能明白人能将苦难转换为思想的潜力有多大。

然而他的后半生却绝不是「绝望」的。

他有信心，相信自己正在无限地接近真理，其思想如即将成熟的庄稼，开镰收割指日可待；他有盼望，盼望一个“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神武景气”国度和一个充满了善意的社会的终将出现；他有足够的爱，足够到既能爱那些爱他的人，也能爱那些嫌恶他，

鄙薄他和加害他的人；他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虽然看上去生活对他是那样不公平，生命对他是那样脆弱；他原谅和宽恕一切人，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对不起他；他不惧怕死亡，当死亡猝不及防劈面而至时，他直视它，勇敢地迎接它的到来。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顾准对承受苦难已经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须知他不是苦行僧，不是受虐狂而是一位翩翩才子，一位真正的绅士。惟其如此，这个文弱书生才堪比二千年前身陷古罗马斗兽场，伟岸挺拔的色雷斯贵族斯巴达克斯——同样深重的苦难，同样高贵的尊严，同样悲壮的事业，同样瑰丽的传奇，只是斯巴达克斯面对的是饥饿到要立刻吃人的野兽，顾准面对的是蒙昧到不可理喻的要吃人的人。

基督教并非仅仅是一个宗教或一套哲学，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一整套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大多不能迎合人的本性，它是反潮流的，罕有的，也是很难实践的。顾准在“头破血流”，“唾面自干”的苦难中，“忍耐”生成了；在“忍耐”中，一种生活方式生成了；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种罕见的品格生成了，它使最易滋生仇恨的土壤挺拔出最绚丽的人性之花，使最非人化的熔炉锻造出人最应该具有的形状——基督自己的形状。

很难说这不是一种信仰的胜利。

有人判断晚年顾准其实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我不敢，也无意下这样的判断。

“是一位基督徒”和“做一位基督徒”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眼下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言而喻，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懂得。顾准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不重要，他“做了还是没做”一名基督徒，比之前者要重要得多，前者仅仅关乎“宗教”，后者才真正关乎“信仰”。

现代神学家汉斯·孔对“基督徒”下过一个定义——“任何人，只要他拒绝专制，只要他指责神学家或教会头目的傲慢自大，只要他批评教会专制，批评教会与国家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假如从这个定义出发，顾准何止仅仅在晚年“成为了”基督徒，从读史，论史，纪史，解史开始并竭尽生命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知识，追求美，追求真理的他，其后半生就已经在“做”基督徒了，否则那些关于“契约”、“宽恕”、“罪

愆”、“诫律”、“审判”、“悲悯”、“反偶像”、“反专制”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年轻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在《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文章里写道：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顾准）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非常钦佩在这样的年代里，在央视这样的地方还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我依然无法完全赞同柴静的提法。在人文，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知识”必是要有一个“款广度”标准的，这意味着你要具有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种或几种文明的“知识”。你不仅要知道现代文明，而且还要知道古代文明，不仅要知道东方文明，还要知道西方文明，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的原点，使你能从具象的“知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取舍，也就是“逻辑”，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否则凌乱的“知识”真的就会是“风暴中的石子”（柴静的形容太贴切了），试想，在“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风暴中，小小的石子如何能让人“扣住”而“不被吹走”甚至“不被沾染”？更遑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知识”，许许多多“逻辑学家”和他们的“逻辑”自身就已成为了风暴的一部分，以“飞沙走石”的方式助纣为虐。

从“知识”和“逻辑”两个词汇辞源本源的词义上说，你还真不能将这些“石子”统统归为“假货”，不能说那个年代中国一点真正的知识和逻辑都没有。无论如何，虽没有阿姆斯特朗那样的登月，总还有上了天的“东方红一号”；虽有1959-1961年滔天人祸造成的大饥荒，总算还没有弄出1974年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那样、以屠杀三分之一国民的手段搭建起一个“猿的社会”的事情。

顾准在风暴中扣住的，决不是两颗“石子”而是两块“磐石”——宽广的“比较知识”和有原点的“逻辑思维”，而这两块磐石又都是“大山”的一部分，这座大山就是“基督

教的信仰”。换句话说，顾准的“知识”和“逻辑”之原点就是信仰的元点。

柴静也提到学者朱学勤的判断——“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大限何在？“逻辑”为何乏力？难道在这个领域顾准是唯一的天才？难道他占有了比别人多的资料或文献？难道他掌握外语的水平无人能够企及？难道那时的史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希腊和罗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两河和海上文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那还能称为史学家吗？难道那时的哲学和社会学家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西方哲学和逻辑学？那么中国各大学还开办那么多的哲学系是做什么的？抑或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都是错误或片面的，而唯有顾准当年“完全根据 XXX 宣传部给出的资料和文献”所得出的理解才是准确的？撇开被顾准刻薄了又刻薄，贬损了又贬损的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不谈，难道十年里就没有一位青年学子像顾准那样掌握了“知识”和推理了“逻辑”？难道只有顾准拥有一个“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保留下他这些日后直教人惊心动魄的文字？须知这是个当时有着近十万万人口的国度啊！

这些无法成立的原因，正在于这些“知识”和“逻辑”是没有元点和凌乱的。而顾准，这位幸运的、**“被历史格外青睐的中国人”**（易中天语），找到、咬定并彰显了这个元点。

这，才是“顾准交响乐”的定音鼓。

旅居海外的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在看过我最初写就的《顾准》一文后，曾经给我打过一次很长的电话——

“王晓林，你绕过梅里雪山吗？你想过人们为什么要绕，而不是翻越吗？”

“应该是‘敬’和‘畏’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注意到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许多都是基督徒吗？”

“我注意到了。且何止是经济学家，文学艺术家、学问教育家不也是吗？但这是为什么呢？容我静下来认真想一想呵。”

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从十八岁初读《悲惨世界》算起，慕道（慕基督之道）几十年的我，总因不能相信“童真女怀孕”、“死人复活”而无法成为基督徒。正是在“读顾”的过程中，为读懂顾准而读《圣经》，为读懂《圣经》再读顾准，使我最终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愚夫愚妇”中一名新成员。这大概是至今仍被称为“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的顾准老人家在天之灵始料不及的“副产品”吧。

人们，假如你还在看书，请今天就开始读顾准吧！■

### 【序与跋】

## 顾准和他的时代

### 后 记

王晓林

拜 1971 年“九一三”一声“爆响”给我辈送来的“无主义主义”，本人生平未着“政治”一道，也因此直到 2007 年还不知“顾准”为何方神圣，枉和他同时代了 20 多年。

读罢顾准，惊为天人。

1966 之前尚不敢说，但我辈亲历的“史无前例”还足音不远，尘埃未落。几亿人在集体癔症中不思不想，装疯卖傻，斯文扫地活了足足十年，几无一人置身事外。仅此一点在世界史上就是空前，至今也还是绝后的。亲历者绝大部分人还在，境迁事未过，曲终人不散，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段在中国史上显得特别突兀，特别诡异的小断代，其蹊跷乖张和莫名戾气，至今都无人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多少西方人文学者，他们几乎是艳羡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奇异的人性大展示，给史家和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研究创作的源泉。而咱自家，却宁愿臆断夏商、妄论唐宋、戏说明清，也不肯细究这个历史小切片加人性大展览。大家一起糊涂着，挺好。



可眼前突然就出来了个顾准。他是谁？他何以如此？他的故事又何以如是发生？

这事弄不清楚，不得安宁。可是如何下手？年近耳顺，退休多年，除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志愿者外，无任何“头衔”和“挂靠”，实在无处下手。

是孙冶方先生养女李昭大姐给了我徐方（咪咪）电邮地址，匆忙中还掉了一个字母。不想藉着错误的邮址，远在日本的她竟收到了我的邮件并立刻回复了。几天后我就见到了回京奔父丧的咪咪，我们多次面对面谈她的顾伯伯。不久她回日本，又有了数万字的通信，说到动情处我们甚至一起翻译索尔仁尼琴的《为俄罗斯母亲祈祷》。当然我的译文大大逊色于咪咪，她的英语可是陈翰笙老启蒙，钱钟书先生指导的。亲历者咪咪是这本书的“第一推动力”，美丽善良的她不愧顾准生命中最后、最明亮的一抹阳光。

之后我冒昧地把最初写下的“顾准印象”传给吴敬琏先生，问他是否“反感”。因为文中屡屡提到顾准受基督教的影响，很不合时宜。几天后老人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一点不反感，还顺带指出了一处年份的笔误，令我受宠若惊。

然后是张曙光先生。一说为写顾准，老夫妻立刻热情相约。听他们徐徐道来对顾准的回忆，连张家小儿女常常去讨顾爷爷“黑水”（咖啡）喝的趣事也在其中，温馨得宛如昨日。最重要的是，此书将顾准定位于政治哲学家就是受了张曙光先生的启发。

书的开篇要写主人公接受人生最初教育之处——“小姑私塾”，这就不得不追溯和考证“小姑教育”的莫基地——上海清心女中。恰恰我的忘年交，孙冶方先生的外侄女，也是我后来主内的姊妹，中央广播艺术团合唱团退休老艺术家洪慕莲女士60多年前就从那里毕业。是她和老同学陈梅珏——两位年近耄耋的老人千方百计为我找到在清心堂侍奉了一生的陈蓉生老牧师未经发行的回忆录《清心堂沿革》，助我顺利写完原以为会很困难的一个章节。

商城是顾准重头戏，写顾准当然要去商城。可是人生地不熟，敏感话题又无官方身份，谁会理你？抱着侥幸在网上搜索“铁佛寺水库”，居然真让我找到一位当年人物——商城共产主义小学学生杨敬之，“顾准名单”中杨静超就是他的校长。敬之也是一位教书先生，

商城如今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就这样通过杨老师的帮助，仅仅凭着一个“志愿者”的身份，我看到了《商城水利志》、《县志》、《人口统计》等肯定属于官方的文件。整个过程河南省教育学院青年教师李素立先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民间的“信阳事件”探索和研究者，书中所有大饥荒数字几乎都来自素立的资料库。

至于寻找当年和顾准一同在商城铁佛寺水库劳改的右派难友们，就更奇妙了。官方是绝不会对外提供这些信息的，信阳的朋友又都年轻，知不知道啥叫“右派”都很可疑。可年轻有年轻人的办法：两个30多岁的小伙子开上车一头闯进商城，看见街上坐着晒太阳的老人就问：“您老当年是右派吗？您老认识谁当过右派吗？”天呐，这在北京连想都不敢想的傻办法居然屡屡奏效。蕞尔小县当年右派成群，“小巷子两头一堵”，不几问就找到了三位“顾准名单”中人。登门拜访中的不胜感叹、不胜唏嘘都写在书中了。这里只想再说说宋一峰老人：临走前我给宋家老夫妇拍下合照，回京后在“喀嚓鱼”网上做好了送到老人家里。赵阿姨专程致电我，千恩万谢。不想这竟是70年白金婚老夫妻最后的合影——我走后不足半年，宋一峰老人溘然长逝。

再后来，写到顾准译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节，得知赵人伟先生也是顾准学生，莽撞地摸上门去向他讨借“绛枫（顾准）”译本。赵老翻箱倒篋找出上有顾准之子题赠和自己批注的珍贵版本，并嘱我读书不要全信中译，中译常常大谬。果然，绛译与新译常有差别，尤其在涉及经济学术语时。是精通英语的刘军宁先生辗转从外网宕下熊著原文送我，郑州独立学者邵晟东先生、山西大学王三义先生鼎力相助，才算是磕磕绊绊踩着顾准的脚印捋顺了“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议会制”、“政治家”等等概念。

息县也是顾准故事的重头，也就认识了一位地道的息县人——李玉。2005年，在上海任职人民日报《大地》杂志采编的阿玉参与策划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东岳寻访暨纪念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亲历者和最早探索顾准的人们，如陈敏之、吴敬琏、徐友渔、高粱、咪咪（徐方）、高建国、罗银胜等60多人参与。阿玉为了帮助我与他们取得联系竭尽了全力。通过她，我采访到了高粱、宋德楠、陈小萍、陈小嫣，最后是顾家大

姐顾淑林——一位极具理性的物理化学科学家，据说从不接受有关父亲的采访……。

叙述顾准 1957 年的《试论》，对我这个连经济学 ABC 都不懂的工科生不啻巨大难关，写作一时困顿不前。又是阿玉，在网上找到一位对顾准经济观点颇有心得的宁波学者“清华先生”，并把他博客地址转给我，我加了“纸条”。仅仅是“网友”且是初识的网友，清华竟立刻打来电话，不问我是何人，仅凭“顾准”二字，就开始掰开揉碎给我讲“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契约精神”、“计量经济学”、“凯恩斯与哈耶克”、“兰格计算机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劳动时间概念”等等等等。毕竟是长途电话，我说我打过去吧，他理也不理，继续讲下去。一年多我们通了无数次电话、短信，加了无数张“纸条”。可等我书写成，就再也找不到他了，电话无人接听，博客、短信都没有回答。至今我没有见过清华先生，不知他长什么样子。我永远记得他的一条短信——“记住，经济学基础的基础——契约精神，来自北欧海盗”。

在写到顾准对《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的剖析时，我迎头撞上了“黑格尔”这堵大墙。仅仅顾准反复阅读的《小逻辑》，一遍读下来就晕得头都大了。懊恼之际是爸爸提醒我“你干嘛不去请教咱家邻居王树仁先生？他是黑格尔专家呀”。我拔腿就奔了王家。老树老师给我讲黑格尔，讲异化，讲大小逻辑，讲海德格尔，讲维特根斯坦、罗素。听完后顺着顾准的思路看这些大佬们，竟然不再头晕脑胀手脚冰凉。

长春老学者靳树鹏先生，对我亦步亦趋踩着顾准对庞然大物《自然辩证法》穷追不舍的脚印走下去，几次给予鼓励和支持。他是个双腿膝关节不好，连楼都下不了的老人，光是亲笔信就写了好几封，叫老伴拿到邮局发给我。北京学者，《炎黄春秋》原总编吴思先生更亲自下笔为我修改《顾准对〈自然辩证法〉的追索》，希望能够发表，终因“向既往方向追索得太远”而未果。假如没有这些前辈和同道的支撑，仅仅这些书名就足以吓死我。

写到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又犯晕，还是爸爸提醒——“去找李真叔叔啊，他学的就是古希腊文，搞得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呀”。我当即致电邮给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的这位老叔叔并立刻得到了回应。本书关于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在中国的状态叙述，就得益

于多年从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老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希腊语言学家李真先生的指点和帮助。谢谢李叔叔，谢谢刚刚离世的爸爸。

陈乐波、陈申申两兄弟也是我最要感激的。他们的父亲陈同生就是当年“大片”《东进序曲》中由当年最帅的男演员李炎扮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原型，也是“顾准名单”中人物。陈家父子之大器和轩昂也和李炎的形象一样。我和兄弟俩素不相识，仅凭着克明君的介绍和一封求助的电邮，陈家兄弟就为我的书在上海召集了一次十多人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熟悉和研究顾准的前辈：孙恒志、晏小宝、朱学勤、朱小平、高建国……。他们给我的帮助和启发是巨大的。例如关于顾准1950年代初在上海实行“按率征税、按律办事”的普世意义，就受益于在美国做了多年执业会计师的申申的指点。申申也是当年最早推动顾准文字流布的年轻人，既理解他的思想又懂得他的专长。

上海独立经济学家朱小平先生，会后我们又有许多通信和一次会面。书中关于顾准与利澳·斯特劳斯在僭主问题上奇迹般的相通与契合、中国是否有过类似希腊的古代民主、为何中国无僭主僭政说、顾准当年读到的中国历史真伪问题以及有关“陈独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的陈述与观点，都极大地得益于小平君的指点和帮助。

还有许多“巧”事呢。

为了体会顾准所读乔治·格罗托《希腊史》的现场感，我在北图网络上搜索了很久才发现这套书已属典藏，不借阅更不出借。无奈之下只好上“孔夫子旧书网”碰碰运气。网络真是个好东西，三下两下就找到了同样年份、同样版本的《希腊史》，开价不菲。为了顾准，为了希腊，豁出去了。我立刻将钱打出，又追了一个电话过去确认。岂料对方得知我买书的原因，再三要免了邮费不说，还反送了我一本他刚刚译好出版的《香奈儿传》。原来沈占春先生也是个独立学者、翻译家，正在致力翻译顾准生命中所读的最后一本书——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名著《英国史》。“X/15 Macaulay”——这是顾准全部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74年10月15日。就这几个字，我和沈先生立刻成了好朋友——素未谋面，网络好友，话题只有一个——“顾准——希腊——麦考莱”。在本书

成书过程中，沈先生也终于完成了这部浩瀚英文名著的中译。下一步他打算要翻译的，正是乔治·格罗托的《希腊史》！

朱小平先生曾提醒我，“你要注意一位‘民间顾准’杨伟名”。可是当我在网络上查到此人时，才发现人物已经十分式微，连灯火阑珊处都不见人影了——曾经在二十多年前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已经改回“户县图书馆”，县志办人员压根就不知本县有过此人，电话打过去十分的不耐烦。意外的是在网上发现他的遗著《一叶知秋》竟出版过。这篇令毛泽东先生大光其火的文章在2004年即由卢跃刚先生编辑成书并写下了长篇序言，可惜早已断档。循迹找到跃刚先生，他立刻写来长长的电邮——“……在更广阔的思想史、学术史和人类命运的背景下细读《商城日记》，不能不为顾准的原创经济学方法观察大饥荒（恰巧顾准置身于中国大饥荒的典型地区）——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人为灾难的个案、机理，阐释大饥荒成因的胆魄、深邃所折服。他的贡献是全人类财富。”

是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先生从仓库翻出一本《一叶知秋》放在书店柜台上，专门等我去取。苏里君好像专门喜欢“囤积”这类书籍。中国第一版——贵州版《顾准文集》就被他一次购买了4000本，如今留在手里的都是珍藏。卢跃刚认为顾准和杨伟名都认识到了“短缺”和“匮乏”对专制制度的巨大助力和支撑，这也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著名的“短缺经济学”观点。而老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仅仅“短缺经济学”还解释不了中国1959-1962年人祸造成的大饥荒，能够解释的它的只有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著名的“饥荒理论”。顾准的《商城日记》早于阿玛蒂亚·森20年就有了这个理论的雏形——“餬口经济”、“白薯共产主义”，只可惜文字凌乱，未成体系。

这一切都极大地帮助我梳理了顾准的思想过程。

成书中我所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的《顾准文存》，由于翻得太频繁开始掉页了。因为任何书店和网上都买不到，北图又只能馆阅不许复印，不得不厚着脸皮打电话给并不相识的、彼时的责编李丕光先生，希望能买到一套库存。丕光接到电话立刻寄来一套新书，无论如何不肯收费不说，还附亲笔信一封，热情鼓励我把书写下去。一位大出版社

的大编（如今是总编）亲手写信给你而不是打字+签名，在互联网时代可不就是文物嘛！

杨建国先生，第一个吃螃蟹——出版《顾准文集》的青年编辑，如今也年过半百了。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前途和“钱途”，也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一次读书会上偶识的许医农先生向我提供了建国的联络方式。素未谋面的杨老弟听说了我的出版困境，立刻向熟悉的出版社热情推荐。当我说我也想向你鞠一躬（不是因为他的推荐啊），建国幽默地说“不用啦，不用啦，很多人在信里都鞠过了，您就不用鞠啦！”

多年研究国际共运并独创性地提出“基因科学与新人性论”的郑州独立学者邵晟东先生，在认真阅读完全部书稿后提出了近二十处质疑、悬疑、错误、笔误和需要商榷之处。这对作者意味着什么，不是个中人很难理解，个中人的感激之情也很难表达。他挑出的硬伤，借一句顾准的话——“令我不胜汗颜”；同时他的鼓励，也借一句顾准的话——“令我不再‘怕教授’了”。谢谢，谢谢了，晟东君。

得知旅美画家李斌曾经画过一幅《上海的早晨》（作于2007年，中国美术馆收藏，见本书 页），画中年轻的陈毅、潘汉年、杨帆和顾准英姿飒爽、气势如虹。画作的蕴意在：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靠着这几位秀才的真才实学打动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稳固了政权变更后的世界超级大城——上海的国民经济，可惜不久他们一个个都被革命母亲吞噬。我迫不及待地从小斌女儿晓朝姐姐那里得到了电子照片和李先生的电话，迫不及待地打给他，脱口而出“李先生，您能为顾准作一幅肖像吗？”李斌君一口答应，“好，你什么时候要？”“等找到出版社就告诉您”。后来我被朋友埋怨：“王晓林你知道李斌画作的市价吗？”天，我怎么这样冒失！忙怯生生再打电话过去，肖像事提都不敢提，只问《上海的早晨》要不要版权费。李斌君笑答：“我的作品使用的人越多我越高兴，谈何版权？更何况是顾准！我早就想画一幅他呢。别急，等我画完曼德拉系列就着手”，反倒弄得我抱赧不已。

李锐老为我的书题写了书名。年近百岁之人，一听顾准二字，双目发亮，敏捷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二话不说走进书房，挥毫泼墨，朱砂铃印——“《顾准和他的时代》 九



十九叟 李锐”跃然纸上，苍劲拙朴，力透纸背。老人动了情——“他只年长我两岁啊！”，一句话说出心中所以痛惜。临走，老人把桌上一份《文汇报》递过来，“这个也送给你”。三个整版的长篇报道《李锐畅谈养生之道——不要停止思考》，而我正是看了他多年前纪念顾准的文章——《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才认定了要请老人题写书名的。

要感谢的人还有那么多，王克明、姜红、陈瑞铭、楼肇明、蔡璋、刘志琴、金吾伦、吉晓蓉、宗丕钊、林皎皎、林明明、汪夕增、朱嘉明、柳红、邵敏、向继东、张晓波、肖涛、尚红科、孙牧云、岱峻、赵晓玲、穆军、柯大全、罗银胜、高粱、王砚峰、王迎新……，怎么也是写不过来的。可丁东先生却一定要写：在整个的成书过程中，我自始至终得到他的指点、鼓励、支持和帮助。是他推荐在“共识网”上刊登了我的《顾准与基督教文化》，向经济科学出版社推荐了我的处女作，虽然在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又被……。但正是他所做的给了我这个非学者、“圈外人”最初的信心。丁先生始终直言不讳地要求我去掉感性语言，抛弃“文艺腔”而留下“干货”，这一点令我受益匪浅。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首届“书香之家”的一位“家长”赵亚山先生曾经身为语文老师。亚山君在拿到文稿后为我逐字逐句修改错别字、错误标点和混杂的表述，自愿作了第一次校对。我非常感动，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六十万字的工作量，又没有任何报酬。

最难忘已经约好了马上就要在上海见面，却不打招呼就遽尔长游的徐志跃弟兄。我的处女作《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2010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邱红小妹是我的责编，她的丈夫，上海独立学者徐志跃是特约编辑。那时我已着手顾准，深受志跃翻译的奥地利裔美籍学者，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艾瑞卡·沃格林《自传性反思》的影响。2010年深冬，他带我参加了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主持的“沃格林研讨会”，启发至深。第二天他又和许志永君一起参加了我在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的受洗仪式，从此我们成为弟兄姊妹。几年间我和志跃弟兄关于科学、哲学与宗教，关于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家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我们几回在上海图书馆隔壁的“1984茶座”讨论沃格林和斯特劳斯，历史与秩序，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去年9月我们还在海淀的万圣书院，一边喝

着伯爵茶，一边讨论维特根斯坦和罗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宗教大法官”，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他的《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并约好11月“1984”再见，重点讨论色诺芬的《希耶罗》和他一直想重译的心理学名著《拒斥死亡》。可是突然，11月2日他走了，竟是毫无“拒斥死亡”的意思！他的短信我还没回，我的电邮他也还没复，直教人痛彻心腑。把这本书献给他，全为的是让自己能稍觉心安，但愿已荣入主怀的志跃弟兄能够接受……。

好像凡事只要关系顾准，总有人愿意帮忙，总有人想为此人做点什么。对那些想帮忙却又帮不上的人们——“我们很愿意出版此书，可是……”，我依然感激不尽，并相信总有一天大家是能够不说“可是”的。那就先不说了吧，反正在克明和津津姐姐的帮助下，有了大山出版社，有了蒙宪君，托顾准的福，功德圆满。

不过有件趣事，最后还是忍不住得说说。刚下笔顾准，我找一位号称在贵州一亩三分地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的江湖上朋友，请他帮忙买一本1994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顾准文集》，因为大家都说只有这个版本才是“真经”。这位小哥可犯了大难——半年功夫都没办成不说，最后号称动用了“铁的”关系才从贵州出版社仓库底下翻出一本，忙不迭给我寄来。可实际上我拿到手的还是个盗版的“第四次印刷”。不过我依然感谢他，虽然他听说实情后感觉特别没面子。

最后我要感谢七岁就同学、同桌的丈夫。虽然我写的东西他一个字也不看，可离了他我寸步难行——调电脑、配软件、开车找人、联系采访、安排行程，杂七杂八什么都帮我做了。“商城找右派”的传奇就是他托他的信阳小朋友们干的，搁我，别说右派了可能连“爱派”（iPad）都找不着一个。自始至终，他支持我做这件事情，只不过时常敲打我——“老太婆，可千万别把自己真当成个作家啦，咱还是踏实做外公外婆的好。”

我记住了，放心吧。■

2015-5-1

【书摘】

## 了不起的流水账

王晓林

是，回到北京的顾准最感幸福的，莫过于能挨着图书馆，挨着书。

说起来北图离他并不近，从他所住的建国门学部到故宫西侧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差不多有五公里，可离着经济所图书馆就太近了。9.13之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军宣队命令原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的经济所图书馆全数搬到建国门学部去。这可是沙漠之井——宗井滔的图书馆，对书的饕餮之徒顾准而言真是个大福音。虽然从三里河搬来的图书都打着包，无法借阅，宗馆长奇迹般续订下来的西方经济学期刊可都是新的，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新知”。妻子死了，五个孩子都远离他，可他天天都有“新嫁娘”，天天都有“新孩子”。新嫁娘就是那些新借来的书，新孩子就是他笔端永不停歇潺潺流出的新文字。

顾准依然写日记，但一改他从前风格，“北京日记”极为简洁，粗看上去活活就是一本流水账，不但无感慨、无议论，也无人物，无情节，甚至连事物、事务都没有，除非你把“休息”<sup>日记 73.8.2.</sup>，“洗澡”<sup>日记 74.4.21.</sup>看作是事物或事务。而“同上、同上、同上……”则比比皆是。日记最短时只有一个英文字，例如“Catlin”<sup>日记 74.5.17-18.</sup>、“Cambridge”<sup>日记 73-74 许多处</sup>、“Immense”<sup>日记 74.5.16.</sup>什么的，令人摸不着头脑。

实际上，“北京日记”是一部读书目录和时间表，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终止于主人去世前十八天的1974年10月18日，时间跨度整整两年，字数却只有四千多一点，其中一大半还是“日期”和“同上”。更纠结的是内中还夹缠着许多英文和中、英文缩写，无怪乎人们看不懂和不耐烦看。

但它却是一部了不起的、常人写不出来的流水账。

先不管他“息县日记”与“北京日记”之间又整整地缺失了一年零一个月又十一天是怎么回事，除了前面章节已经提到的、必然存在的“9.13”的原因，其余的蹊跷就先放一

放，来看看这部奇异的流水账奇异在哪里？它为什么这样简洁。

和“息县日记”也就是所谓“新生日记”恰恰相反，这部“北京日记”是顾准单为自己做的读书记录，不准备给任何人看，但也许仅仅除了六弟陈敏之之外。

再不知深浅地说一句，这部日记也是我唯一不怀疑被人腰斩斧钺过的顾准日记，但是否被“斩首”则不能肯定。

说它未被腰斩，是因为这370天的日记一天都没有缺；说它未被斧钺，是因为它本来就简到不能再简，再砍下去就没有了；说它不能肯定是否被“斩首”，前边已经说过了，是因为从1971年9月“息县日记”的结束到1972年10月“北京日记”的开头，中间缺了一年还要多。

顾准是个逻辑性极强的人，抽象思维能力大为超凡，十分在乎数字上的完美和优雅，“半半拉拉”、“稀里糊涂”从来不是他的风格，这从他的文字表现和旁人旁述中即可领略。从前的“党校日记”、“商城日记”、“新生日记”之所以会有许多处半半拉拉状，稀里糊涂状，前面的章节已经猜测和说过很多，不再重复。至于说最后的这部“北京日记”是所有面世日记中最完整的，除了一天没缺一条因素外，他的“笔记”和“文稿”也间接佐证了这一猜测——从“北京日记”开始那天起，“笔记”、“日记”、“文稿”就成为了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记记载他今天看了什么书，笔记是摘录和评论，文稿就是最后的成品——《顾准文稿》，百试不爽。

比如“北京日记”开篇：“X/13 《经验与自然》”<sup>日记72.10.13.</sup>

《经验与自然》是经验主义大师，美国人约翰·杜威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实用主义流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被誉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有哲人称杜威是“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那么这本书就堪称“家训”了。在书中，杜威提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种观点反对把人与经验同自然截然分开，主张确立“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由此建立一个“统一的经验整体”。

顾准读杜威当然不是始于1972年。早在1959年去河南商城右派劳改营之前，他就读了他的《哲学的改造》，“读杜威哲学的改造，极有意思。问题苦我极深者，不图于此公处获得解决”<sup>日记 59.3.7.</sup>。不过那时他仅接受杜威自然科学部分的理论，“社会与伦理大约未必可取”<sup>同上</sup>。那时他已经开始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颗大洋葱，至少杜威关于自然科学部分的观点深得他心。

时隔十三年，到了再读杜威《经验与自然》的1972年，顾准的理论高度已经大不同前了。早已汲取了杜威、罗素等人多元主义哲学的观念，对黑格尔主义的神权思想的“绝对”和“比之前所有的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sup>笔记 P597</sup>的《自然辩证法》，他都已经都不再惧怕。就像摘下了金箍儿，不再害怕紧箍咒的孙悟空一样，他虽说还不至于挥起金箍棒去痛打师父唐僧，可至少敢于大胆批评师傅了。

至于教训猪八戒，那是他的长项：“也有人曾经企图把杜威、罗素哲学打上帝国主义的印记，英共的康福斯写过这样的书。1957年，他（还）慷慨陈词地用了杜威、罗素都强调过的话：‘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sup>文稿 P359</sup>

这样不好吧，康思福同志。你要真是主张“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为什么要对多元主义扣上“帝国主义的印记”金箍儿，且跟着就念紧箍咒？谁“批判”就要叫谁脑袋疼，你叫人咋个批判嘛！

对这种以为紧箍咒就是“终极真理”猪八戒们，他可是一点情面也不留的。

那么什么才能叫做“批判”呢？顾准同志紧接着话题一转——

西方思想界确实善于批判。政治权威当然是批判对象，任何既得权利都是批判对象，美国盛行的群众性的种族歧视也是批判对象。只要是和公众有关的事情，怎样保密也无法长久保密下去。说美国在越南的肮脏战争，是被批判得只好撤退，至少也有一方面的真实。

同上

我不管你那个“圈儿套儿”是个什么玩意儿，金箍儿也好，玉箍儿也好，批判是一定

要货真价实的，那就是金箍棒，就是对政府、权威、威权、既得利益者的制衡。你的“紧箍咒”绝不可以保密，甚至必须 Delete（删除），否则没什么可说的，金箍棒伺候！

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大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 Bacon（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蹋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她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文稿 P370

顾准口中的“这份东西”就是他的《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此文脱稿已是 1974 年 3 月 27 日，离他死去只有半年时间了，却还是有许多不敢确认，不敢妄言的东西，更不敢说发现了什么“绝对真理”。

杜威的这本《经验与自然》顾准看了两个多月，1972 年 10 月 13 日和 11 月 20 日分别两次作了记录。当然这期间并不妨碍他看别的书籍。顾准看书从来是若干本齐头并进，很少见他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而不插进其他书籍的。他喜欢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的作家、作品来相互印证，或者让它们“扭打”、“撕咬”，然后从这些思想的猛烈碰撞中萃取他认为最接近真理的东西。

例如他在看杜威这本书时还同时看 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这部书代表了休谟晚年成熟的哲学思想，其主题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宗教假设，也就是宇宙设计论——又一种以为“穷尽了所有”的理论。

同时他还读巴鲁赫·斯宾诺莎所著《笛卡尔哲学原理》和附录《形而上学思想》，前者是作者用几何学方式讲述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后者更多的是斯宾诺莎自己对一些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和概念的札记。顾准接触逻辑学也是从几何学开始，对于笛卡尔他不陌生。

读书的同时他还译书。



早在文革初期的1967-1968年，还在监管中的顾准就开始翻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了。此书是这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大师最著名的著作，它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学界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

此书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了严复先生的文言文中译本——《群己权界论》，1959年又有了许宝骙先生的商务版白话文译本，但顾准好像对两者都不甚满意。密尔本身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作为同道，顾准决心重译《论自由》。此前，他已经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和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论文集》，英译汉水平突飞猛进。《论自由》虽然并非一本纯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一体的名著，但篇幅不大，观点清晰、文字优美，令他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并没有人要求他翻译，也不会有出版社出版和付他稿费，可他就是技痒，非重译一遍不可。

赴息县干校前他已经译完了它，如今回到北京，他开始校对已完成的译稿。这一次他没有分心，全心全意用了八天的时间。校稿的过程当然也是重读和重新思考的过程。此书对顾准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的笔记和文稿中，J. S. Mill（密尔）这个名字被多次提到。例如：

19世纪中期，J. S. Mill的书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务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这其实是17至20世纪三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以此于中国汉代开始的盐铁国营，及其后连绵不绝直到清代的盐专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商的传统相比（其实，在中国，远古的商代，手工业就是“国营”的），可以更加突出它的特点。文稿 P342

你看密尔一百年前就反对“官商”，力主政、企分家，顾准就注意到了这点呢。不过顾准更关注的，是密尔一个最有名也最被后人推崇的口号——“保护少数派”，这也是顾准最希望有朝一日他脚下这片东方的土地上能够喊出的声音：

1957年前后，我们这个一党制的国家也响亮过“保护少数派”的口号。其实这是英国的穆勒说过的话，是地道的两党制口号。<sup>文稿 P385</sup>

顾准所译的《论自由》若按照常理推测应该还在这个世上。1972年以后中国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焚书”行为，他的很多文字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经济所发还给了亲属，包括他的历史坦白、罪行交代、检查、检讨等等。《论自由》的顾氏中译稿非常可能就夹杂在其中。

到了1973年，顾准日记里“II/12 英文文献”，“II/10 Journal of Ec. Review（经济观察）”，“II/19 翻译任务”，“II/21 翻译任务”，“III/10 英文文献”……比比皆是，他在经济所简直成了职业的译员，只是这个译员是没有工资的，只有刚够维生的生活费。

再举个例子。

“北京日记”从1973年6月13日开始记录他开读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格罗特是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希腊史学家，所著十二卷本的《希腊史》是近代希腊史世界级权威读本。彼时这套巨著尚无中译本，顾准读到的是四卷本的英文原版。四卷本并非十二卷本的缩写而是“缩印”。他不仅阅读还翻译，翻译了其中“希腊的僭主时代”整整一章，大约一万五千字左右。

八个月后，1974年2月12日，他最辉煌的篇章——《希腊城邦制度》落笔，“而这次译 Grote 的文章时才领会了的”<sup>文稿 P269</sup>。

这里他“领会了的”，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把“斯巴达完全撇开，将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与雅典民主焊在一起，把分明是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巴西流斯）说成是‘军事民主’”<sup>文稿 P269</sup>的历史虚无和歪曲。

读格罗托《希腊史》四卷本原文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从6月18日起到9月12日止，

他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它们，除了整译“僭主时代”外，还做了不少摘译。次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74年2月起笔的《希腊城邦制度》里，“城邦制”、“僭主政治”、“希腊民主”、“公民团体”都是最重要的阐述，显然是参考了格罗托某些章节的。

彼时古希腊史有中译的近代论述只有苏联史学家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一书，是彼时高等院校历史系“希腊史”教科书的唯一钦定本，却不仅完全无法满足他的胃口还引起了更大的怀疑，读格罗托的《希腊史》很可能由此而起——书中数处提到了这一巨著。至于古希腊人自己写的自己的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则多年来就是他的案头书，几乎不用说到。

希腊史是顾准此生最为醉心的历史和政治哲学课题。仅梳理他已经面世的文字即可知道他读过的相关书籍有：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西谚有“人人知道荷马，谁读过荷马？”还好，有个中国人——顾准读过）；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19世纪末考古新发现的《雅典政制》；

希罗多德的《历史》；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色诺芬的《远征记》；

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英文版）；

J·B·伯里的《希腊史》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

大卫·佛里德里克·埃伦伯格的《希腊与罗马的社会与文明》和《巴苏陀古今史》（剑桥英文版）；

本杰明·法林顿的《古代世界的社会与政治》（剑桥英文版）；

亚里士乌芬尼斯（古希腊早期喜剧作家，诗人）（未见著作名）；

欧里皮德斯（希腊悲剧诗人）（未见著作名）；

埃斯库罗斯（希腊诗人，悲剧作家）（未见著作名）；

赫罗兹尼的《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

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

R. W. 梅肯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阿德科克的《希腊城邦的兴起》；

C. Я. 卢里叶的《希罗多德论》

J. B. 瓦斯的《早期爱琴文明》；

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杜丹的《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D. G. 荷格斯的《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

格尔顿乃尔的《早期雅典》；

亨利 ● 萨姆奈 ● 梅因的《古代法》；

H. J. 瓦德 ● 吉里的《多里安城邦的兴起》；

巴克尔的《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

爱德华 ● 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威 ● 恩 ● 弗 ● 瓦拉的《加纳史》；

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

作者不详的《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英文版）；

.....

这还没有将“北京日记”中许多处“Cambridge（剑桥）”字样的书目都排列进去，那至少应该包括剑桥版《希腊史》或《古希腊史》是毫无疑问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历史最悠久，学术水平最高的出版社。她出版的各国历史，各国古代史的品种之多和质量之高在这个星球上暂时还无出其右者。顾准日记除了记录他阅读过《剑桥东方史》之外，其他无数“Cambridge”字样中除了有关希腊史的著作，应该还有罗马史，非洲史，

美洲史、欧洲史、东方史和中国史的著作，这也是无疑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顾准通读了《剑桥古代史》。

这是一部极为浩瀚的史著。彼时北京图书馆可以出借的是十二卷英文版本，初版于1928年，后由英语世界及法、德等国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进行了长达30年的重写，由原来的12卷扩展至14卷19册，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的篇幅更是成倍增加，还将初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了公元7世纪左右。但是这个新版本顾准不大可能看到，在非常大的可能性上，他看的是1953年版，主编者正是写出了《思想自由史》、《希腊史》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的英国研究古代世界文明与思想发展的重要学者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 B. Bury）。在顾准最后的日记和最后的华章《希腊城邦制度》中，C. A. H.（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剑桥古代史》）字样曾多次出现，。

这部巨著至今也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

顾准将他读过的许多英语原版书的章节作了中译，例如《希腊的僭主政治》就是他译自乔治·格罗特《希腊史》的第一卷，第二部《历史的希腊》，第九章《希腊的僭主时代》的一部分，版本是美国图书公司（United States Book Company）1869年版，531-547页。他记录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美中不足的是所有面世的《顾准文稿》此处都错了一个章节号，将ch. IX（第九章）错记成了ch. X（第十章）。由于无法得见真迹，不能判断是译者顾准还是编辑者的错误。但出于对顾准文字、数字一贯严谨态度的信任，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相信这是编辑者的错误。

“北京日记”中像这样的读书——思考——落笔行文的轨迹太多了，举不胜举。

六弟敏之记得五哥到了最后的一两年，读书、译书、摘书几乎成痴。北图是三天一趟，一趟三本，译书的记录也是连篇累牍。他两年多的“北京日记”真是一本重若千钧的了不起的流水账，凡人如我，肃然起敬之余不禁望而生畏——要想将“北京日记”中的书目统统抄录一遍，把这些书的作者、年代、背景、观点做个简介，再和顾准的笔记、文稿结合起来叙述，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令人踟蹰不敢前行。

多年以后，当顾准被发现，其对历史的探索和解读得到中国知识界高度重视后，有人指责他探索希腊史所涉及的文献都不过是通俗读物，科普读物，依此而对历史作出的解读和反思都不过是肤浅的入门之说——你研究希腊不懂希腊文，研究黑格尔不懂德文，研究基督教不懂希伯来文，那就算不上“研究”，至多只能叫“入门”罢了，“推崇顾准的人也都不过‘还在教室之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仲维光《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云云。

对此，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不敢僭越妄评，只是有个疑问：假如当年顾准读的都不过是人家的通俗读物，可连这些科普性质的（如其所言）、浅薄的“大、中学历史教科书”咱自家的史学家们尚且无人看、无人读、无人写出有价值的书评和论文（不过也许他们都在“教室内”看、读和写，只是芸芸众生不知道罢了），却生生被一位会计学出身的人“独占了头鳌”。真不知道人家真正专业的历史文献当年和如今达到了何种高度，咱怎么赶得上！既然人家四十多年前的“大众读物”就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么在人家今日的、专业的高度下，咱自己的史学家们岂不是连“高山仰止”都做不到，只得借一句现成的俗话——“见到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去，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

写给胡兰成的照片背书这样的评价与其说是对咱自己知识界的“傲慢”，倒真不如说是对人家知识界的一种“欢喜得要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似的柔逊和崇拜。

顾准在写作《希腊城邦制度》的当儿，在中国，除了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对古希腊略有介绍外，又有谁像他这样对人类社会起源性的希腊城邦制度作过研究，写出过有分量的文章？这是个连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史学界也从未放弃过研究的大题目，根本性题目，更不用说西方史学界了。仅仅从顾准多次提到、引用并推荐给六弟陈敏之读的、前苏联史学家塞尔戈耶夫所著《古希腊史》，就用了整整一部的篇幅来描述“古希腊史的史料和编纂”在苏联时代的进展情状。什么都跟在老大哥后面学习的咱们小老弟，怎么就没有学学人家大哥这一点呢？就算是顾准的城邦希腊只能算个“入门”习作，能在这个时代写出这样的关于“民主源头”的科普性作品，难道不该受尊重反倒要受奚落吗？



来说点轻松的，放松一下。

“北京日记”里有几篇还是有“事物”和“事务”的。

“XI/4 做萝卜丸子”<sup>日记 73.11.4.</sup>。后面一句“胃病复发”，请读者原谅就“故略”了吧。想到他辛辛苦苦做出来萝卜丸子却可能因为胃疼而不能吃，真让人心里难受，再说也不符合“轻松”的标准；

“II/4 招待孩子”<sup>日记 73.2.4.</sup>。他招待的肯定不是自己的孩子们。那又是谁的孩子呢？哦，是那帮年轻人的孩子，四五岁的，七八岁的小姐姐和小淘气们。

被顾准唤作“大炮”的张曙光有个四、五岁的小女儿，当年最喜欢到顾准伯伯那儿喝“黑水”。小丫头不知道那叫“咖啡”，只觉得又甜又黑，真好喝呀。这位老伯伯又那么慈祥，说起来都够叫“爷爷”的了。

年近六十的顾准也觉得这帮小不点儿应该叫他爷爷了，可这样一来，小不点儿们的爸爸妈妈就得叫他叔叔，这个他们可不愿意。他们都非常尊重他，叫老师可以，叫叔叔可就有太“Naive”（儿童化）了。

有一天一个七、八岁的小小子看见这位年轻的爷爷——年老的叔叔穿着西装背带裤在院子里走，就问他：

“你多大？几岁了？怎么老穿这种裤子？”

“为什么不能穿？”

“小孩儿才穿这种开裆裤嘛，不过你的裤子倒是不开档。大人只有资本家才穿啊。”

他好像吓了一跳，接着就笑了，连眼镜片都显得亮了起来。

“不一定穿这种裤子的都是坏人呀，只要舒服就行呗。你不能问我几岁，应该问我几十岁啦。懂了吗小不点？”

“那天，他教导我一番后，还硬要我喊他‘爷爷’，而且我被他用什么办法说动了，喊了他一声。他异常兴奋。回家我跟父亲一说，父亲紧跟着也教导了我一番，说什么比父

亲大一些的要叫伯伯，小一些的只能叫叔叔。他虽然比我父亲大八岁，可叫爷爷还是过分了。从这往后，我一见他，老远就大喊他‘叔叔’，想用这办法气他。有几回我还突然推开他住的那间小屋的房门，一连串大叫‘叔叔’，每次都吓他一大跳。他总是一个人，身边没有别的人……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想起很长日子没有见到那个穿吊带裤的人了，一问，才知道他死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忧伤。那年我九岁……” 龙冬《想起顾准》

他爱孩子，他自己就是个孩子。

看他北京日记有趣之处：

“I/17 买鱼，炸鱼” 日记 74. 1. 17. ， “I/22 做年夜饭” 日记 74. 1. 22. ， “III/9 去医院，采购，做菜” 日记 74. 3. 9. ， “IV/29 炸鱼” 日记 74. 4. 29. ……。

你看，就算他孤家寡人一个了，有机会还是要改善一下生活。不过鱼炸出来，年夜饭做出来，肯定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份儿，那多麻烦，多没意思啊。学部里那帮年轻人（也都四十出头，不算年轻啦），今天是你，明天是我总要给这老单身汉送些吃的。还有那帮老朋友和他们的夫人们，更是心疼这位鳏，病，右俱全的老汉，所以顾准见天能吃上他们的红烧肉啦，腌笃鲜啦，红烧带鱼啦，鸡块啦什么的。东家北京味，西家江南味，南家四川味，北家上海味，顾准能光吃他们的吗？当然不会。但凡发了鱼票（那时几乎全北京人都只有带鱼和一种叫做“剥皮鱼”的鱼可吃），他必是精挑细选地买，认认真真的烧，东南西北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又快乐又温馨。

不过也有伤心欲绝的日记篇章：

“V/10 开始重写 ch. 6 买米，林荫路凭吊” 日记 74. 5. 10.

“重写 Ch. 6”——重写《希腊城邦制度》的第六章先略过不说，林荫路？对，就是林荫路，好漂亮的一条林荫路——南头是钓鱼台，北头是百万庄，路东是财政部，路西是它的家属宿舍，整条马路绿荫蔽日，尤其在北京的五月天。

那是他的旧居，也是汪璧，他的秀魂归离恨天之处。

那一天他并非形只影单，老友耕漠刚领到工资，特意请他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他知道他一向喜欢西餐，“老莫”又是他的最爱。不巧老莫客满，两人只得捱摸到一家小饭庄吃了顿饭。本来应该向东回学部的，顾准突然提出能不能向南走走，散散步。耕漠不解其意就跟着他向南，一直走到百万庄那栋家属楼跟前。顾准眼望三楼那个黑灯瞎火的单元，满脸哀痛，很久很久都不肯离去。耕漠这才恍然大悟，安慰着，劝慰着，轻轻地拉住他调转头来。

人间自有真情在，顾准最后的岁月既不灰暗也不冰冷，所有那个时代，他的时代的色彩——哀与乐，悲和欢，还有最要紧的——爱，他一样都不缺。■

（此文选自《顾准和他的时代》第十八章第四节）

## 【书 摘】

# 贵州故事

王晓林

1994年，顾准逝世20周年。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

天高皇帝远的贵阳。

不起眼的贵州人民出版社。

不知名的青年编辑杨建国。

一天，杨编突然收到王元化的一封荐稿信。字不多，未对所推荐文稿作任何评价，只

是希望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推荐的稿件——陈敏之为出版奋斗了二十年的《顾准文集》。

上个月，敏之刚经历了一次无情的“磋磨”和打击。

几个月前，他和上海学林出版社谈好了出版《顾准文集》的协议。事前说好了是自费出版，敏之准备好了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的个人积蓄，并且已经按照合同向出版社预付了第一笔款项。和前几次一样，稿件被交口称赞，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顺利得他都有些害怕。果不其然，发排前夕，责编突然打来电话，说以前在香港出版时抽调的两篇文章这次也不能放进去。

这个，敏之绝对无法容忍。这也是出版社的违约行为——交付书稿时必须保留所有篇幅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的。可是合同在“政治”面前算得上什么？连蚍蜉撼树都算不上。

敏之忍声吞气，一再磋商无果，愤而要求退稿退款。

怎么去责怪这些总编、责编、编辑们呢？身在模子中，当然要出落成模子规定的形状，你怎么能要求人人都做顾准呢？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十多年后，北三联当年负责人，连呼“奇书”却坚持退稿的责任人沈先生，在谈到拒绝出版《顾准文集》的不堪往事时这样坦承：

“我是一个怯懦者。有过应该允许‘跪着造反’的念头……感谢后来有同行将《顾准文集》印成书了……我所惭愧的只是，许多事没有按照列宁的教导认真去做。” 沈昌文《阁楼人语》

且不论跪着怎样造反，还要事前取得被造反者的“允许”，还只是自己自作多情地揣摩着他们“应该允许”，谁允许？列宁吗？“跪着造反”无非就是撒娇，撒娇在大多数情况下挨打会更凶，连小孩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人家对你说是“娘打孩子”，你请人家允许“跪着造反”，真是“民有与其相配政府”一语绝妙的注脚。

人性、人格被磋磨、压塑成这般模样，还有比这更悲凉，更滑稽的吗？

1994年，新的曙光初现了——王元化先生通过弟子胡晓明，胡晓明通过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弟弟，《顾准文集》辗转来到杨建国手里，又一颗“四万年结出的果实”，正正地、重重地砸在这位青年人头上。

建国对稿件的喜爱自不必说，十几年间七七八八哪家出版社也没有一个人对文稿本身说三道四过。建国的可敬可贵在于他几乎立刻就决定自己一身担当起来——这文稿太“各色”了，终审很难通得过。那边反正反正主要听我这个责任编辑的，我先满口称赞起来再说，关键地方就含含糊糊、云山雾罩、春秋笔法混过去，书先出了再说。大不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时候再说吧。

就这样，没有费一点周折，贵州社就火速承诺出版此书并马上与陈敏之签了协议。依然是自费，但是贵州方面说好假如销售情况乐观，出版社将以稿费或版权费的名义返还费用。

签字之前，经历了多次伤心和碰壁的陈敏之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已如实告诉对方这部书稿的全部遭遇和自己的底线——不允许任何未经同意的删砍，竟然还有这样的回答。接着就是很戏剧化的场景：

上海那边，陈敏之先生攥着电话听筒的手在颤抖：

“真的一字不删，一字不改？”

贵阳这边，杨建国先生毫不踟蹰，斩钉截铁：

“真的一字不删，一字不改！”

“真的吗？真的吗？”

“保证！保证！！”

陈敏之大喜过望，转身就把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汇了过去。贵州社也不含糊，12月就让投稿人看到了样书，那两篇最扎眼的——《清谈馆》和《终极目的》赫然排列其中，一字未删，一字未改，责任编辑：杨建国。

敏之，义弟也，建国，侠士也，美哉，壮哉。

书出来了。字数：354千字；开本：850X1168 1/32；印张：14.125；定价13.8元；199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册。书是浅绿色封面，无图，装帧一般，用纸一般（反面的字可以清楚地在正面看到，反之亦然），印刷一般。总之就书的本身而言，质量不高。

可在中国出版史上，它已命定是一本不一般的书，是一本可以入史的书，是一本罕见的优质书。正因为它的“一字未删，一字未改”，这本书至今都还在被盗版，其收藏价值早已大过书籍本身。来看看后边的故事。

《文集》第一次上订货会是在武汉，居然一本都没有卖出去。毕竟贵州偏远，贵社名气小，订货会很难引来北京上海的客户。可没多久，大买主来了，就是原来最先拒稿的北京三联书店。北三联开口就要300本，十来天后就要求添货。书商们说是也不知为什么，许多人今天买了明天又来买，一次买好几本；北京著名的万圣书店，老板刘苏里一个电话打到贵州，坚决要求做北京地区的独家代理，一次就订货4000本。

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倏忽间的洛阳纸贵，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此后贵州社发行部电话就没断过，都是索要者和书商。库存很快告罄，只得不断加印。到了1995年9月，也就是一年之后，贵州社已经是第四次印刷《文集》，印数达34000册。

责任编辑杨建国，光是读者来信就收到一麻袋，大都是感谢他编辑出版了《顾准文集》。

那年那月，大城小城，尤其京城，一时间除了央视，没有不谈顾准的媒体。接着最有趣的故事来了。

先是出版社总编被召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开吹风会，局长指名道姓严词质问：

“请问贵州的老总，一本学术著作为何如此走红，畅销？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你从前见过这种情况吗？都是些什么人在热捧这本书？奥妙在哪里？”

一连串“义正言辞”的发问排炮般砸来，总编有点发懵，连规矩都忘了，不识趣地问道：“局长同志，《顾准文集》有问题吗？”

局长更加声色俱厉：“是我在问你，请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好，事情发生在1994年，不会有两个穿制服的人立刻就从旁门走出来将被质问的人“押下去”，反倒是局长有些底气不足，把原该在会议室里的话拿到电梯里说——

“回去就封存，不要再卖了”，“我可是在电梯里，不是在会上说的啊”。

聪明、机智加机灵，滴水不漏！

可你要真是以为就此不卖了，封存了事儿就了了，那就又太低估“专政”的威力。

北京这边和风细雨，贵州那边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先是图书处接到神秘电话：

“不要问哪里打来的，不要记录。通知有关《顾准文集》的两件事：1. 不再发行；2. 不再印刷”。

紧接着，三个穿便衣，腰别小枪的人找到责任编辑杨建国，整整谈了三天的话，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细节，所有涉及的人物名单。临了倒是宽慰杨建国，“你没什么大事，但这件事你不可说出去，更不能对媒体说。”

撂下这几句话便衣们就走了，至于小枪嘛，不必害怕，只是吓唬吓唬你，明知你一介书生是不经吓的。

这是发生在1994年的事情，距今仅仅二十来年。

最后的结果是，“你没什么大事”的杨建国先生职业生涯受到重大挫折，“政治上的不正确”导致了他“经济上的不景气”，名利双失——高级职称泡了汤，收入当然不会提高。二十年后，杨建国先生估计不会再有“别着小枪”的人找他，这才把这些“不该说的话”也说了出来。

如今有些相关顾准的文章，很自豪地宣称自己转录顾准的文字来自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转录者的用意十分明显的——我用的是没有被阉割的正宗。反倒是晚至2007年出版的“市场版”《顾准文集》，编者依然在顾准最精彩的话语上动刀动斧，不信你去核对1994年版的“贵州版”和2007年的“市场版”。

如今1994年9月的“贵州版”在旧书市场上已经绝迹，原价13.8元的书被叫到50元依然有价无市——盗版者早就下手了。■

【评论】

## 顾准是一面镜子

——读王晓林《顾准和他的时代》

王三义

认识王晓林，缘于共同话题“顾准”。2014年冬天，丁东先生邮件告知，有一位顾准研究者想和我联系，很快，我就收到素不相识的王晓林的信。说实话，我只是读过《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顾准遗作，喜欢收藏关于顾准的文章和书籍，算是个“爱好者”。王晓林和我在邮件中讨论顾准著述中一段熊彼得文字的翻译，我和她看法一致，但她询问和请教其他人之后，发现我和她的看法未必正确。她那样认真甚至较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不久，她把新著《顾准和他的时代》的打印稿寄给我。这部近70万字的书稿读完之后，收获不小，在佩服王晓林的毅力和见识之余，也让我认识到，以前对顾准思想的了解，既不深也不细。当时随手写下几段感言，后来忙于杂事，未能写成一篇完整的读后感。转眼一年就过去了。2015年《顾准和他的时代》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今年正月我拿到王晓林的赠书，再次翻阅，欣喜而又感慨。

作为一名普通的读书人，对书的选择有我个人的标准。凡是用生命换来的文字，无论如何要阅读，最好是收藏；凡是不为出名、不为报酬而写的书，尽量搜罗来认真阅读；凡是素心人所写的心里话，多阅读多收藏。王晓林退休后才读顾准遗作，历经6年写成《顾准和他的时代》时，已年过六旬，一非作家，二非学者，该享受安闲的年龄，名利于她已如浮云，辛辛苦苦图个什么呢？无非是被顾准思想的魅力所打动，多年阅读和思考，欲罢不能，顺着自己的思路写出来，呈现给喜欢顾准的读者，就这么简单。

—



知识界评价顾准、探索顾准，至少有二十多年了，顾准的真知灼见，也得到学界认同和赞赏。已出版的《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和《顾准笔记》，把顾准生前留下的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回忆、评论、研究顾准的文章有百余篇，传记也有罗银胜的《顾准传》和《顾准评传》，高建国的《顾准全传》，吕铮的《非如此不可：顾准传》等，论著有蒋贤斌的《出走：顾准思想研究》。那么，新的关于顾准的著述，究竟从何处落笔？着眼于哪些方面？重点写什么呢？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成书由来，王晓林在自序中有交代。她在准备写孙冶方时，才知道有顾准这个人。她阅读顾准的文字后受到震动，才找来顾准所有的文章、日记和“自述”，深入阅读。这一读就放不下，顺藤摸瓜，把顾准提到的著作也找来阅读，读不懂的向别人请教，长时间沉浸在对顾准的探究中。在王晓林那里，当她弄明白了顾准这个人和他的思想时，顾准也改变了她。按她的说法：“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读过顾准和未读顾准，你可能会感觉到是不一样的。”。

王晓林和顾准意外“邂逅”，阅读中有精神享受，也有困扰。因为顾准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任何一个想要把握顾准思想的人，会感到自己知识库存不足，王晓林工科出身，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问题在于，读懂了顾准（至少自认为读懂了），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一部好书来。我身在高校，知道专家学者们的文章和著作是如何“炼”成的。王晓林要写顾准，如何做到不炒冷饭，完全取决于她认识顾准其人其事的深浅程度。

我拿到《顾准和他的时代》，带着挑剔的眼光，先寻找作者对顾准的基本判断。王晓林说：“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你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而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辨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在罪恶面前十分警醒和桀骜并苦苦追问着人性的悲悯者。”（《顾准和他的时代》自序）。从这个判断看，王晓林至少对顾准本人和顾准思想能达到“了解之同情”。再接着看，王晓林认为：“顾准下决心做一个历史的观察者和探索者。没有同行的伴侣，更没有团队，他无心、无力呼朋唤友以壮声势和胆量。他要做，也只能做一

个孤独守望的观察者，单兵掘进的探索者。但细读顾准，会发现他立志要做‘独行侠’的想法并非出于无奈而更像是有意识地要远离一种什么东西。假如不是‘独行’，这个东西就会如影相随，它会妨碍、阻拦直到毁掉他读史、研史、解史，前瞻的进程计划。”（《顾准和他的时代》第181页）。这个判断，很到位，也有深度。没有长时间的思索，不熟悉王元化、李慎之、李锐、朱学勤等人的观点，她是说不出的。

这就清楚了。王晓林的目的，不是感叹顾准的命运和遭遇，不是在平面上讲述顾准有什么思想，而是要探究：顾准为什么有“一个独特、自由和成熟的心灵”？顾准的精神未被非人的环境摧残的根源是什么？顾准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这样一来，王晓林的着眼点必然与其他人不同。第一，她注重思想层面，凡是涉及影响顾准思想变化的因素，时代的、个人的，偶然的、一贯的，都经过仔细搜罗。第二，她关注“世情”和“人情”层面的分析。

很明显，王晓林要分析顾准思想的形成，对顾准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人，她都不会轻易放过。为了弄清楚顾准交往过的这些人，她又额外花时间找资料，甚至访谈。在王晓林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是不是有趣，要看他一生中身边出现过的人是不是有趣”。在《顾准和他的时代》中，重点写了顾准的小姑母陈庆志、校长潘序伦、上级领导林里夫、刘长胜、挚友孙冶方、妻子汪璧、弟弟陈敏之、同事张纯音、小辈吴敬琏、赵人伟等。在王晓林看来，不管谁探索顾准、评价顾准，都不应在赞扬他的同时贬低他周围的人。况且顾准身边出现过的人，都不是无知无识的草莽人物，他们几乎个个都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或比较出色者。（《顾准和他的时代》第191页）。

同时，王晓林还有一个看法，她觉得顾准的精神世界与众不同，一个源头是基督教的影响。在书中，她花费较多笔墨，写顾准最早什么时候接触基督教，什么时候开始读《圣经》，在困厄中，顾准为什么把《圣经》带在身边，尤其是，顾准收藏了好几个版本。就我所知，其他的顾准传，都没有像《顾准和他的时代》这样，把顾准读《圣经》一事提到一定高度来谈。仔细一想，顾准的容忍气度、顾准的悲悯情怀，若是归因于基督教思想对他的影响，

一点也不牵强。

从王晓林的著述来看，她不仅要“走近”顾准，还要“走进”顾准的世界。

## 二

王晓林并不把她的书定位为“顾准传”或“顾准评传”，而是定位为“解读顾准”。若以学术语言表达，就是“顾准及其时代解析”，而这往往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定位。但是粗略地看，作者写顾准一生的经历却像常见的人物传记，又因为突出了顾准个人生活片段及重要“事件”，像史学体裁中的“纪事本末体”。仔细阅读全书，就发现作者还有一个目标：探索顾准精神层面的丰富性，考察顾准思想走向成熟的维度。也就是说，作者要从时代、个人、精神三个维度完整地解析顾准的一生。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这种对顾准的立体式“解析”。

全书分四部，含二十二章。第一部题为“人的命运”，即从1915顾准出生到1952年被免职；第二部题为“受判之徒”，写了顾准被判为“另类”、“异端”的十年艰难历程（1952-1962）；第三部题为“天才之为责任”，从顾准1962年重返中科院经济所，到1972年结束“五七”干校生活；第四部题为“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专写顾准最后也是思想最终成熟的两年（1972-1974）。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四部中，每一部各有侧重。第一部按时间顺序展开，但有“跳跃性”，把顾准37岁前的经历，连同人物、事件，根据需要做了取舍。比如，“家国时代”一章，大跨度地交代了顾准求学、供职、成名等经历；“浪漫与革命”和“革命远不是浪漫的”两章，突出重点人和事，也写了顾准内心变化；“毕竟是书生”一章主要是顾准在新四军队伍中的革命活动，以及解放初在上海任职。这一章涉及内容庞杂，回顾、旁证、追述，加上作者的评论，头绪很多。第二部和第三部包含的信息量大，探究的问题多，融入作者的情感和见解，夹叙夹议，内容丰富、厚重。第二部有八章：“老虎、罪孽与逻辑”、“你如此肯定的东西是真的吗？”、“事情正在起变化”、“《试论》”、“事情已经变

化”、“1959之殇”、“饥饿大地”、“惯于长夜”，第三部五章：“苦旅驿站”、“珀里斯与政治”、“永不‘成熟’”、“狰狞岁月”、“新生日记”。第四部涵盖的时间只有两年（1972-1974），内容详细，分五章：“生命如醴”、“鼙鼓无声、理性争鸣”、“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希腊心灵的形式”、“籽粒落下”。单从各章节的标题看，有的凸显趣味，有的画龙点睛，有的意蕴深长，可见作者独具匠心，倾注情感，对顾准的个人生活、时代特征、思想变化等素材烂熟于心，为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费思虑、细斟酌。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作者勇于触碰顾准笔下那些敏感的话题，言他人所未言。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是顾准对恩格斯的质疑和批评；二是顾准关于“僭主”的论述。

《顾准和他的时代》的第十九章，有三篇题为“西奈山的上帝”，分（上）（中）（下）。如果只看题目，还以为是讨论基督教问题，实际上是在阐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和评价。顾准推崇马克思，尤其推崇他《资本论》的第一卷，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来对话、请教、探讨。当涉及具体的争议时他甚至常为马克思开脱。但这并没有妨碍顾准对马克思某些观点的质疑。而顾准对恩格斯的质疑则要多得多也严厉得多，尤其是《反杜林论》提倡的暴力，《自然辩证法》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后又回到黑格尔以及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粗暴而粗糙的“范式化”等等。顾准对恩格斯的批评毫不留情。

第二十一章题为“希腊心灵的形式”，不是探讨希腊文化与宗教，而是探讨雅典的政治制度。在原稿中，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是合在一起的，标题为“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即第二十章的标题），内容分9小节。出版社时做了调整，“希腊心灵的形式”共4篇单独成章。前3篇分别探索了“自由与奴役”、“契约精神”、“僭政与民主”，最后一篇他“卡了壳”——伯罗奔尼撒战争毁了雅典的城邦民主令他心痛不已，他写不下去了，笔触毅然转向了耶路撒冷——从《新约》由希腊文首创开始，准备书写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可惜上天没有假他以时日，《希腊城邦制度》成了永远的残篇。

顾准对希腊制度的研究，包括对“自由”、“契约”、“民主”的认识，研究者早已评论过了，但顾准对“僭主”和“僭主政治”的认识和评论，从没有人谈，也不敢“碰”。

王晓林大胆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在顾准研究中还是第一次。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评论“希腊僭主”，而是把它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看。顾准发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也类似希腊“僭主政体”，中国历史上那些“奉天承运”的开国帝王，实际上是不同年代的僭主。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僭主”概念，是因为那些史官和圣贤们为僭主写赞颂歌、出海报，编织谎言，把消灭对手后获取地位的君王们都装扮得完美无比。

第三个特色，是《顾准和他的时代》中对顾准生活的时代，对顾准思想形成，有许多新见解，全书好在“洞见”，好在细节。例子太多，没法一一列举，读者可以慢慢品读。但有一个细节，读后难忘。作者写到：1936年2月从流亡地北平回到上海，顾准开始尝到革命不太浪漫的另一面的味道——革命不是他当初想象的那么纯洁浪漫，而是一件特别繁复，特别混乱且很难厘清的一件事情（第58页）。顾准在书本知识尤其和数、逻辑有关的知识中，常常能很快就掌握规律，可在“革命”这一“事和物”中他有些茫然了。看到内部斗争的激烈，远远超过外部当局的重压。（《顾准和他的时代》打印稿第74页，出版时被删去）。这样的细节，其他的顾准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大概没有注意到。

### 三

读完《顾准和他的时代》，忍不住会问，顾准的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王晓林分四个阶段写顾准的时代，其实只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荡的时代”（1915-1949），第二阶段是“新社会新时代”（1949-1974）。“动荡的时代”人才辈出，“新社会新时代”（尤其1957-1974年）则把动荡时代成长起来的无数人才摧残殆尽。在回忆顾准、研究顾准的众多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黄一龙的文章。

黄一龙2005年发表的文章《有很多顾准》，虽然篇幅不长，但写得很深刻。黄一龙以“反推”的方式，指出：在文革中能够把思想表达出来并被保留下来，可能性很小，概率不过十分之一吧，那就表明，至少有另外九个顾准没有留下他们的思想；像顾准那样未被整死，在“苟延残喘”中钻研真问题的概率假如是百分之十的话，那么，至少另外90个顾

准被“全面专政”了；换句话说，当那场动乱开始时，我们中华民族至少能有一百位顾准；再往前推，1949年时，“中共或中国或中华民族，至少拥有几百甚至好几千个潜在的伟大思想家；如果不对他们实行逆选拔逆淘汰而让他们也‘从此站起来’，我们早就会迎来一个诸子百家蜂起、鸿篇巨制纷呈的伟大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又何至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顾准偷偷摸摸研究‘希腊城邦’，何至于麻烦那么些博士博导偷偷摸摸抄袭外国论文来‘繁荣学术研究’”！（黄一龙《有很多顾准》，刊于《海上文坛》2005年10期，收录在罗银胜编《顾准再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7-259页。）

《顾准和他的时代》写的“时代”、“个人”、“精神”三个层面中，“时代”这一层，王晓林要表达的观点，与黄一龙是相通的。中国从来不缺人才，缺少的是适合人才生存的环境。在那个年月里也许还有人像顾准一样思考过，但没有写下来；或者写下来了，但被毁掉了，没有留下来；或者留下来了一些，但没有得到重视、介绍和流布，默默不为世人所知。顾准的遭遇是不幸的，但顾准思想被留下来是侥幸的事。没有一位陈敏之那样的弟弟，顾准和谁去谈那些敏感而高深的问题？要是1972-1974年所写的读书笔记和书信没保留下来，谁还知道顾准思考了哪些问题，有何见解？如果没有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李锐、赵人伟等人，顾准思想的价值如何得到认可和发扬，为知识界所知？赶不上文化饥渴的年代，《顾准文集》还会一版再版吗（即便有些关键的删割）？按照一般规律，如果没有时代呼应，思想家即使产生，也等于和没有产生一样（易中天的话）。

那么，这个时代还需要顾准吗？今后有人记得顾准吗？

自《顾准文集》出版（1994）后，顾准思想才引起学界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个“顾准热”，后来的趋势是，关注顾准的逐渐少了。2015年顾准百年诞辰，多了一些纪念文章，也出版了罗银胜编选的《顾准追思录》、《顾准的后半生》等，但在学界，顾准的话题毕竟只限于少数学人圈子。王晓林撰写《顾准和他的时代》耗时费力，出版又颇费周折，以致于忍不住发问：我写这样一部书意义何在？还有人愿意阅读吗？

这个问题，早在1995年高增德、谢泳、丁东、赵诚、贾秀文讨论过。谢泳指出：年轻

的知识分子比中老年知识分子对顾准更钦佩，因为，中年知识分子可能认为顾准是一个特例，不能学；更年长的一些的可能觉得顾准走得太远，他的一些思想至今无法接受；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这些思想障碍，而且所处的环境更宽松些。贾秀文指出：“在今天的环境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能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保持健全的人格，都是严峻的课题。在这方面，顾准永远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镜子。”（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中国又走过了21年，“学术成果”从数量上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国家重大项目、重大课题花去了无数经费，但知识界产生多少新的思想呢？谁敢说，今天中国的思想界不再贫乏了。只要顾准思考的问题没解决，只要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思想家，顾准就不会过时。

顾准的思想是关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顾准的思想火花中，在某些人看来“犯忌”的，无非是这样一些：（1）斯大林主义大行其道，与一党执政的状况有关系，解决方案是“多党制”（顾准在60年代初提出）；西方式的民主就算是粉饰门面，就算是欺骗，但是，两党制总比一党制强，比权威主义要好些，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就保有了对权威或者威权的制衡能力。（2）直接民主行不通，而“民主集中制”有问题；“集中”实质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顾准认为，要建立民主，必须确立科学为民主前提的意识，即，只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民主。（3）“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4）顾准厌恶对“大一统”的迷信，指出：“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人类进步到现在，确实完全办得到。”（《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顾准认为：一元、多元各有利弊。打仗、推翻旧政权，集中统一的“一元主义”具有优势。但取得政权后，面临的任務不同了，是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文化水平，不走多元化道路就走不远了。哲学上要多元主义，政治上也要多元主义。顾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是着眼于未来，希望建立一个不服从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

独立思考是学术研究者的基本品格。顾准的人格和品质，是知识界任何时候都不可或

缺的。21世纪里，吃饱喝足专门搞科研的成千上万的教授、博士们，与可怜的一个顾准不在“同一个世间”。中国知识分子出国机会多了，加上网络资讯的发达，真的与国际接轨了，时髦的学问都引进来了，这应该是进步，但我们恰恰缺了一样东西：“必须死心塌地地钻下去”的精神。顾准认为，“不做长时间的科学的劳动，而以一两个无须证明的定义来构成整个体系的所谓科学工作是不值钱的。”“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子，碰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这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5页。）我们国家庞大的科研“队伍”中有多少人愿意“死心塌地地钻下去”？

还是贾秀文那句话说得好：顾准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照出人的怪态和丑态。且不说顾准那个时代的施暴者，极左权威的追随者不愿听到顾准的名字，不敢直面这面镜子，即使那些当年的受害者，许多人也变得见风使舵、明哲保身、胆颤心惊、畏首畏尾，在这面镜子面前显得黯淡猥琐。即使今天学界的许多所谓成功人士，读书和做学问的环境比顾准的时代好得多，但被商品时代的虚浮风气裹挟，缺少深入思考，通过亲近权力而垄断学术资源名利双收，但心里清楚自己的学问有多大的含金量，又有几人敢堂堂正正站到这面镜子面前？朱学勤曾说中国知识界“愧对顾准”：“我们不仅愧对他的研究条件，更愧对他的胸怀，愧对他以民间苦难为动力，知难而上甚至迎难而上的境界。我们远离了那个时代，这是幸运，但在精神气概上，我们离顾准的境界似乎也在远去，则未必是幸运。”（《愧对顾准》《新京报》2005年7月24日）。

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了解那么多历史细节之后，更感到我们真的愧对顾准。首先，人才自由发展的环境还没形成；其次，顾准的精神境界和气概在当下中国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精致的功利主义者”（钱理群）的即兴表演。而且，把“领导批示”作为科研业绩考核标准的各类“智库”。这将把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研究带往何方，让人忧虑。

关于顾准，邵燕祥二十年前的文章中的话，至今有意义。他说：“我有什么资格来谈顾准呢？”“满城争说顾准未必是好事。几乎所有满城争说的人和事，到头来都成为过眼



烟云，因为赶时髦的人一来随梆唱影，难免热闹一番完事。”“而沉思的顾准，需要习于沉思、甘于沉思的人的理解，也只有好学深思并勇于探索的人能够接近他，同他对话。”

（邵燕祥《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原载于《天涯》1996年2期，收录于《顾准寻思录》）。

今天满城都不说顾准了，正好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一下《顾准和他的时代》。

#### 四

读《顾准和他的时代》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本书的整体结构显得松散。其次，不应该出现“人称”的转换。如，全文大部分是第三人称，但第十一章“饥饿大地”为了叙述方便，改用了第一人称，这一章结束后又回归第三人称，显得比较突兀。其三，语言表达方面，主体部分是冷静、凝练、平和的语气，但某一些篇章和段落，“笔锋带感情”，修辞手法变换，像抒情散文，显得格调不一致。

关键是，本书的写作手法有点“率性”，把读者假想为全部读过《顾准文集》《顾准自述》《顾准日记》的人。作者随手摘引顾准的文章、日记、自述，某个具体问题还没收尾，却引出另一个话题，不能回到原来的思路。在作者那里，对笔下的题材顺手拈来，挥洒自如，但读者如果未阅读顾准的文集、日记和自述，会跟不上作者的思路，至少感觉读起来吃力。再加上是繁体字出版物，估计年轻人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本书作者并不是一位社科界学者而是一位退休的通信工程师，第一次驾驭这样的题材已经很难为她了。

说到具体观点，在王晓林看来，顾准年轻时立志做一名“职业革命家”，但他后来明白自己不是那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革命家，他真正要想做的是一名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虽然他从未说出口。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顾准真正想做的是社会实践家而不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尽管他被抛出体制，变得孤苦无助。他深入阅读中西历史，研究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致用”。即便天假以年，他研究的成果，也许不会是纯学术的巨著，而是类似于梁启超1916年撰写的《国民浅训》的作品，是一种实用的政治哲学原理。梁启超向民众灌输共和国的国民基本权利等常识，起到了反对袁世凯复辟，促进国民觉醒

的作用。而顾准的研究成果，估计也会以启蒙为目标，引导民众走出历史迷雾，纵然追求自由平等而不得，至少能做到用每个人自己的头脑思考——独立思考。

当然，对《顾准和他的时代》的不同看法，可以和王晓林进一步交流。我写读后感，是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并阅读《顾准和他的时代》。

（原载 香港《明报月刊》2016年）

## 【书评】

# 中国越来越需要顾准

陈申申

## 一、神话与悲剧

王晓林关于顾准的近六十万字的新作让我们再次想起了顾准。

讨论中国经济和体制改革，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聚焦在了这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顾准。

顾准，是从三十年代上海滩十里洋场产生出来的对现代经济有着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共产党员。

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当时远东的金融贸易中心。世界进入现代工商文明时代以后，全中国在上海，而且只有在上海，曾经有过完整的现代政治经济的制度建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海产生出了成批的有世界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思想家、理论家，和实干家。顾准就是其中之一。

顾准，会计学出身。会计知识让顾准对经济和政治的理解别具慧眼。对顾准来说，会计就像放大镜，能把政府和企业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观察得细致入微。会计又像望远镜，能把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全局尽收眼底。会计学为顾准的一生，带来了事业的成功，也带来了人生的不幸。

因为会计学的才能，顾准年仅十三岁就让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始人潘序伦先生慧眼识英雄，进入学校，开始了会计的教学工作。十九岁就受聘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银行会计学的教授，用的是他自己编写的教材。同时他还在银行任职。他是三十年代上海的金融管理中以年轻有为著称的能人。

抗日战争期间，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他又是少有的经济专家。解放战争期间，他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在根据地一手创办了利丰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从做棉纺织生意开始，把生意做到了上海，继而又开办了淮通盐号，宏济外贸公司，大成贸易公司，等等。他在外人眼中是腰缠万贯的阔老，自己却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他把赚来的巨款都交给了党组织，支持军队。他的战友感叹地说他，真是对得起天地鬼神啊。

解放军进上海前，顾准是对干部战士进行入城教育的老师，所用的教材都是他一手编制的。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他是上海经济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并担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年代，也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值得注意的年代。因为顾准运用他的会计知识，在上海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现代税收制度。

解放初期，上海市政府里有大量新人，还有很多国民党政府的留守人员。可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顾准亲自主持会计审计的技术培训。他手把手的教学员。他教会学员们的查账方法，能够用很高的效率来核实企业的会计帐目。在顾准的主持下，刚刚建起来的税务局就能把全上海所有的工商企业的财务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看看现在，不论走到哪里，政府和企业都面对着一堆烂帐糊涂账，又无可奈何。两者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通过他的会计理论和实践，在上海实行了按照收入比例征税的现代税收制度。顾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现代税制付诸实践的人，因而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让国家生活走向现代管理的人。可是，顾准却因此而身陷逆境，不仅被开除党籍，还独一无二地被两次打成右派。在身处逆境的年代里，顾准关于商品经济的见解，开创了新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在最后的黑暗日子里，他仍然无一日不在以世界历史为背景，从理论上探讨中国的未来。

顾准，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上铸造，四十年代在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里打磨成功。他的会计知识和他的又做共产党，又当过公司老板的经历，让他开启了历史，也只有他能这样开启历史。

顾准是以自身的努力，力图创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让中国走出王朝更替的历史轮回，朝着现代社会迈步的历史巨人。他的努力虽然失败了，可是却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顾准的出现，像一个神话。是上天赐给中国人的神话。

顾准的结局，是一个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 二、争论的焦点

顾准被开除党籍。后来又绝无仅有地两次打成右派。他为什么那么遭人嫉恨？他究竟犯了什么“错”？

他的“错误”，简单来说，就是在他担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的时候，坚持“查账征税”。也就是说，政府要依法征税。在税收过程中要以会计账目为依据，按照比例征税。在事实面前，纳税人有权利和政府官员论长短，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现代社会通行的做法，也是顾准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根据地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经验。

顾准是会计出身，精通会计做账查账技术的每一个细节。自己又做过公司老板。在他看来，政府应该和工商业者充分协商，形成法律。只要把会计账目做清楚，就可以依照法律，有效的管理工商业者，实现政府的税收。

在顾准眼里，法律是社会公约，而不是政府压制老百姓的工具。在法律面前，政府官员和工商业者是平等的。政府依法征税，不允许多收税，更不允许违法摊派。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权利，同时有效地防止政府的腐败。工商业者有权利拒绝一切没有法律依据的收费。这样做，不是在对抗政府，而是在监督政府，帮助政府。只有这样的制

度才能做到发展经济，藏富于民，扩大政府税收基础。

顾准的主张，有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的经验为依据。抗日战争时期，在被战争蹂躏过的一贫如洗的土地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努力发展经济，支持了军队作战，还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当时的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尊重和保护个人的产权，就是藏富于民，就是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从而获得人民的支持。在根据地里，军民是鱼水关系。没有苏联教科书上的空谈，没有来自高层的瞎指挥，没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噪。为了抗日，万众一心。处处可见的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底蕴，和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工作。

抗日根据地获得的经济成就，是世界顶尖水平，是今天的西方世界都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一旦有战争，哪个不是政府债台高筑，社会经济崩溃？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真正的人民政府，可以在战争中发展经济，越战越强。

在现代国家，税收的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最重要的法律。税收是政府的财政来源，是活命钱。税收关系就是政府和社会大众关系的直接体现。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失败的时候，有的地区提前收税，已经收到了一九七二年。如此无法无天的政府，怎么可能不完蛋？

抗日根据地的政府也要收税。共产党以诚信待人，办事公道，所以在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在战争年代，支持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可是，人民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共产党。当年共产党的感召力，无人能及。顾准自己也是这样成为共产党员的。顾准看到，中国的工商业者在敌人的枪杆子威胁下都能支持共产党，是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获得了政权以后，工商业者没有理由反而要去反对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一如既往的信守承诺，就会永远得到人民的支持。

和顾准的主张直接对抗的，是薄一波的“协议征税”的主张。在薄一波眼里，政府收税无需法律，也不需要看会计账目，只要和工商业者开会协商，摊派下去就可以了。工商业者必须在协商会上做出承诺，各自认捐，这样就能完成政府税收了。这完全是一付老子打天下，天下就是老子的架势。谁是人民？谁是政府？老子就是人民。老子就是政府。要

从此处过，留下买路钱。这种做法让政府官员权力不受限制，腐败随时都在发生。工商业者没有法律的保护，苟且偷生，人人都想尽办法钻空子，找便宜。表面上对政府官员阿谀奉承，背地里都以能够“摆平”政府官员为荣耀，或者干脆就把政府很得要死。

薄一波以中央的名义号令上海，要求顾准改变做法。顾准的反驳直指要害：共产党还要不要遵守和工商业者的承诺？工商业者的利益要不要保护？一九四九年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协商确定的共同纲领还算不算数？

在财政工作中，是挑不出上海的毛病的。但是，薄一波完全不相信，也完全看不懂顾准。薄一波要在经济领域执掌大权，可是对会计又一窍不通，对现代经济连入门都没有做到。他就像一个常败将军，打了一辈子仗，也还只会打败仗。要讲道理，薄绝对不是顾准的对手。但是，搞阴谋诡计做坏事，他比谁都能干。薄到处游说，给顾准扣上的帽子是向资产阶级投降。

在薄一波看来，顾准允许工商业者和政府税收官员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可以用事实和法律来向政府讨公道，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这还了得？这天下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你敢跟老子论长短，老子就要你的命。心里这么想，嘴上说的就是阶级斗争的大道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是你死我活，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利用法律来和我们做合法斗争。法律都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伞。等等。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年代，这些罪名都是可以杀人的刀子。

连顾准都没有想到，他的会计知识，以及建立在会计基础上的税收制度，挑战了某些党政高官的个人权威，击中了他们的要害。顾、薄之争，揭示了新中国不同的发展方向。

顾准的道理是能让共产党胜利的道理，也是已经让共产党胜利的道理。反对顾准的人，没有一个人敢直面顾准的质问。最后只能用阴谋手段，让薄一波一个人到上海，连上海市委都不告知一声，就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开除顾准的党籍。

顾准倒下了。中国的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而停止了。

### 三、噩梦从哪里开始

在延安，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是政治？他自问自答的说，政治就是让自己人越来越多，让敌人越来越少。当年的共产党很会交朋友，还会化敌为友。这是共产党胜利的法宝。

交朋友需要有共识。干大事业，更需要共识。

一致抗日，曾经是全党共识，全民共识。抗日战争时期是共产党发展的黄金时期。坚持抗日共识，不讲阶级斗争，不杀地主富农，保护工商业者。与人为善，与友为善，与党内同志为善，社会各界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党内军内也都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尽管抗日战争残酷血腥，可是大城市里的有志青年还是纷纷来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参加共产党。生活虽然艰苦，可是，从来不搞大跃进，所以不会象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样连饭都吃不上。那是一个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年代。建国以后，共产党一次次的残酷斗争，胡乱折腾，屡屡摇摇欲坠，还能重新站起来，就是因为大多数干部的心里还有着抗日根据地里的鼓舞人心的回忆和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是是全党和全民共识。

可是，革命胜利以后，什么是共识？没有了大敌当前，怎样寻找共识？信奉斗争哲学，就要找到敌人。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还要继续革命。

根据苏联的教科书，首先，就是要打倒资产阶级，把工商业者当成敌人。以后又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当成敌人。为了消灭敌人，就要消灭敌人的朋友，还要消灭敌人的朋友的朋友。于是，过去的朋友成了敌人，自己的战友也成了敌人。敌人越消灭越多，自己就变成孤家寡人了。

这样考虑问题的人，见了谁都充满敌意。到处都不受欢迎。你把别人都看成是敌人，别人还能不处处提防着你？处处不招人喜欢，他们更不会互相喜欢。四面碰壁，阶级斗争的理论就在他们的心里得到了证实。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都会在他们心中瞬间就会变成敌人。这样的人去治理国家，就国无宁日了。

把工商业者当成阶级敌人的，不只是薄一波，而是共产党高官中的一批人。共产党当政以后，他们用自己的无知和跋扈，在大半生的时间反反复复的只做了三件事，那就是：祸国，殃民，和害自己。做了坏事的薄一波，也好景不常。几年以后，在权力斗争中败落。以后又在文革中被诬告为六十一个叛徒大案的首犯。文革后复出，成为八老之一。打击胡耀邦，他成为万人所指的首恶。

顾准之争，是君子之争，不是生死之争。所争的是事实，是见解，是办法。那些薄一波们所争的，是权力之争，阴谋之争，你死我活之争。他们所争的不是真相，不是道理，是唯我独尊。

上海，是近代史上始终能对全国产生关键影响力的地方。顾准在上海，身居要职。顾准的才干，顾准的坚持，都成了这些坏人做坏事的障碍。所以，必须首先铲除。

顾准的倒下是一个转折点。党风从此改变。社会风气也从此改变。千百万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新生政权的发展方向也从此改变。

噩梦从此开始。

#### 四、国家治理的共识从哪里来？

国家治理，让不同主张的人们在一起讨论问题，需要有起码的共识。共识是法律的基础。没有了共识，法律再好也没用。这个道理，古今中外都一样。

美国有宪法。可是失去了共识，宪法就没用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这么打起来的。那时候的美国没有宪法吗？早就有了。可是失去了共识就没用了。一场南北战争，死了几十万人，才又有了新的共识。

什么是共识？有共同的见解主张当然好，有共同的信仰理想当然好，所有的人都亲密无间如同家人当然好。可是做不到。要协商不就是因为想法不一样吗？而且，物理学定律中的同性相斥的道理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也一样存在。越是有共同见解，越是有共同信仰，



越是一家人，有时反而互斗得更厉害。所以，依靠这些来达成共识，成为治理国家的基础，作用有限。

这些都靠不住。最后，社会共识只能依赖一件事，那就是承认公认的事实。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大家愿意在一起，相互依赖，总能有一些公认的事实吧！即使对事实的理解不一样，只要公认的事实还存在就好办。公认的事实，本身就是共识。有了共识，就有了继续协商的可能。协商有希望，就不至于马上打起来。

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找到公认的事实了。这不是一般的事实，而是能够用来治理国家的公认的事实。这是一个难题，是一个当今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不怕有难题，怕的是连问题都提不出来。问题只要提出来了，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有系统的完整的随时可以查实的基础数据作为依据。承认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就是社会共识。没有这样的数据，就不会有共识，不会有法律的地位，也不会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生活。

这些数据从哪里来？可以有很多来源。可是一定离不开会计。

离开可靠的会计账目，国家治理就不可能有完整的随时可查的公认的事实。会计就是事实，会计就是共识。会计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中国已经拥有高技术让卫星上天，可是却没有能力做好只需要加减乘除的会计账目。不仅没有能力，而且还不知道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近几十年来关于改革的决定不知有多少。可是在重要文件中，从来都对会计改革只字不提。不是因为不敢提，而是根本不懂，连想都没有想到。会计有什么用？会计和改革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想到过。不是哪些人没有想到，而是几乎没有人想到过。

会计有什么用？不就是给领导数钱，为领导遮丑的，帮着领导说好话吗？这就是当下的会计做的事。要说国家的悲剧，这就是象天一样大的悲剧。遮天蔽日，深入骨髓，到每一个细胞，让整个国家浸泡在谎言中，让社会共识无处生根。

现代会计是科学。会计提供了记录事实的有效途径，还提供了表达事实的严格方式，

更有验证事实的完整逻辑和纠正错误的快捷方法。如果说宪法是根本大法，现代会计制度就是让宪法能够落实的最基本的制度。

可是，几十年来行政权力独大的管理体制已经让会计变得面目全非。各级政府都从来不做会计要求的资产负债表。他们做出来的决算表，都是只能反映某些负责人主观意志的歌功颂德的宣传品，对于了解现实状况完全无用。现在的审计方法，从大学教科书到实际操作都愚蠢笨拙，完全没有任何科学技术含量。依靠现在的会计，贪官污吏一个都查不出来，更不要说去事前预防和阻止贪污腐败，保护财产权利。

当年顾准主持的上海市税务局，能时时刻刻都把全上海所有工商企业的财务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走到哪里，哪里都只有假账糊涂账。久闻而不知其臭。谎言多到了让人不再感觉到谎言存在的地步。

没有了顾准，中国变成了什么样？会计失去了生命力，官民失去了共识，国家治理失去了依据。

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人口减少了两千万。这是多大的损失？八年抗日战争全国的人口数量还略有上升。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损失有多大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口损失，比一场抗日战争更可怕。可是，面对现实，党政高层完全没有共同认可的事实。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主要的。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和刘这样的争论，永远都不可能产生共识。评论国家的经济状况，怎么可能用几个指头，三分七分说清楚？说了一辈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虽然是语言天才，可是对现代经济全然不知，更不会科学的表达。就算有了调查，有了发言权，掌握了真理，又怎么说出来，让别人听得懂？

党内高层的讨论已经完全没有共同认可的事实，争论的各方又从来都不把党章宪法当回事，还怎么继续协商？剩下的，就只能拼命了。“阶级斗争”就真的变成你死我活了。

到了工商文明时代，保护财产权利，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没有会计，所有这些就都是空谈。市场信用，是依靠随时可以查实的会

计记录支撑起来的。人人都承认的信用记录，就是工商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最广泛的共识。

社会的基层大众有了普遍共识，社会管理的上层政治才有可能建立起共识。政治稳定才能实现。没有这些，激烈的政治动荡就会以各种不同的原因激发，国家时时都会被推向分裂和崩溃的边缘。

找不到公认的事实，无视党纪国法，党内高层的权利斗争一再演变成生死之争。最大的受害者首先就是党政高官们自己。文革前最后一次党代会产生出来的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一共七个人。在文革中刘少奇林彪两个人被彻底打倒。邓小平一个人就被打倒了两次。直到现在，党政高官还是职业风险最高的行业。残酷斗争成为党政高官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也是中国社会始终无法除去的政治动荡隐患。

那些薄一波们，不仅铲除了顾准，还同时铲除了社会的共识，铲除掉了整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些人是真正的国家罪人，人民公敌。

## 五、真正的改革还没有开始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临。工商业者能不能合法存在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毕竟世界已经到了工商文明的年代。历史的大趋势谁也挡不住。最终，我们看到共产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在亲手打倒了旧中国留下的老一代的工商业者之后，又在改革开放后亲手扶持起了新一代的工商业者。但是，还是没有建立起政府官员和工商业者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官大一级压死人。现有的法律还只是政府管制老百姓的工具，而不是官民平等对话的权利保障。

没有了顾准的智慧，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面对制度的根本问题。人人都在说改革，却没有人说得清楚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必须实现的改革目标又是什么。整个社会，上上下下，没有共识，没有方向。唯一不缺少的是改革的愿望。

改革就这样开始了。“摸石头过河”。摸到哪里是哪里。改革的大军，浩浩荡荡。不

是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而是打向哪里，就指向哪里。邓小平领导改革，认为体制的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因此，改革就是下放权力。下级永远比上级多。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放权力，无疑会受到广泛的欢迎。可是，这还真不是改革。因为不论权力怎样下放，还是政府的权力。老百姓还是没有和政府平等的法律权利。

税制改革更是迷失了方向。那些愚蠢无能的官员就不说了。朱镕基被公认为是党内最能干的经济专家。可是他在上海改革税收制度，似乎完全不知道上海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顾准。他的税制改革是“一事一议”。收多少税，任凭基层的税收专管员和一个一个的企业分别商量决定。权力真的是下放到底了。税收的权力下放到了基层税收专管员，不可能再下放了。可是，法律的地位在哪里？法律面前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平等地位在哪里？税收是国家的生命线，岂可以这么胡来？朱镕基推行的税收改革，立刻就在上海的党政机关里刮起了全面的腐败之风。

朱镕基更有名言：股票就是可以不用偿还的贷款。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荒诞如此，也真是可以让人大长见识了。懂不懂什么叫做产权啊？真的不懂。连产权都不懂，怎么指望他们尊重和保护老百姓的财产权利？在行政权力独大的体制下，政府官员必须唯上是从，无视法律。几十年淘汰，剩下来最好的也就是象朱镕基这样的能人。可是，这些官员对于现代社会缺少常识。他们认识上的盲区有多大，一望便知了。

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是现代社会中政府服务社会，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最基本的制度。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管怎么实现？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在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件又一件的具体琐碎的实际事务中来实现。有了这样的监督，进一步的才会有把这样的监督规范化的法律，才会有把这样的监督固定化的制度。

税收，是政府的财源，同时又关系千家万户。面对政府征税，如果老百姓没有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如果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些民主自由的呼喊还有什么意义？面对无法无天的行政权力，是在乞讨施舍，还是在捍卫权利？

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宪法？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会计制度就是

要保证在法律面前能够提供可以信赖的公认的事实。税收制度，除了可以给政府提供财政收入以外，更是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监管政府的保证。

怎样监管政府，怎样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不用抓阶级斗争，也不需要中纪委。最简单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做好会计要求的资产负债表。政府有多少资产，政府的行政部门就只有多少财产权力。国家的财产不是政府的财产，政府的财产不是任何党派的财产。宪法，再加上会计制度，政府的权力时时处处都能被限制得死死的。哪个人还能胡来？对那些串通一气，以身试法的党政官员，随时都能有足够的证据，去法办他们。

这些就是顾准告诉我们的，也是世界各国监管政府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这些才是中国改革要完成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既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虽有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可是真正的改革还没有开始。

## 六、中国越来越需要顾准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当政的共产党领导的改革。虽然领导者的认识水平普遍落后，时代却在进步。三十多年的经济成长，已经让中国成为有产者的国家。最初以无产阶级革命为自身使命的共产党，终于能够在文革以后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痛改前非，把中国变成了有产者的社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功劳。现在拥有房产，股票，和正在理财的每个人都是名副其实的有产者。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有产者家庭了。在今天，如果谁还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要去剥夺大多数人的财产权利，就是在向人民宣战，就是真正的人民公敌了。

新的广泛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顾准当年就致力于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反对政府的贪污腐败。这些全都正在成为今天的社会共识。会有一天，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共识，就像当年的一致抗日一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社会共识，成为能够凝聚全民力量的共识，成为国家治理的共识。因为这样的共识反映的是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

保护财产权利，才会有公平的市场，才会有经济效益。财产得不到保护，经济效益的好处是谁的都不知道，何必要去提高效益？保护个人财产权利，明确和限制政府的财产权利，才能制止政府的腐败。保护财产权利，税制改革，将首当其冲。

保护财产权利，就必须实行会计改革。要把每一笔财产的来龙去脉都记录下来。没有记录，没有法律依据，怎么保护财产？凭着中国人的才干，这种技术应用层面上的事情，只要愿意开始，很快就能完成。

保护财产权利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这一改革，条件已经日益成熟。改革的新篇章，随时都能打开。历史的趋势，社会大众的愿望，已经空前的越来越明确的展现出来了。

宪法不应该还是皇帝的新衣，有名无实。衣服早就做好。是时候了，应该穿上了。

直到今天，顾准还是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走到顾准曾经开启的年代。但是，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诫我们：除此以外，别无出路。

顾准的悲剧，应该结束了。这个悲剧让中国的制度建设拖延了半个多世纪。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科学，以破坏制度来显示的个人权威，导致了反右文革的惨痛教训，以及改革开放至今日胜一日的人心涣散，政治动荡。

中国越来越需要顾准了。■

2016年3月2日

【文 摘】

## 非常年代人伦的变与常

——顾准和他的儿女

赵 园

1950—1960年代“阶级斗争”情境中的伦理难题，也直接延续自革命时期。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蒋光慈的短篇小说《田野的风》（原作《咆哮了的土地》），写豪绅出身的年轻的革命者，在农民攻打自己的家时内心的纠结。他在这时想到了病床上的母亲。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曾提到：“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根据地的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文革中流行的“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罪名，往往既是抽象意义上的，又有具体所指，即其人与其“剥削阶级”的老子的关系。前于此，“窝藏逃亡地主”就被指为政治错误；奉养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被由“阶级立场”的方面追究。文革初期发生在各城市的大规模“遣返”，对象为“五类分子”，包括依子女为生的地主、富农。驱赶这些人下乡，无异于断其生路，显然不是出于“改造”的目的；在当时激进的红卫兵，或竟意在由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

古代中国，父子夫妇有相互容隐之义务。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家庭之内，夫妇父子之间，关系基于骨肉，情感出于天性，不幸一人犯罪，全家相为隐匿，是乃情理之常。故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父子既宜相隐，夫妇自亦如是。”而在当代中国，父子夫妇相互容隐，直至近期，才被承认其合法性。

文革前大举批判“人性论”、“人情味”，鼓励甚至强制亲人间揭发、举报的反伦理的伦理，文革中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有夫妇间的“背对背”揭发，枕边的私房话被认为最可据信。更有压力下的面对面揭发。……韦君宜《思痛录》提到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顾颉刚1967年1月11日日记，记其看清华《井冈山》特刊刘涛《造刘少奇的反》一文（《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国家主席家庭尚且如此，遑论寻常百姓家！但“寻常百姓家”正有不如是者。

最深巨而难以复原的那一道伤，往往是至亲骨肉（夫妇、父子）留下的。“政治运动”一向是制造这类伤口的时机。因儿子告发其母亲在自己家里的“反革命言论”，致使其母

被处决（如张红兵），因男友将其私人信件举报而被关押、最终殒命（如李九莲），无不惨绝人寰。那种告发与举报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中，并无道德、道义压力。

伦理秩序的颠覆，系由文革意识形态主导。文革前夜的空气中，就充斥着对此的鼓励。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说：不要压青年人。又说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一次汇报会上，说到“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叶剑英在传达时说：“毛主席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孙子教爷爷，儿子教老子，青年教育老年”（阎长贵《从“三娘教子”到“子教三娘”》，收入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

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人伦之变”。发生在文革中的“人伦之变”，或许超出了古人的想象：不但学生打老师，而且儿子打父亲。……

文革中随处发生着子之于父的伤害——甚至是致命的伤害，无可补救无从救赎，包括了“黑五类”子女的“背叛家庭”。当时在清华附中的甘铁生，就写了子女当众揭发母亲，从自己家中抄“封资修物品”（《虔诚的日子》，收入永平等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虽未必极端却不失“典型”的例子中，就应当有顾准的子女与其父的故事。

顾准之弟陈敏之《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顾准日记》附录），写顾准父子（女），兄妹（弟），正属于古人所说的“极人伦之变”。顾准子女的态度与其父所在单位相比，尤见荒谬。1969年顾准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工宣队，曾有意办“家庭学习班”，解决顾氏的家庭关系问题。顾准对此心怀感激，说“宣传队是仁至义尽了”（同书）顾氏临终前，经济研究所为其摘除了“右派”帽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仍不肯到医院向老父作最后的告别。陈敏之的上述文章，说那些亲人对顾准“冷漠到冷酷程度”，“有悖于常情常理”，自己“实在不理解这究竟是什么”。同文对此归结为“以所谓坚定的政治立场来掩盖自私心理”。陈敏之写作该文时，顾去世未久，无意掩饰自己的沉痛与愤懑。该文于二十年后发表时有“附记”，申明所写系实录，更证明了感愤之深，难以释怀。



“革命教育”鼓励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而最足以自证“革命”的“划清界限”，即宣布“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却一再被证明并非有效的自我拯救之道。文革中“划清界限”而超出了必要，或曰超出了“革命”所要求的限度，以此为借口摆脱牵累者，所在多有。陈敏之该文说：“五哥（按即顾准）要求他的孩子原谅他。但我想说，不必要求这种原谅！”《顾准日记》附录中有顾的长女的《迟到的理解——〈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读后附记》，仍然不足以解释顾准自述及陈敏之所记述的上述行为。顾准死于1974年12月，文革的荒谬性已暴露无遗，其子女也有了人生阅历，那种极端性尤不可解。但你仍然应当想到，不能要求受难者都有梅志那样的妻子，和胡风、梅志的子女那样的子女。

后来我读到顾准子女记述其姑姑、姑父（即顾准的六妹及妹夫）的文字，尽管仍不足以解释上述反常现象，却提供了那种现象所由发生的更多线索。顾准的妹夫在顾病重期间劝阻其子女到医院探视，令我想到了“反右”后父亲刻意将我们与四叔隔离的做法，何况顾的妹夫时任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有身份的特殊性。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意识形态宣教的结果，也在于使一些人失去了感知他人（即使至亲骨肉）痛苦的能力，更以“阶级斗争”教育与出身压力，在部分青少年中培养了对于父辈的冷漠以至怨恨；直至压力解除，也仍然不都能忏悔、自我救赎。这里确有人性中幽深阴暗的角隅，赖更有力的笔才能探入。■

## 【文 摘】

# 1969—1974：顾准的思考

钱理群

这里要讨论的，是1969—1974年间顾准的思考，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是《新生日记》即《息县日记》（1969年10月——1971年9月），<sup>1</sup>和写于1973、1974年间的论文集《从

<sup>1</sup> 《新生日记》，顾准著，收《顾准文存：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sup>1</sup>这是顾准在与其弟陈敏之通信中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的汇编。是时正是文革期间，因此，集中了顾准在文革中的思考，自然特别引人注目。

## 一、《新生日记》：顾准的文革想象

### 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计

顾准把自己在息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期间所写的日记，命名为《新生日记》，在1969年6月12日写的第一篇日记里，就开宗明义：“《新生日记》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三期学习班上，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sup>2</sup>他的这一表态，引发了所谓“两个顾准”的争议，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顾准日记》中的这个顾准，‘其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因而认为，体现在《商城日记》里的顾准五、六十年代的思考‘包含了许多富有锋芒的思想内容’，在同时期，‘除了张中晓，几乎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有识力的文字’；写于文革后期（1972——1974）的《北京日记》‘虽然简略，却也勾勒了一个思想者晚期紧张思考的轨迹’；唯独《新生日记》放弃了独立思考。这样，‘两头高，中间低，顾准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马鞍形’”。<sup>3</sup>于是，又有学者强调“只有一个顾准”，《新生日记》是“他的‘思想汇报’或‘思想收获’的底本”，是“写给别人看”的假话，也不排除个别地方“利用日记给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留下一些密码，以备日后考察、反刍之用”。<sup>4</sup>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争论，并有了“顾准之谜”之说。<sup>5</sup>这里实际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新生日记》这样的文本？二是如何看待息县时期的顾准及其思想？

<sup>1</sup>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著，收《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sup>2</sup> 顾准：《1969年6月12日日记》，收《顾准日记》，第265页。

<sup>3</sup> 林贤治：《两个顾准》，收《顾准寻思录》，第254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sup>4</sup>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顾准寻思录》，第261页，262页。

<sup>5</sup> 有关争论文章还有：沙叶新：《泪眼读顾准》，陈敏之：《关于〈顾准日记〉的一点说明》，丁东：《顾准之谜我见》，曾彦修：《顾准‘无谜’，惟人自造》，林贤治：《再说两个顾准》。以上文章均见《顾准寻思录》。

### 1. “众目睽睽”下“有所写，有所不写”的非常态写作

首先要对顾准写作《新生日记》的环境作一个简单的考察。其实，他自己在到达息县后的第一篇日记里，就有明确的交代：“男宿舍在棉花仓库和小学校，后者住一个排。棉花仓库搭了架子，半数以上的人睡‘高铺’，其余的人睡床板，处中间，行李箱笼放在架子下面”。顾准因此说：“这里不可能有办公室和家庭的二重生活，一切都无法隐蔽，于是口头革命派就无所遁其行迹了”。而且“已经走上轨道的生活，是清河饲养场式的秩序，而不是赞皇、商城式的秩序。<sup>1</sup>也有一些区别，清河饲养场的成员普遍情绪低落，普遍患有劳动惩罚论的包袱，这里则是一片蓬勃景象，有活争先恐后地干”。<sup>2</sup>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隐蔽”，这意味着日记随时可能被别人看见，甚至被公开，这样也就不可能完全畅所欲言：这是随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下的写作。而且又身处在这样的人人“争先恐后地干”的革命气氛之下，自然就只能把自己最不合时宜，因而最“反动”也最有价值的思考，隐而不写，而只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公开的某些思考。这也就是再不能当“口头革命派”（这显然是顾准的自嘲），即在公开场合显示“革命”，在私下生活中暴露“真实”，而尽量使私密日记与公共表态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在之前的《商城日记》与以后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的研究笔记里相对无所顾忌的写作不同的“有所写，有所不写”，因而有些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非常态的写作。但这毕竟又是私人日记，而不同于同时期所写的交代和思想汇报：那是奉命写给别人（审查者、组织）看的。因此，我们如果将同时期写的思想检查与日记对照，就可以发现，那些违心的给自己泼污水的上纲之词，如“从我形成、坚持我的反动世界观之时起，我实质上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比逃兵的行为更可耻”<sup>3</sup>之类，都没有出现在日记里。他的息县日记写作依然坚持了尽可能的实事求是，同时也有限度、有选择地的尽可能留下一些自己真实的思考的记录，也自有其价值，这也正是

<sup>1</sup> 北京郊区清河饲养场是顾准1960——1961年下放劳动地，河北赞皇县则是1958年下放劳动地，1959年又下放到河南商县劳动改造。

<sup>2</sup> 顾准：《1959年12月26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8页。

<sup>3</sup> 顾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1969年3月14日），收《顾准自述》，第33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需要我们在其既隐蔽，又显露的复杂叙述中细心辨认的。

## 2. 在“丧失了一切”以后的顺从与坚守

我们更应该细心体察的，是在息县劳动改造期间的顾准的真实处境。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明确的交代。就在他表示要“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时，紧接着就说了一句话：“可悲的是，这种新生的心情，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我唯一述说我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人！”“采秀”是顾准的夫人汪壁。这也是一位坚强的老革命者，1952年三反运动中，顾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她都坚持和顾准一起面对与承担苦难，确实是顾准说的唯一可以述说一切的亲人。但当1965年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时，汪壁就再也坚持不住，为了此时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的前途，她只得与顾准离婚，从此不相往来。顾准从家里搬了出来，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门。即使是取回家中放着的图书、衣物，家里也事先把东西放在门外，坚不开门。顾准经常自称“丧家之犬”，并以“白虎星”（意思是害了孩子）自责。<sup>1</sup>在顾准准备下放息县劳动改造时，突然听到了汪壁早在文革初期即已自杀的噩耗，他在日记里说自己“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按，应为1968年4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顾准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哀痛：“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同一天日记里，顾准还写到自己对孩子的思念，谈到组织上曾准备在他下放前举办一个家庭学习班，让他谈谈思想，但几个孩子都拒绝参加。<sup>2</sup>而且儿女们始终坚持要与顾准划清界限，表示“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

<sup>1</sup> 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顾准寻思录》，第386页。

<sup>2</sup> 顾准：《1969年6月1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5页，266页。

般的父子感情的”。<sup>1</sup>这样，顾准就如他的六弟陈敏之所说，落入了生命的绝境之中：“他丧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名誉，地位，妻子，家庭，儿女——”。<sup>2</sup>就在这样的地狱般的处境与心境下，顾准宣布，他的《新生日记》“增加了一重意义”：他要借此赎罪。

“9日买了二十个信封和二十五张邮票，那是准备给稻头、棣妹（按，他的儿子、女儿的小名）她们写信的，现在把它搁起来，不到她们来找我，我决不用它。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我既然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顾虑就会打消”。<sup>3</sup>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要“新生”，是为了要重塑一个“改造好了”的自我形象，以“打消”孩子与自己接触的“顾虑”，恢复应有的家庭关系，并以此告慰已经长眠地下的爱妻。对于“丧失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的顾准。“名誉，地位”可以不要，但“妻子，家庭，儿女”却是无论如何也要找回的。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命运时多次遇到的问题：“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从这里入手，株连家庭、子女，再坚强的人最后也得就范。<sup>4</sup>顾准也是如此，他表示“决心转变立场，跟着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以获“新生”，就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被“革命”（具体来说，就是眼下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抛弃，至少不要加重罪名，以免进一步连累子女，取得正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子女的谅解。他当然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出妥协，但这样的妥协，又不能过了自己的底线。因此，在日记里，他又紧接着说：“我绝不作魏连殳，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sup>5</sup>魏连殳是鲁迅小说《孤独者》里的主人公，他原先也是反抗者，但最后自暴自弃，“躬行于先前反对的一切”，彻底背叛了自己。这自然是顾准所不取。面对文化大革命，顾准所要做的，既不能公开反对，甚至要作出某种顺从姿态，又不能完全背弃自己，就只能艰难地去寻找自己的基本信念与文革之间的某些契合点，哪怕是表面的相通处。也就是说，顾准需要对文化

<sup>1</sup> 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顾准寻思录》，第390页。

<sup>2</sup> 陈敏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ix页，（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

<sup>3</sup> 顾准：《1969年6月1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7页。

<sup>4</sup> 参看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sup>5</sup> 顾准：《1969年6月1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5页。

大革命作出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理解与解释，实际就是用自己的观念与方式去想象文革。

我们在讨论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顾准的思想时，曾经提到，他当时作出了一个“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自我选择与定位。<sup>1</sup>现在，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顾准实际上也还是在坚持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沉默自全，跟着走”，另一方面，又凭着“还要活二十年”的信念，作历史的观察者，思考者与记录者。这不仅是出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感，更是出于对爱妻、子女的永远的怀念与责任。因此，我们仔细读息城《新生日记》，就可以发现，在其平实的记录背后，始终涌动着一股感情的激流，大多隐藏着，只是偶尔喷涌而出：“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1969年7月11日）；<sup>2</sup>“‘人皆有父，翳我独无’，当然不免想到别去五年，不知存亡的老母和孩子们，有几夜，为之深夜不寐”（1970年4月30日）；<sup>3</sup>“节日酒醉，竟导致胃病，其间悼念亡妻，忆念家人，心情凄怆”（1970年5月15日）；<sup>4</sup>“昨晚梦见采秀，又哭醒了一次。家里一切人睽隔已久，度今年当一一得知消息。不过只要有思想准备，什么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过是死人，最亲爱的人的噩耗我经受过来了，还有什么经受不了的？”（1971年5月26日）；<sup>5</sup>“‘孤老头子’的凄凉感愈来愈深，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1971年9月2日），<sup>6</sup>等等。正是为了亡妻爱子老母，顾准必须忍辱负重，顺从又坚守，以待来年。此情可感，可哀，可叹，我们应有同情的理解。

于是，我们就注意到，顾准对所谓“新生日记”写作的煞费苦心的设计。如《顾准日记》编者所说，《新生日记》有特殊的“记法”：“前边一页或两页为流水账，逐日记录，一日一行，记满为止，十分简单；接下来是以某个事件或问题为中心的详记文字。如果将

<sup>1</sup> 顾准：《1959年7月2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186——187页。参看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51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sup>2</sup> 顾准：《1969年7月1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77页。

<sup>3</sup> 顾准：《1970年4月30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36页。

<sup>4</sup> 顾准：《1970年5月15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37页。

<sup>5</sup> 顾准：《1971年5月26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56页。

<sup>6</sup> 顾准：《1971年9月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410页。

这前后两部分视为一个单元，那么整部日记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单元组成的，单元内前后两部分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详记部分有时会记下一单元或者上一单元流水账时间里发生的事情”。<sup>1</sup>这样，顾准日记的每一单元都有两部分：“流水账”的实录，记下的是顾准的实际生活，如某天“打夯，运泥，和泥，抬土”，某天“听赵指导员谈‘五一六’问题”，某天“写思想汇报”，某天开“批判孙冶方大会”，<sup>2</sup>等等，实录而已，绝不多言具体经过，特别是自己的思想反应。而“详记文字”，倒是写每日所思所想，但绝少涉及现实的具体政治运动和人事关系，顶多记下领导报告的要点，略作公式化的表态，如“这场斗争是彻底清除‘五一六’隐患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今后我国革命建设的一日千里地发展的重要之举。我对‘五一六’的罪行深感发指，对于斗争的胜利热烈欢呼”之类。<sup>3</sup>这些部分是随时可以公之于众，或被别人查看的。“详记文字”的主要内容，是顾准从报上的消息和他的观察，引发的对国内外大事，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思考，当然也只是他认为可以公开的部分。这样，即使被注意到，革命群众也会“觉得这与他好重大问题的习惯与身份相一致”，<sup>4</sup>不至于惹出太大的麻烦。但却给自己今后进一步的思考，留下一些记录，这是顾准写日记的初衷。今天来看，也是顾准息城日记最有价值的部分。在这些思考里，顾准也同样是在煞费苦心地寻找他的追求与文革那怕仅是表面的契合点。

### 3. 《新生日记》里的文革想象

顾准在1969年3月写的《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的“交代”材料里，曾这样谈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本能的反应：“我不能想象孙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想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地下独立王国”。他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毫无思想准

<sup>1</sup> 《新生日记·编者注》，《顾准日记》，第265页。

<sup>2</sup> 见《顾准日记》，第293页。

<sup>3</sup> 顾准：《本月11日以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顾准日记》，第348页。

<sup>4</sup>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顾准寻思录》，第261页。但李慎之断言，所写的这些分析，顾准本人是“不会相信的”，却可商榷。

备”，因而“对于运动初期出现的许多现象是不理解的、抵触的”。<sup>1</sup>但同时写的另一篇《思想清算》里顾准也谈到了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谈到的文化大革命新形势对自己思想的触动。据说从1968年年底前后，“工业生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新发展，已经在许多重要城市和地区出现。它的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始终关注经济发展的顾准对此“确信不移，并为之欢欣鼓舞”，“再来看看自己对运动的混乱的看法，充其量不过是庸人思想，其实还是害怕革命”，云云。<sup>2</sup>因为是检查交代，自然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还是反映了顾准思想的某些真实：他似乎从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后还有毛泽东提出的“斗（争）、批（判）、改（革）”的任务里，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经历“抓革命”、“斗（争）、批（判）”阶段以后，会进入一个以“生产”与“改（革）”为中心的新阶段的前景，这正是顾准所追求的：他真诚地期待着，“抓革命”的结果，真的会“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文革期待与想象，构成了顾准息县《新生日记》的贯穿性内容。他刚到息县，“听李副政委报告河南、信阳、息县、东岳环境”，了解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河南省的电力设备，从50——150万KW，城市人口将增加二百万人。1975年以后，看来步调还要加速”，立即从他的“经济决定一切”的观念出发，兴奋地作出判断：“这是（抓住）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了”。<sup>3</sup>以后，他进一步得知包括息县在内的信阳地区和信属各县地方工业在文革中有了“巨大发展”，“河南总的前景更为宏伟”，“由河南建设推想全国，三线建设的中心，如西南地区，规模当更为宏伟”，他更加坚信：“建设和备战是一事的两面：十年之后，祖国面貌当焕然一新了”。<sup>4</sup>顾准反应如此强烈，还因为他在困难时期，就生活在信阳地区，亲历了大饥荒。这次重来，人们还不时谈到当年劳动力大批死亡，“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

<sup>1</sup> 顾准：《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历史交代（二七，终篇）》，《顾准自述》，第300页，306页。

<sup>2</sup> 顾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顾准自述》，第332——333页。

<sup>3</sup> 顾准：《1969年6月26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8页。

<sup>4</sup> 顾准：《1969年7月1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74页，275页。



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而“现在这里机械极普遍，耕作面积扩大，一季蚕豆可收二百斤，人畜两旺，创伤是完全恢复过来了”。<sup>1</sup>这都给顾准造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印象，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化大革命。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判断与预测——

“盖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大破以后，犹有待于大立”，中国将迎来“伟大的70年代”，“未来十年中，可望增长率大大超过50—60年代的日本”。<sup>2</sup>

“1971年，这四五的第一年，（总产值）也许将增加30%左右，这样的增长速度，将是空前的记录。开国以来的二十二年间，历经除旧布新，涤荡污浊，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从此以后，将是精神变物质的时期”。<sup>3</sup>

“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行将开始了”。<sup>4</sup>

“听说要传达一个中央文件，是关于增产节约的。自6月初起，报纸上已经出现‘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通栏口号，报道了许多经济战线上的消息。由此推断，全国中心任务，已经开始转入经济上的跃进了”。<sup>5</sup>

“（听）传达总理在一机部各学习班上的形势报告。1，焦作——枝江铁路已于7月1日通车。2，成昆铁路，于7月1日通车。3，长春第一汽车厂，现在是年产六万辆的汽车厂。二汽规模，也许倍于一汽。4，预计五年内石油、冶金、化肥。电力设备的生产，总量各为三千万吨或千瓦，而1975年的年产量则为八百万吨或千瓦。5，大规模油田除胜利油田外，还有天津油田。看来，当前中心，已经明显无疑地是经济。五七干校，理工大学，教育革命，斗批改，整党建党，只能慢慢来，但是，这些都不会也不能影响经济跃进。其实，经济建设也确是唯一的中心。唯有建设的开展，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和‘干部’。所

<sup>1</sup> 顾准：《1969年7月10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73页。

<sup>2</sup> 顾准：《1970年元旦日记》，《顾准日记》，第280页，279页。

<sup>3</sup> 顾准：《1971年4月15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75页。

<sup>4</sup> 顾准：《1970年3月16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92页。

<sup>5</sup> 顾准：《1970年6月1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08页。

以这是社会生活的‘正规化’的唯一道路”。<sup>1</sup>

“清查‘五一六’运动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恐怕就算是最后阶段了。图穷匕首现，自此以后，路线斗争将进入愈来愈深入的阶段，其中心内容是大寨、大庆、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破和伟大的立。”<sup>2</sup> “一种政治安定和全力搞建设的局面已经出现，像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sup>3</sup>

“开始要走一条新路了。以此类推，百万青年下乡的问题也将提上日程，文化、教育、学术的欣欣向荣，已经为期不远了”。<sup>4</sup>

大破大立，精神变物质，“大破”（意识形态斗争，政治革命）是手段，“大立”（经济建设）才是目的。到了七十年代，革命已到“最后阶段”，应该进入“全力搞建设，谋求经济跃进”的新阶段——这大概就是顾准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他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发展前景。

该如何评价顾准的这一文化大革命想象？我们可以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首先，必须承认，他作为依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建设成就，无论是他听到的周恩来报告里说到的铁路、汽车、石油、电力等多部门的突进，还是他亲眼看见的河南地方工业的发展，三线建设的繁荣，等等，都是事实。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正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仍有一定发展这一基本事实。经济学家告诉我们：1965——1975年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在4.7%，保持了中速增长；而且，文革期间，钢铁、电子等工业，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村工业，西部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里有一组数据：1965——1978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3.53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1965年的36.4%上升为1978年的46.8%；农田灌溉面积在耕地面积的比例由31.9%提高到45.3%，高于同期美国和印度；机耕面积年增长率为7.7%；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率为12.4%；到1978年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工业总量40.28%；西部地区铁路占全国

<sup>1</sup> 顾准：《1970年8月6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14页，315页。

<sup>2</sup> 顾准：《1971年2月2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59页。

<sup>3</sup> 顾准：《1971年3月25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64页。

<sup>4</sup> 顾准：《1971年3月29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65页。

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了1975年的34.7%。这都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sup>1</sup>顾准作为一个始终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并有很高期待的经济学家,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即使有些过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必须看到,顾准对文革经济发展的了解,主要是依靠报刊的报道和某些会议的传达,这又是片面的,特别是这些报道与传达都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有明显的着意遮蔽。这就意味着,顾准作出判断的依据,只是文革期间的中国经济实际的部分事实,而不是全部事实,这就造成了他的文革理解、期待、想象的先天不足,根本缺陷。

顾准没有看到的被遮蔽的事实,是文革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经济资源的大浪费,经济比例的大失调,经济效益的严重下降。据经济学家的计算,文革经济决策失误的经济损失,大约占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果按正常发展,增长潜力应在9%左右,现在实现的4.7%的增长率显然与可能达到的相距甚远。而同是1965——1975年间,GDP增长率,日本是8%,台湾9%,新加坡11.2%,韩国11.6%,都远高于中国大陆。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实际是延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万亿元,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966——1976年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左右,大大高于60%以上的绝对贫困型水平;更不用说文革造成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大破坏,以及全民性的政治大迫害。这就是说,文革时期即使经济有发展,也是一种以对资源、环境的大摧残,劳动者的大剥夺为代价的破坏性的发展。<sup>2</sup>顾准的“大破而大立”的文革想象,回避、甚至遮蔽了这些基本事实,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误:他的判断,并没有建立在全部事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而是仅仅依据部分事实就作出的主观臆测,因此只是一种“想象”。

其实,顾准自己对他的判断的局限也是有所认识的。在一篇日记里,就说到“实际状

<sup>1</sup> 以上数据据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出版。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第273——27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sup>2</sup> 据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史云、李丹慧:《难以为继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出版。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第274——275页。

况的变化，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sup>1</sup>难能可贵的，是顾准依然保持着一种自我质疑的清醒。他有一篇题为《经济发展速度质疑》的日记，说自己“几个晚上细细分析已知材料，结论是，短期内难望‘神武景气’”。<sup>2</sup>这是针对一个月前，他听说“三峡上马”而“浮想联翩”，断言中国将“猛烈扩大建设规模”，“‘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的乐观估计。<sup>3</sup>这一时期顾准日记充满了这样的乐观情绪，诸如“今后两三年将是花团锦簇的二三年”，<sup>4</sup>“1975 前的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sup>5</sup>等等。现在冷静下来，“仔细想来，（都）大成疑问”。“举例来说，初到河南听报告，论二三年半内河南发电设备将自 50 万——150 万 KW，极其兴奋，甚至以此推测全国。其实增长是由于丹江口水电站，是为全国建设中心，决不可以为全国都将有同样速度”，“又如三峡上马，若 10 年内能建成 1000 万 KW 的水电站，它在理想的‘神武景象’中所占地位还是相对微小的”。结论是：“我要放弃那种轻信态度，要深思，要分析了”。<sup>6</sup>

其三，人们都注意到，顾准在《新生日记》里，不仅轻信经济的发展，而且把这样的经济发展与文革中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以经济的发展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从我们前引顾准论述里，确实含有“‘立’是目的，‘破’也有必要”的逻辑。这是有的研究者认为有“两个顾准”的重要依据。<sup>7</sup>但这仍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我们应该作更复杂的分析。顾准的论断确实有很大的破绽：他只是简单地断定，“大立”是“大破”的结果，却对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作任何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证。这显然与顾准的学者身份是不相称的。因此，顾准自己也很清楚，他的论说，并不是在作学术讨论，而是现实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他要寻找的是自己的信念与文革现实之间的那怕只是表面的契合点。因此，他发现了文革中经济建设确有发展

<sup>1</sup> 顾准：《1971 年 2 月 21 日日记》，《顾准日记》，第 362 页。

<sup>2</sup> 顾准：《1971 年 6 月 20 日日记》，《顾准日记》，第 390 页。

<sup>3</sup> 顾准：《1971 年 5 月 23 日日记》，《顾准日记》，第 385 页，386 页。

<sup>4</sup> 顾准：《1971 年 4 月 22 日日记》，《顾准日记》，第 377 页。

<sup>5</sup> 顾准：《1971 年 5 月 16 日日记》，《顾准日记》，第 380 页。

<sup>6</sup> 顾准：《1971 年 6 月 20 日日记》，《顾准日记》，第 391 页。

<sup>7</sup> 参看林贤治：《两个顾准》，《顾准寻思录》，第 249——250 页。

的部分事实，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信念投射于其中，夸大其意义，并指认为文革发展的前景与方向。但他又不可能、也不愿意公开否认已经和正在进行，甚至加诸于己的文革阶级斗争和专政（如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就只能不顾逻辑地加以抽象肯定，这大概就是对文化革命既定现实的一种顺从，即所谓“跟着走”。但他又立刻预言其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而迅速转入自己向往的“全力搞建设”的新时期，这又是肯定中的否定，又有所坚守。

但在这背后，也有顾准一贯的思路。我们在讨论顾准在大饥荒时代的思考时，也谈到他虽然看到了“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阶级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发展“糊口经济”的非人道性，但又认为“中国除此，别无其他路可走”，“推动历史前进的，本来是恶不是善，毛泽东时代又何能免此？”从而陷入了所谓“人道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矛盾中。<sup>1</sup>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顾准再一次用这样的“历史必然性”来说服自己：“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发达，中国乱不得，不可以上下内外一齐来，要走，也要慢慢来。何况，一个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建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千万种困难有待于克服，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所谓‘历史必然性’）。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二三十年以后”。他还表示：“我认为我在探索的是未来历史发展的道路。当前这个历史阶段是必然要经过的，我决不应该妨碍历史的发展”。<sup>2</sup>这样，顾准就从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决定论这里找到了他认同文革现实的策略性选择的理论依据；而他始终坚持用经济的高速发展来观察、想象文革又是出于他在骨子里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守。

其四，在我们确认顾准的“大破大立”的文革理解与想象，有着他的强烈的主观意向时，还必须注意到，他的这一主观意向，特别是其隐含着的期待：中国将迅速进入“全力

<sup>1</sup> 见顾准：《1960年7月22日记》，《顾准日记》，第186页，187页。参看钱理群：《1956——1980年间顾准的思考》，收《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74——37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sup>2</sup> 顾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顾准自述》，第327页，339页。

搞建设”的新时期，以求“政治安定”，“社会秩序”的恢复，以及“文化、教育、艺术的繁荣”：这些都反映了文革发展到七十年代人心思定的民意，以及党内外普遍的结束动荡，回到发展经济的正常轨道的心理与愿望。事实上，这也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就在1969年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政治报告的起草期间，林彪、陈伯达等就提出文革应该结束，转入经济建设，被毛泽东认定为鼓吹“唯生产力论”，而遭到批判，这就埋下了以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分裂的根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顾准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文革想象与期待，在党内外都是有广泛的基础，并且是具有一定的反对文革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主流意识的批判性的。

#### 4. 顾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

但就顾准个人而言，如其所说，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探索未来历史的发展道路，因此，他强调发展经济，着眼点并不仅在其现实指向，他更着意的是由此而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这就是我们对《新生日记》的讨论的第二个重点：顾准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

于是，就注意到顾准日记里的这一段话：“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现代化，究竟遵循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途径呢，还是遵循战时经济的途径？”顾准分析说，“19世纪的美国经济遵循的是和平主义、孤立主义的道路。他们先发展农业，在人力稀缺的基础上，以最高度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吸引人力，直到194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们在政治上一直是孤立主义的”，“这样做，美国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畸形和病态”。顾准同时谈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苏联经济建设，是在和平时按战时经济模型进行的建设。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长期来成为国际军火商，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永远落后于购买力的增长。这种经济上的畸形，延续五十年之后，简直成了苏联经济之癌”。<sup>1</sup>

<sup>1</sup> 顾准：《1970年1月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84页。

顾准的关注点，显然在中国：面对美国式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在1968年所写的读书笔记里，顾准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方式”的命题。<sup>1</sup>这就是说，他要探索的是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他首先指出，“东方专制主义是现代性的对立物”，并且具体指出，“中国在1958——1970年，多少是天朝威仪的不成体统的借尸还魂”，也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复活。在他看来，尽管“这种幻影式的反映旧传统，确实不代表任何传统社会的利益，因为传统社会的利益集团已经被彻底打垮了”，但却有可能“造成新的特权集团”。结论是：“东方专制主义一天存在，福利国家的前景一日不会成为普遍目标，反过来，这就会导致现代化的阻滞”。<sup>2</sup>顾准的这一论断，是写在其读书笔记，而非日记里，自然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样的思考的危险性，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他必须隐而不说的部分，但也许是更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的。如这里把中国从1958——1970年的发展路线，都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复活，这就和他在日记里对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大相径庭。而这样的批判，在他的笔记里，还有多处。比如，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历朝兴衰”，都是官僚军事机器“不绝腐化更新的历史”，而“十月革命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是这个官僚的和军事机器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这个机器的彻底的改革过程”。<sup>3</sup>这就是说，彻底改造官僚军事机器（在另一处笔记里，他概括为“（一）专制主义；（二）中央集权；（三）绝对君权三位一体的体系”<sup>4</sup>），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这样的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在日记里，只能含蓄地表现在对苏联式的战时经济的批评上。顾准指出，苏联式的现代化是“国家主义”的现代化，其发展国家经济是“以国家的政治霸权为目标”，其走向片面化的发展军事工业，导致“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

<sup>1</sup> 顾准：《现代国家建成以后，发展的不同方向》，《顾准笔记》，第31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sup>2</sup> 顾准：《现代国家建成以后，发展的不同方向》，《顾准笔记》，第313页。

<sup>3</sup> 顾准：《国家机器的完备化，争夺统治权就是争夺国家机器》，《顾准笔记》，第624页，625页。

<sup>4</sup> 顾准：《历史讨论》，《顾准笔记》，第4页。

水平落后”的畸形发展，绝不是偶然的。<sup>1</sup>“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必然“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sup>2</sup>

顾准强调，“东方专制主义一天存在，福利国家的前景一日不会成为普遍目标”，这说明他所追求的，是“福利国家”，也即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以建立和发展民主体制为其前提的。<sup>3</sup>这正是早在60年代他即已期待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挥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顷刻之间获得定论，自由争论，长期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时候，没有民主主义怎么办”。<sup>4</sup>在顾准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设计里，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例如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不能不走苏联式的“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的道路，<sup>5</sup>但到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就必须“真正的改弦易辙”，“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sup>6</sup>在顾准看来，七十年代的中国，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改弦易辙”的时机，这是实现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关键一步。<sup>7</sup>

顾准的现代化设计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sup>8</sup>这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民主化的要求，一起构成了顾准现代化思想的两翼。

作为经济学家，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系列的具体设想，但都没有充分展

<sup>1</sup> 顾准：《1970年1月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85页，284页。

<sup>2</sup> 顾准：《1971年8月2日日记：“十年来的苏联经济”》，《顾准日记》，第402页，403页。

<sup>3</sup> 顾准在1974年所写《民主与“终极目的”》里，特意谈到“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顾准文集》第273—274页。

<sup>4</sup> 顾准：《1960年3月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1，262页。

<sup>5</sup> 顾准：《1956年3月29日日记》，《顾准日记》，第67页。

<sup>6</sup> 顾准：《1959年7月2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187页，186页。

<sup>7</sup> 有研究者指出，应该区别“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与社会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基础结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顾准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主张民主政制，另一方面又坚持消灭私有制。见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上）》，载《领导者》总61期，第141页。在世界观上，顾准一直坚持民主个人主义，但在文革期间，也有“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之说。见《顾准：〈读〈天演论〉〉》，《顾准日记》，第390页。在1970年日记里，还谈到经济发展中应培养“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顾准日记》，第322页。

<sup>8</sup> 顾准：《1970年4月2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31页。



开。我们只能就其日记与笔记里的片言只语，作一个初步的梳理。

1, 中国经济发展要走一条工业和农业全面现代化的道路。顾准谈到, “很长一段时期(包括今天),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古代的足食足兵, 加上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一套自给上的国防工业体系”, 连他自己“所敢设想的极限, 是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但他认为, 这“够不上‘现代化’的标准”, “是一种半现代式的设想”, “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 也就是永远达不到真正现代化的目的”。顾准认为, “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 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 仰给外国, 然后以十分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 即饥饿出口——进口——自给的过程”。<sup>1</sup>在另一篇日记里, 顾准也这样谈到了工、农业发展的关系: “唯有一个富裕的农村, 才能提供最大可能的积累”, “问题的最后重点当然不在农业, 而对于富裕的农村保证充足的粮食, 无限的就业扩大, 把中国建成一个最大的工业国, 竭泽而渔, 苏联可为借鉴”。<sup>2</sup>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 “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困境。既不能对农民、农村“竭泽而渔”, 又不能满足于“一半人口在农业, 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的老路, 如何走出一条工业、农业全面现代化的道路, 确实是发展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顾准在七十年代初就及时抓住, 提出, 这眼光是超前的。

2, 顾准在前引他的日记里, 提到中国经济发展要经历“饥饿出口——进口——自给”的过程。且不论他的这一论断是否正确, 他对中外贸易问题的关注, 表现了他在考察中国经济问题时的世界市场眼光, 在那个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锁国时代, 无疑也是超前的。正是这样的世界眼光, 使得顾准在1970年报上刊载了“美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以后, 立刻联想起之前公布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 “印度支那三国会议和朝鲜关系得到改善”的

<sup>1</sup> 顾准:《1970年4月2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30页。

<sup>2</sup> 顾准:《1970年元旦日记》,《顾准日记》,第282页。

外交事件，迅速作出了“我们外交方针”将发生“大转变”的判断，并预言：“自此以后，形势还将急转直下，联合国问题七月份就要解决，在此前后，中美建交，越战结束，这些大事变都将一一到来”。最重要的是，顾准由此而提出：“我国经济是不是会有什么利用进口技术以加速发展的可能？”<sup>1</sup>这又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考察中国经济问题时，顾准始终认为，实行经济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愿意援外，而不愿有太多的技术进口”，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他终于在外交政策的变化里，发现了改变这一局面的机遇，由此而作出了一个重要预测：“也许今后注意力将逐渐转向对外开放和内部发展”的新时期。<sup>2</sup>这样，顾准在1971年中国大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与时代新主题，这同样是超前的。

3，顾准同时提出了“内部发展”的问题，这也很值得注意。顾准在一篇日记里，就谈到为了经济的健全发展，必须“用制度把群众的创造巩固下来”，他特意谈到“经济核算将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然而企业财务制度，企业内部的情报系统和统筹，以至财政制度、银行制度（如基建生产的划分、基建拨款等等问题），50年代搬进来的一套40年代苏联制度就全部不能适应，而要有大刀阔斧的改革”。<sup>3</sup>这样，顾准在提出“对外开放”的同时，又提出了“内部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任务。而在他的改革设计里，健全和发展“经济核算运动”又居于核心位置。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其实早在1957年所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里，顾准即已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并科学地论证了，正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存在商品生产”；也因为实行经济核算，“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价值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影响及于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价值规律在客观上是制约着经济计划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必须

<sup>1</sup> 顾准：《1970年6月23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94页，395页。

<sup>2</sup> 顾准：《1971年6月20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91页。

<sup>3</sup> 顾准：《1971年2月2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59页。

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经济核算是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之一。<sup>1</sup>研究者指出，顾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解释了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他虽然“并没有使用市场经济之类的概念，但市场机制已经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理论思维和政策思想之中”，因此，“完全可以说，在国内经济学界，顾准是市场经济第一人”。<sup>2</sup>在70年代文革期间，顾准在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再次提到要发动一场“经济核算运动”，要对“50年代搬进来的一套40年代苏联制度”，也就是他在50年代即已指出的否认价值与价值规律的“唯意志论”的计划指令，到70年代造成了经济的僵硬与混乱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这一思想，在他的笔记里，就有更明确的表述：“甲，我们绝不能指望社会主义回到糊口经济中去。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是十分迅速‘成长’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所以，生产必须同时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乙，既是价值增殖过程，就必定1，采取工资劳动，社会主义是工资社会主义；2，全社会除一部分不可以采取经济核算的事业——文化、教育、科学、公共行政、社会安全等等和一部分不能采取成本利润计算的物质生活过程，例如道路、桥梁、公共卫生工程等等——而外，绝大部分物质生产与运输及物质分配一律要实行经济核算；3，于是不论中央与地方分权方法如何，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sup>3</sup>这里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几乎就预见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

其实，顾准70年代所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计，都是具有预见性的：除了民主制度的建设之外，他所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由计划经济改革为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方案，都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得到了实现。应该指出的是，顾准70年代的这些思考与设计，也并非孤立的现象。前文提到的知识青年张木生在1968年写的《中国农民问题的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几乎与顾准同时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

<sup>1</sup>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收《顾准文集》，第28页，33页，44页，45页。

<sup>2</sup>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上）》，《领导者》总61期，第128页，129页，133页，134页。

<sup>3</sup> 顾准：《物化，异化：“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是根本错误的；资本只能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顾准笔记》，第578页，579页。

为中心”的治国新路线。<sup>1</sup>这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或者是时代发展趋势吧。

## 5. 更深层面的“强国梦”

对顾准来说，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设计，还有更深层次的动因，就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强国梦”。早在1956年顾准就在他的日记里期待“中国的建设速度在今后二十年内如能保持每年20%（工业），5——7%（农业）的速度，二十年后我们便将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了”。<sup>2</sup>我曾说过：“这样的‘强国梦’，对顾准（或许还有他那一代人）是带有根本性的，是深刻影响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的”。<sup>3</sup>因此，尽管在二十年后70年代的中国，远没有达到他期待的目标，但顾准抓住中国经济得到某些发展的事实，就又继续做强国梦，而且做得更大，并作了这样的判断：“世界（将就）进入‘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新时代。也应该是我国建设进入新的飞跃的新时代”，“在这种形势下，倘我国经济在四五年内进入四五千万吨钢铁，十年内达到和日本相等的程度，经济实力和革命中心的地位就能大体一致了”。<sup>4</sup>这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中国世界中心”梦，几乎贯穿了这一时期顾准的全部日记——

“可以设想另一种前途。亚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愈来愈强盛。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日本，也不敢设想与我抗衡。于是日本甘愿——不，是形势逼迫她不得不成为以中国为盟主的亚洲人的亚洲。而这个亚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20世纪的末期，都代替西欧北美成为世界的中心”，“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唯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方面”。<sup>5</sup>

“今后若干年间，我国将独占世界棉纺织品的出口——也许还包括棉纺织设备的出

<sup>1</sup> 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下）第11章第3节：《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第140——143页。

<sup>2</sup> 顾准：《1956年4月29日日记》，《顾准日记》，第85——86页。

<sup>3</sup> 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31页。

<sup>4</sup> 顾准：《1971年5月24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05页。

<sup>5</sup> 顾准：《1971年4月11日日记：“蜡山芳郎论70年代的国际斗争与日本问题”》，《顾准日记》，第301页。

口”，“这显然是中国雄飞世界的开始”。<sup>1</sup>

“中国肩负世界命运的责任，必须有与此相应的经济实力。日本经济的发展，1964年以前已经是严重的事实。文化革命的几年中，日本经济又向前走了几步，到去年，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事实，已经明显到无可忽视的程度。何况佐藤——中曾根的复活军国主义和保持日美安全体系不变的之政策，不能不是我国的严重隐患。解决之道，是要在十年至十五年内超过日本，而且在工业实力上倍于日本。所以经济问题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四五时期，完成五年计划将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再干二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就是雄飞世界的中国了”。<sup>2</sup>

“我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东南亚许多大岛包括澳新在内的精耕农业（一部分是小麦，大部分是水稻）的发展。中国工业对于矿产原料的需求，也将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这些地区的开发，将由本地人、世界各地移民来进行，也不可避免将由一些中国移民来进行。坦赞铁路，是这一长期趋势的序幕”，“后代历史家将要发现，中国（经济上）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要雄飞世界”，“这样看待中国的前途，重心其实放在经济发展上，要指望中国成为工业居主位的经济大国，确实要有一些狂想的气概”。<sup>3</sup>

“（在越南战争中）打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平衡的相互关系，然后以三大国（按，指美、苏、中）中的一员活跃于国际舞台，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中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sup>4</sup>

我们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2015年）回顾1970、1971年间，顾准怀着“狂想的气概”作出的这些规划与预测，不能不有很多的感慨。

<sup>1</sup> 顾准：《1971年4月1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04页。

<sup>2</sup> 顾准：《1971年6月8日日记：“国际形势的新动向”》，《顾准日记》，第341页，342页。

<sup>3</sup> 顾准：《1971年4月2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29页。

<sup>4</sup> 顾准：《1971年3月29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65页。

首先我们惊异于顾准当年的预言竟是如此的准确：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苏联，而直逼美国；今天的亚洲确实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中心”地带；就连顾准想象的细节，如中国经济发展对拉丁美洲、黑非洲、东南亚、澳新地区的影响，中国移民走向非洲，都成为了现实。顾准的预言是建筑在他对自己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信与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无尽的创造活力的信任基础上的。历史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70年代初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改革、开放”的设想，在十年之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成了国家发展的既定国策；再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他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得到了基本实现，尽管比所期待的十年、十五、二十年要晚二、三十年。像顾准这样的高瞻远瞩，具有预见性的理论家，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真正是独此一人。

同时，我们也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顾准这些天才预测，仅仅存在于他的私人日记里，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恐怕至今也还不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界所注意，就更谈不上对历史实际运行产生影响，发挥作用。顾准只能充当历史的观察者、思考者、预测者，而不能成为历史的参与者：这是顾准及其同类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这正是中国的现行体制所致：这个体制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认定顾准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而严加防范，而且没有提供公民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的制度保证，只能思考（因为禁止不了），而无将独立思考的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权利，特别是这些思考违背了长官意志或不能被认识与认可的时候。这其实就是顾准所期待的民主体制的缺失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顾准的悲剧的背后，是有制度的原因的。

无可回避的，还有顾准的思考本身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有二。

首先，顾准的强国梦的核心，是要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本身即有“中华中心主义的中华帝国”传统的明显痕迹，这其实就是顾准后来也有所反思的极端民族主义：“强烈的民族情绪，一向具备着发展到征服世界上一切民族这么一个至高点的”，<sup>1</sup>这是应

<sup>1</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4页。

该引起高度警惕的。特别是当下中国如顾准期待的那样，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就给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警觉。即使顾准这样独立知识分子，理论天才，也难以避免落入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这个事实本身，也很值得深思。

其次，顾准的预测，在具体事实层面上，确实得到了实现，但他所期待的民主体制的建立，以及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落了空：中国依然是一个他所批判的官僚、军事集权的国家。顾准确实天才地预见了中国经济的“雄飞”，但这样的高速发展，却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环境的大污染，以及严重的两极分化，底层人民利益受损为代价的：依然是一个破坏性的大发展。这都是顾准所没有预见的。原因就在于顾准落入了“发展就是一切”的“经济决定论”的陷阱。顾准强调经济发展的意义，无疑是正确的；但过度夸大经济的作用，就出了问题。我们从前引顾准60年代即已形成，在70年代更加强化的观点，可以看出，顾准始终坚信，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和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都必然走向“民主主义”，“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sup>1</sup>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顾准这一“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设想，不过是他的一个主观幻想。仅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中国仍不能真正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而这也正是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用经济的发展来掩盖中国实际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严重问题，依然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危险。也就是说，顾准当年的失误（我们也不能苛求顾准毫无失误），在今天，也依然有警醒后人的意义。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现场。1971年9月2日，顾准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息县“新生日记”：“幻想消失了”。这里主要是指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于乐观的估计。他

<sup>1</sup> 顾准：《1960年3月2日日记》，《1959年7月19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1——262页，第186页。

意识到，自己不能“缺乏耐心”，而必须“立志要等”，“要等，就要坚毅”，<sup>1</sup>同时还要“追求真理”，<sup>2</sup>“放弃那种轻信态度，要深思，要分析”。<sup>3</sup>由此而开始了他回到北京以后1972——1974年间的在更根本层面上的新的思考与探索。

## 二、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 对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根本追问与反思

我们已经说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集中了1973年至1974年间顾准和他的六弟陈敏之通信中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依然是：这是怎样一个文本？

陈敏之这样介绍他的写作环境：“1972年至1974年，对顾准来说，是文革十年中难得的空隙。整个国家的天空虽然仍在一片阴霾的笼罩之下，但是他的小环境相对地还比较平静”。1972初冬，陈敏之去看顾准时，他夏天刚从息县劳动改造回来，“住的公共宿舍，当然称不上什么书斋，但是一个不算太大的房间内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一架图书，静悄悄，各人读书写作，互不相扰，气氛也还宁静”。1973——1974年相互通信，也相对自由，“因为是兄弟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因此彼此可以直抒胸臆，无所遮拦，无所避忌”。<sup>4</sup>在这个意义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写作，比之息县《新生日记》，显然更接近私密写作，较少顾忌，也相对真实地反映了顾准这一时期的主要思考。所谓“相对”，自然是说，也还是有所隐蔽。后来陈敏之在谈及笔记的命运时说：“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sup>5</sup>这大概是因为信的表达比较直露，笔记相对含蓄吧。

陈敏之还谈到，顾准在和他通信里曾经说“准备用10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先是）西

<sup>1</sup> 顾准：《1971年9月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410页。

<sup>2</sup> 顾准：《1971年7月17日日记》，《顾准日记》，第400页。

<sup>3</sup> 顾准：《1971年6月20日日记》，《顾准日记》，第391页。

<sup>4</sup> 陈敏之：《〈顾准文集〉序》，《顾准文集》，第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sup>5</sup> 陈敏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Viii页。



方的，（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再作综合比较，为的是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规划未来的方向”。<sup>1</sup>这一点，在1972年——1974年顾准的《北京日记》里，可以得到证实。《北京日记》不同于息县《新生日记》，不记每日所见所思，只记简单的生活起居（如“六弟来”、“休息”等），主要记每日所读的书，列出的书名，确实都是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著作。<sup>2</sup>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顾准在这一时期思考与写作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sup>3</sup>这里显示的，是顾准思考的三个面向：人类——现实——未来，构成了顾准文革年代后期思考的主要特点。这标志着，他已走出了《新生日记》时期的阴影，不仅不再存在任何幻想，更有了一个超越：既和现实拉开距离，进入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地，思考更根本、更长远，事关中国与人类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又依然立足于现实，保持了新鲜、有力的批判锋芒；同时又深入自己灵魂的深处，进行人性的拷问：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这在当时（文革时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保持“现实”与“未来”，“中国”与“人类”之间的张力，顾准还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这消息是他在论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独特之处时透露出来的：“它是一个高贵的18世纪欧洲人读希腊史以后，也许还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把希腊的历史业绩‘当代化’为当时的政论”。并且作了这样的阐释：“卢梭的值得学习之处，就不一定是他的智慧和灵感，更值得学习的是‘勇气’和‘技巧’了。其所以要学习他的勇气，是因为在‘王政’空气下倡导‘民主’，是不可以徘徊瞻顾的。其所以要有技巧，是因为仅仅介绍翻译古代史，古代著作，那不过是学院圈子里的事情——杯子里起不了大风波。大风波唯有在大海里才起得了。引起风波的是通俗的、煽动的、针对当代人的思想

<sup>1</sup> 陈敏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X页。

<sup>2</sup> 见顾准：《北京日记》（1972——1974），收《顾准日记》，第411——439页。

<sup>3</sup>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68页。

感情、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政论”。<sup>1</sup>这里说得很清楚：顾准可以说是完全自觉地要“学习”卢梭的“勇气”和“技巧”，写一本《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把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业绩‘当代化’为当时的政论”的著作，因为他和卢梭有着类似的历史要求：要“在‘王政’空气下倡导‘民主’”，既期待“引起风波”，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又要有自我的保护与思想的超越，最好的“技巧”就是在“历史”与“当代”之间找到契合点，将中西文明史当代化。前者显现在水面上，而后者深藏在水底下，这是需要认真辨认的。

由此决定了本文的讨论方式。顾准的这部著作，有着丰厚的中外文明史的内涵，王元化先生在其序言里，概括为六个方面：“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王元化先生说，这些题目都是他“最感兴趣的”。<sup>2</sup>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更注重顾准这本著作的“政论”性，努力揭示其东西文明史论述背后的“当代”指向与意义。

因此，我完全同意研究者的这一论断：“顾准探索的时间跨度很长，论战范围很广，但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娜拉走后怎样’，也就是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问题”。<sup>3</sup>这就是说，

当顾准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文革问题时，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与发展起点所内蕴的问题，去追问历史的与理论、思维上的根本性失误。这就意味着，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要“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要“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sup>4</sup>对顾准这样的从生命起点时就参加革命的“来自马克思主义营垒的思想者，在中国几十年历史变革实践中诞生的思想者”，<sup>5</sup>要面对这样

<sup>1</sup>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6——27页。

<sup>2</sup>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i页。

<sup>3</sup>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上）》，《领导者》总61期，第145页。

<sup>4</sup>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v页。

<sup>5</sup> 钱竞：《争论使人想起顾准》，《顾准寻思录》，第80页。

的原初信念、既定看法中的迷误，可以说是另一场“革命”；顾准自己说，“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sup>1</sup>

在我看来，顾准的反省、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1. 对绝对专制政治的追根

文革时期最突出的政治问题，无疑是“个人崇拜”。而且这样的无所不在的绝对专制政治，是每个中国人无时无刻都需要面对的，自然是顾准首先要思考的：他要追溯其源其根。首先想到的是——

### （1）中国“绝对君权”的历史传统

顾准着眼于东西方文明的大视野，他将欧洲君主制与中国传统中的君主制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

其一，在欧洲，和君主的世俗权威相并行的，还有一个宗教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sup>2</sup>——我们很容易就感受到顾准字里行间隐含的现实指向：文革发展到极端的中国政体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威与思想、精神权威，道德权威三者的高度合一，就使政治权威同时成为国家、人民利益与真理、道德的唯一代表。文革期间盛行的“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全民共诛之”的绝对专制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绝对代表权基础上的。顾准因此针锋相对地指出：“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

<sup>1</sup>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5页。

<sup>2</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2页。

大林说过一句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sup>1</sup>这里的批判锋芒是很明显的。

其二，顾准指出，在欧洲传统里，王侯与其治下的骑士的“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土’和‘效忠’两种”，“还成为关系两方面都必须信守的契约，并不仅仅是受封者对授封者因其授土而负有义务”，“这就是说，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索取，骑士可以反抗”，“倘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抗拒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就不是封建制度了”。<sup>2</sup>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括：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什么封建社会，而是“绝对君权的专制主义”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完全两样，是不可能“产生出来资本主义”的。<sup>3</sup>而我们从“倘若——”的叙述语气里，依然可以感觉到顾准所指，不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也内含了文革时期的“上面（当时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下面（包括顾准在内的知识分子进而普通老百姓）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抗拒的”的专制主义。

其三，顾准因此特意谈到，“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是和权联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身份和关系，观念上是认为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中国，这类问题由简单的16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议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sup>4</sup>而按黑格尔的说法，所谓“普遍奴隶制”就是“王和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

<sup>1</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4页。

<sup>2</sup> 顾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61页。

<sup>3</sup> 顾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76页。

<sup>4</sup> 顾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74页，75页。

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sup>1</sup>。——顾准写到这里，大概会想起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干部在文革中的命运吧。

顾准因此发出感慨：在中国，是不会有真正的“骑士精神”的：骑士的“忠诚”，其实就是“受誓约束缚”，“但也仅限于誓约，而不是无条件的忠诚，不是所谓‘君命不可违’，‘君，天也，天不可逃也’”。骑士更有“荣誉感”：“西欧人道主义的‘个人尊严’观念，其实是骑士精神的延续。骑士不许人家侮辱。如果受辱，他可以要求决斗。长上对违命属下的惩罚，也不得有损个人尊严”。顾准又想起了汉文帝抓捕周勃的故事，“结果，找不到罪证，只好释放他，恢复他的爵位。”<sup>2</sup>这其实就是文革中的“平反”、“落实政策”。顾准最感痛心的，是个人任人宰割的命运和人格的受辱，这在根本没有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中国绝对专制政治传统里，是必然如此的，今日的顾准们正是重复了汉王朝的大臣的命运，

这样，顾准就从中西文明传统的比较里，发现了中国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绝对专制政治”传统，这正是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的本质，追求的就是历代帝王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一人自由，臣民无一人有自由”的“普遍奴隶制”，这本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而这样的古今一贯的绝对君权政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顾准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史官文化”，这是范文澜首先提出的，顾准的贡献在于强调“所谓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sup>3</sup>它的要害在“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sup>4</sup>

顾准也正是立足于对史官文化的批判立场，对中国传统中的儒、道、法诸家进行了锋

<sup>1</sup> 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45页。

<sup>2</sup> 顾准：《〈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63页，64页。

<sup>3</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页，

<sup>4</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页。

利的剖析。

在他看来，孔子“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不可侵犯的”。顾准指出，孔子“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个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驷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很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因此顾准坚信：“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开始于孔子本人”。顾准还将孔子与孟子区别开来，认为“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sup>1</sup>

顾准对韩非的批判，就更为严峻。他认为，“君主中心主义与利害关系二者相结合，而且以如此丑恶的方式相结合，必须归罪于韩非”，他倡导“君主乘势以术御下，无限纵欲”，“他的法、术、势是大一统所必要的”。而他的方法论，更“是片面主义的一元主义，是忠于自己所树立的教条的教条主义”。这都是“在法家的全部武器库中是积极作用起得最少、消极作用起得最多的东西”。<sup>2</sup>

我们知道，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一直奉行“崇法而贬儒”的思想文化路线，后来还有“评法批儒”的运动。顾准固然也认为法家在“教民耕战、富国强兵”上有“积极的贡献”，<sup>3</sup>但对被视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韩非持如此严厉的批判态度，显然是在唱反调。而他对孔子的批判，也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重点在孔子实际倡导“内法外孔”这一点上。这不仅表现了顾准思考的独立性，其背后的价值观——对君主绝对专制，以及一切为之鼓吹、辩解的理论的深恶痛绝，也许是更应该注意的。

<sup>1</sup> 顾准：《论孔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1页，142页。

<sup>2</sup> 顾准：《评韩非》，《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9页，147页。

<sup>3</sup> 顾准：《评韩非》，《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7页。

顾准对老庄哲学的批判也同样激烈。在他看来，“《老子》全书，决不是一个在野的圣人探索自然的奥秘（规律），或人怎样达于至善的哲学，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统治哲学”，“老子是为侯王常保富贵出谋划策，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绝无半句遁世的话”，他“站在当时的‘侯王’的立场上，警告他们必须知足、谨慎、无为，才足以保持既得利益，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怎样保持既得利益的愚民政策的办法”。<sup>1</sup>——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显然是一个当代概念，顾准所要反对的，正是一切维护历史与现实的既得利益者的“富贵”权势的理论与学说，顾准最关注的是老庄哲学的现实影响。这正是他反复强调的：“我们还在照老子的无为政治和愚民政策办事”，“有意识地因循守旧，反对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也有无为政治的味道，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政策的一部分”。

结论是：我们的“历史传统的负担太重”。<sup>2</sup>在顾准看来，正是背负着历史传统的重担，才使得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地容忍、接受与屈从历史与现实的绝对政治权威的统治。这大概是顾准反思文革，追溯历史所得出的结论之一。这也就是顾准对他所说的史官文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持特别严峻的态度的原因所在。

对此，顾准也有过反省。就在《论孔子》一文里，顾准特意谈到，自己“不免有点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他还说，“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文明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sup>3</sup>这也是今天有些学者批评顾准用西方文明作标准，“以‘史官文化’涵盖传统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的原因，据说“王元化也持这一看法”。<sup>4</sup>不过顾准当年就有过一个自我辩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sup>5</sup>

<sup>1</sup> 顾准：《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36页，132页。

<sup>2</sup> 顾准：《老子的“道”及其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30页。

<sup>3</sup> 顾准：《论孔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5页，146页。

<sup>4</sup> 参看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领导者》总62期，第149页。

<sup>5</sup> 顾准：《论孔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46页。

## （2）马克思主义的唯理主义的独断论、一元主义的理论、实践陷阱

顾准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中国式绝对专制政治的追问，并没有止步于对中国皇权政治的历史传统的批判，他更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进行溯源式的追问，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其实，这样的追问，早在五、六十年代即已开始。在1959年3月8日的日记里，他就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脱离神界”的警示，其内含的“绝对真理”论就“不外是神界或神界的化身”。他明确指出：“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原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血缘关系的东西”，并表示“这是不可以忍受的东西”。<sup>1</sup>但这样的思考，只能在日记里留下片言只语。此后，顾准又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大跃进、大饥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因素在中国革命和发展中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并上升为理论思考。于是，就有了更为系统的论述，构成了他文革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准文革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质疑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理主义特征。我们先讨论第二个方面的思考。

顾准指出，唯理主义本来是黑格尔的命题，因此，“《神圣家族》时代的马克思，几乎是反对唯理主义的，而就本性而言，马克思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则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果然，《神圣家族》才写完，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从否定黑格尔又回到了黑格尔”。顾准具体指出，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唯理主义，包含了“黑格尔的‘真理是整体’，黑格尔的一元主义，以及‘能思维的人’，‘其思维，最终说来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人’，是客观世界的主人，亦即‘神性寓于人性’之中的黑格尔加以哲学化了的新教精神。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

<sup>1</sup> 顾准：《1959年3月8日日记》，《顾准日记》，第120页。参看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42——344页。



是不可少的”。<sup>1</sup>仔细琢磨这一黑格尔的唯理主义，就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两个理论与实践陷阱。

首先是一种独断论。强调真理的整体性，一元性，这就必然导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的绝对真理论。<sup>2</sup>这正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曾经批评过的“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这就赋予了人的思维以一种“至上的和无限的”性质，也即“神性”。顾准因此说，“唯理主义者本质上不得不是神学家，因为正如狄慈根所说，理性的领域与神的领域之间，不可避免地是联系着的”。<sup>3</sup>这就是研究者所说的，这里“包含着理性的膨胀。一方面认识超出了它所能认识的局限，导致理性的狂妄；另一方面，容易导致自大狂式的独断论，即以为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而且自己发现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而且是终极性的绝对真理。<sup>4</sup>而这样的理性的狂妄与独断，在实践上就会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自身神学化。顾准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的即‘破’的武器，是有巨大价值的。一旦它成为统治的思想，它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的死敌”。<sup>5</sup>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种探索真理的科学，而且是很强的批判性的学说；一旦将自身变成真理的掌握者，以致终结者，成了真理的化身，并以此“统治”人们的思想，那就走到了反面，不但失去了科学的本性，还会妨碍人们对真理的继续探索，成了“科学的死敌”。

其次，如顾准所说，“全能的上帝，是哲学上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的形象化，这也就是唯理主义的实质”。<sup>6</sup>但这样的“全能的上帝”，在现实生活里是必然要被肉身化的；成为神学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会创造出它的现实化身即教主的。也就是说，唯理主义赋予思维至上性与无限性的“人”，是要落实为具体的人的。于是，马克思主义神学化的最终

<sup>1</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1页，162——163页。

<sup>2</sup>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6页。

<sup>3</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7页，161页。

<sup>4</sup> 刘智峰：《探求历史的真实》，转引自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领导者》总62期，第149页。

<sup>5</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0页。

<sup>6</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8页。

结果，就是对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顶峰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造神运动。顾准说黑格尔“这位所谓内心蕴藏‘革命愤火’的哲学家，其实不过是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而已”。<sup>1</sup>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同样充满“革命愤火”，却起劲地鼓动造神运动的“理论家”（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也不过是毛泽东王朝的“有学问的奴仆”，顾准对他们是嗤之以鼻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理主义特质，不仅会导致独断论即自身的神化，而且也必然发展为一元主义的专制，即垄断真理，并用真理的名义，排斥与打击一切异己者。在顾准看来，这正是许多（也包括他自己）的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悲剧所在。他说：“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但他们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千辛万苦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唯一化，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视为异端，而加以讨伐，美其名为“斗争”：不同于正常的思想学术争论，而是要将其消灭的党同伐异，一旦与权力结合起来，就成了“思想专政”。这样，“革命的理想主义”就最终“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悲剧。顾准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因此，他对这样的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一元化主义的反省，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而一旦觉醒，他就坚定地表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sup>2</sup>

顾准也因此对试图用被独断化、一元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与改造一切的企图都保持高度的警惕。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唯理主义者总以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可以说顾准对“有一种钦定的眼镜，

<sup>1</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4页。

<sup>2</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6——177页。

限定一切人全得戴上，否则——”的专政思维、逻辑与体制，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恐惧的：<sup>1</sup>这是他天天必须面对的文革现实和体验。

顾准对在文革前即开始提倡，到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用马克思哲学体系来改造自然科学的做法，更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他毫不隐晦、毫不客气地发出警告：“我认为，假如真正的科学家，读了《反杜林论》而抛弃他原来习以为常的方法，而来彻底改造思想，成为辩证主义者，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完蛋了”。道理很简单：“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多彩，你能添一粒沙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一以贯之，那简直是梦呓”，“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方法论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不是‘承袭’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创造”，硬要用某一种“哲学来指导一切”，那就会扼杀科学的创造。这是悲剧，也是喜剧。顾准举例说，“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过关于‘坂田模式’的尝试，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的新的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曾指定专人组织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sup>2</sup>这里所说的建立“坂田模式”的尝试，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1964年8月《和科学家的谈话》与《接见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的讲话》里提出来的，他借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提出的一个物理模式大做文章，提出要建立一个“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的新的哲学体系”。这大概是反映了毛泽东的哲学雄心与野心的，是造神运动的一个新的表演。因此，顾准这里的批判是直指毛泽东本人的。他最后说：“托尔斯泰说得对，人的自视是分数中的分母，分母值愈大，分数值愈小。居里夫人说‘沙子’，我实在不由得敬仰她！”<sup>3</sup>这自然是意味深长的。

顾准还对也是在文革中盛行一时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破旧立新”，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运动，提出质疑。他说：“哲学家们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

<sup>1</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2页。

<sup>2</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0页，172页，171页。173页。

<sup>3</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3页。

题在于改变世界。真的，‘破’旧是为了立‘新’，马克思主义是有新可立的。他要立的，是相对于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的社会化了的人类，亦即‘集体英雄主义，民主集中主义——’的人类”。顾准对此作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考察。他首先注意到这依然是马克思曾经批判，后又接受了黑格尔哲学：“把概念看得高于具体事物，亦即把共性看得可以优于、超越于、可以淹没个性”，这“是不对的”。他更指出，“社会化的人类我们也见过，经历过了。你是承认今天‘社会化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的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sup>1</sup>——如此一针见血的批判是包含了深厚的历史内容与痛苦的历史记忆的。我读了以后，就立刻回想起文革时期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请罪”等等，这是几代人的改造历史，这是在“恐怖主义”威压下的强制改造，当时就有“思想改造要刺刀见血”的要求，并不回避其中的血腥气。而改造的结果，确实出现了许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先进典型，即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但所显示的，不过是顾准这里所说的“虚伪的共性”。这样的专制主义的改造，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是埋下了今天的全民精神危机的根子的，只不过当年是“精神至上”，如今跳到了“物质至上”的另一个极端，但“扭曲人的本性”的实质却始终未变，一以贯之。

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顾准始终坚持的基本信念与立场），面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专制因素造成的严重后果，他的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坚定地正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在克服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这都是人类文明“一点一滴的积累”的过程，这样的积累“是没有止境的”。而“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都会妨碍这样的本应无止境的积累与发展。<sup>2</sup>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思想，

<sup>1</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6页，167页。

<sup>2</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多少经验主义》，第111页，110页。

要保持发展生机，就必须走向哲学与政治的多元主义。这就是顾准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以后，所作出的选择——

### （3） 走向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的多元主义

早在1959年，顾准就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却看错了历史的进程”，“历史违反了马克思的预言”。<sup>1</sup>在文革的思考里，顾准再一次面对这一问题：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走向灭亡，“还有生命力”。顾准思考与探索的重点，却在其中的“原因”何在？顾准的回答更发人深省：原因就在“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顾准举例分析说：“假如1929年（经济）恐慌时期，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资本主义不这样做，那里有各式各样的批判——越南战争、吸毒问题、青少年犯罪、种族歧视、水门丑闻、自由放任是恐慌的根源、3000美元或2000元年收入以下的人是贫困线以下的人等等。这样，就呈现出一个奇观，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地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了，却老是混下去了，有的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也起了一种揭发批判、促进改良的作用”。顾准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不会通过暴力革命消灭掉，这里因为它在批评、改良。但是它会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sup>2</sup>——仔细琢磨这段话，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是隐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命运”的思考的。这正是顾准最感痛心的：在价值理念上，顾准无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研究者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sup>3</sup>这是符合实际的。但顾准更有勇气正视实际社会主义运动，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独断论与一元主义的影响，一直拒绝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甚至把一切批判、否定都看作是颠覆社会主义的危险。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自身的改良、改革之路，以及向

<sup>1</sup> 顾准：《1959年2月23日日记》，《顾准日记》，第102页，101页。

<sup>2</sup> 顾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5页，106页。

<sup>3</sup>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领导者》总62期，第135页。

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吸取合理因素，以补充、发展自己之路。这就必然导致自身的僵化与腐败，埋下了自我颠覆、崩溃的根子。而在顾准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出路，应该是走出独断论与一元主义的束缚，恢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本就具有的批判性：不仅要批判资本主义，更要批判社会主义自身。这样，就可能出现一个前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在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改革”，向对方吸取有益的资源，相互补充，自我纠正，最后达到更高层面的“渗透”。早在1959年顾准就曾经表示，他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方渗透论”的信奉者，<sup>1</sup>现在，他就更加自觉地要推动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与改革运动，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股潮流、两种力量的“互相渗透”。<sup>2</sup>这是最终达到世界文明综合发展的关键。在顾准的理想里，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既是对现存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的否定，即前文所说的“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但又包含了各自的合理之处，因而可以视为是一种发展，是“否定中的肯定”。

为推动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顾准认为，首先要在理论上倡导“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而这样的多元主义，又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sup>3</sup>

那么，什么是顾准理解与倡导的“科学精神”呢？他有一个十分精当的概括，共有五个要点：“（1）承认人对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

<sup>1</sup> 顾准：《1959年7月31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12页。参看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39——341页。

<sup>2</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终极目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3——374页。

<sup>3</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10页。

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sup>1</sup>——我一字不漏地抄下顾准关于科学精神的论述，因为在我看来，这里的每一点，都包含了顾准对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理论总结。其一，许多人，包括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之路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参加了革命，这本来是一个思想的进步。但却将此作为一个“止境”，停止了对真理的继续探索，就发生了前文所说的将马克思主义神性化，以及自身思想僵化的悲剧。其二，悲剧更在于从此半自动、半被动地放弃了自己独立探索、思考的权利，不再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知识的宝库中加一点东西”，而把创造新知识的权利交给了“天才领袖”，自己则充当接受与宣传、阐释领袖新思想的“有学问的奴仆”。其三，这样，也就人为地在革命队伍内部作出了“尊卑贵贱之分”：唯一领袖是“真理的发现者、发展者”，紧跟领袖的积极分子（左派）是“真理的捍卫者”，大多数中间派则是“真理的顺从者”，少数坚持独立思考的人被宣布为“背叛真理的右派”而成为革命的对象。其四，在思想奴化以后，也就必然导致思想的绝对化，即将“正确与错误的区分”绝对化，不再承认，人类思想发展的某一阶段的认识，那怕被认为错误的认识，都可能包含某些正确的成分，其合理性就可能成为思想发展更新阶段的起点。而这样的绝对化思维，就会导致对和自认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因而永远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拒绝，甚至还提出了“和一切传统思想决裂”，“彻底批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口号，从而使探索真理之路，越走越窄。其五，由此决定了政治权威、精神权威与道德权威三位一体的绝对统治，“大家都必须无条件的承认”，不允许有任何“违反或超过”。如有违反，更不用说超越，就要横加“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施以“无产阶级专政”。如顾准所说，这样的以专政权力作后盾的“权威主义”，是直接阻碍了思想和历史的“进步”的。这正是说明，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一元主义，而一元主义就是一种专

<sup>1</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8——109页。

制主义。从另一角度说，要真正根除政治专制主义，就必须在观念与思维方式上清除哲学一元主义，真正回到科学精神、多元主义上来：这也是顾准总结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

## 2. 对民主问题的反思

顾准写有《科学与民主》的笔记，提出“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sup>1</sup>在顾准思想里，科学与民主是密不可分的。在顾准文革笔记里，“民主”是出现最为频繁的概念之一。我在研究“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时，就注意到“‘经济’与‘民主’是1956年的顾准思考的两个中心点”。<sup>2</sup>文革时期依然如此，这是顾准思想的两个主题词。

而且，“民主”更是文革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空前的‘群众性大民主’，一方面是人权和法制的彻底丧失；一方面所谓‘北京公社’、‘上海公社’的招牌，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赤裸裸的专制。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顾准不得不思索，当初的民主理想为何发展到自己的反面，毛病在什么地方？”<sup>3</sup>作为理论家的顾准，更要对文革中提出的有关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例如所谓“直接民主”、“民主集中制”等等，作出回应与分析。

顾准对文革中“人权和法制的彻底丧失”的“赤裸裸的专制”的批判，在前文中已经多有分析。在顾准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sup>4</sup>但在文革期间，连这样的“法”，毛泽东也不要了。他要“砸烂公（安）、检（察院）、法（庭）”，即现行的一切国家法律机构，要“无法无天”，实行“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的直接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直接民主”，也就是这里提到的

<sup>1</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8页。

<sup>2</sup> 钱理群：《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第337页。

<sup>3</sup> 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顾准寻思录》，第62页。

<sup>4</sup>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74页。



文革中盛行的“群众性大民主”。因此。顾准在文革中，顾准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就首先集中在——

### (1) 对“直接民主”的质疑

顾准写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顾准首先指出，直接民主本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雅典民主其实就是“直接民主的原型”。而《法兰西内战》里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就是要“复古——复公民大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它主张的“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直接民主，彻底打烂“官僚机构”，“取消常备军”，在文革期间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前述“北京公社”、“上海公社”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顾准指出，“今天人们对于‘彻底打烂旧政权的机构’的意思，作了彻底的歪曲”。<sup>1</sup>他也因此对这样的直接民主提出了质疑。

他首先问，这样做，“行吗？”“要恢复雅典时代的简直没有行政机构的作法，你想想，行吗？”“取消常备军。这事实上是恢复雅典和共和罗马的、民兵的、公民的军队，行吗？”他因此批评说：“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对《法兰西内战》究竟说了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并不去深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更是无从谈起了”。<sup>2</sup>

他更要追问：“实行的结果”如何？于是就注意到列宁的直接民主实验造成的后果：“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职业军队；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以工厂苏维埃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归于党，再变而为一切实权力属于斯大林”。<sup>3</sup>——这里已经说到了中国的官僚机构比苏联更为庞大，其实顾准的真意是要借苏联谈中国：文革的“一切权力归群众”的大民主实验，最后不也落实为“一切权力归于党，一切权力属于毛泽东”吗？

<sup>1</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54页，360页。

<sup>2</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0页。

<sup>3</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1页。

顾准还要作理论上的澄清，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行政机关，亦即官僚机关是取消不了的”。道理很简单：“行政事务本身是复杂的专门行业”，“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这也就必然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这又涉及一个政治精英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的问题。顾准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点不错”，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不能作民粹主义的理解，不可否认“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这一面，也就是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和精英共同创造的，他们是互为补充，而绝非截然对立，彼此不相容的。顾准因此对文革中风行一时的“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嘲讽：“天天在反对精神贵族的中国，那些贵族们下乡两年回来以后，他们的贵族气味打掉一点没有？而现在高叫的是落实政策，其实是照顾贵族。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又提不到议程上来了”。<sup>1</sup>这里的观察与批判是相当独到与深刻的：在所谓“反精英”的背后，是“照顾贵族”，即对既得利益者的权势的维护；而所谓“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是口头上的宣传，实际是“提不到议程上来”的。这正是文革中的民粹主义的鼓噪的伪善之处，是口惠而实不至。这正是顾准深恶痛绝的。

还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空谈。顾准指出，即使是被一些人吹捧上天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当兵，战死，其中极小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小吏等等。结果，广大农民群众的人处境改善了一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并没有轮上他们。这不仅是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也莫不如此”。没有说出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更是如此”。结论是：“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从马克思起，实际主张与实现的只是“对人民的领导——说得最彻底的是列宁：‘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少数人搞出来向群众中灌输的’”。因此在顾准看来，与其“奢求人民当家作主”，不如“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

<sup>1</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5页，367页，365页。

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成为皇权”，“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sup>1</sup>“直接民主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sup>2</sup>“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主权术的伪善藉口”。<sup>3</sup>这就把问题的实质点破了，尤其是“仪仗壮丽”的群众政治与“神秘莫测”的深宫政治的结合，更是说透了毛泽东的文革式的“直接民主”的特点与实质。

顾准最后将文革时期的“群众大民主”概括为“‘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并且指出：这“当然不可能，它一定会演化为独裁”；而“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sup>4</sup>

## （2）对“民主集中制”的质疑

顾准说：“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最具蛊惑性的民主理论，就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列宁所发明，毛泽东有大发展的理论，在中国革命与发展中，起到了极大指导作用。在文革期间是与“直接民主论”相互配合使用的：在文革初期发动群众时，就强调“直接民主”即“群众大民主”；在文革中后期需要强化党的领导时，就强调“民主集中制”。但在顾准看来，两者都有可疑之处。

先要追问的，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对此，毛泽东（顾准笔记里以“有人”代之）有两个说明。其一是“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顾准一眼看出，这样的“说服”的民主，是有一个前提的，即认定“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因此，在“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时，就有一个如何使人“服”的问题。这就有了“强迫（服从）与说服之分”。如果说，采取“说服

<sup>1</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7页，368页。

<sup>2</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9页。

<sup>3</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2页。

<sup>4</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9页。

的方法”就是“民主”，那就有了两个问题：“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的？”，如果说而不服，别人不接受你的“正确见解”，甚至提出不同的反对意见，能够容忍和允许吗？

毛泽东的另一说法，“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公感觉的方法”。这看起来当然很好，但顾准也发现，这也是有条件的，即“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不管如何“讨论”，哪怕是“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最终还是要“服从”，不服从的权利是没有的，更不用说成为党内反对派。

结论是：“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最多不过是“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sup>1</sup>

再来看“集中”。毛泽东对他的意见“永远正确”，也是有一个解释的：“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顾准反驳道：“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的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sup>2</sup>这依然是“我领导，你服从”的思路，只不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让你不那么勉强地服从而已。骨子里是一元主义的权威主义、专制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充其量是半开门而已”。

顾准说：“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sup>3</sup>

那么，顾准追求什么样的民主呢？

### （3）对“代议政治民主”的理解：至少要允许反对派存在

<sup>1</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7页，109页。

<sup>2</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7页，109—110页。

<sup>3</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8页。

顾准的思考的问题意识就是前文所说的，“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为皇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顾准看来，“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准表示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当代行得通的民主，只能是保留行政机关（亦即保留官僚机构）实行代议政治，还要让反对派存在”。

关键是要允许“反对派存在”。在顾准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他说：“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按，这本是毛泽东的话）。这时候怎么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

这是两个思路，两种选择：一种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或美名为“人民民主”），前提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反对派都归入反革命派，加以消灭”。因此国家政治与政策是不允许“公开讨论”的，“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另一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这是顾准1959年提出的概念<sup>1</sup>）或“代议制民主”的“社会主义两党制”<sup>2</sup>，“不许一个政治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坐庄’”。<sup>3</sup>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依宪（法）执政”的思想，因此研究者评价说：“在中国大陆思想史上，顾准是第一个全面回归半个世纪前（1920年以前）的宪

<sup>1</sup> 顾准：《1960年3月2日日记》，《顾准日记》，第261页。

<sup>2</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0页。

<sup>3</sup> 以上讨论引文见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8页，361页，363页。369页，360页，358页，365页。

政民主理念的人”。<sup>1</sup>

顾准指出，“1957年前后，我们这个一党制的国家也响亮过‘保护少数派’的口号”，其实这也是文革初期颇为流行的口号，但都是“口号”而已，在一党制下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顾准说：“‘保护少数派’是两党制的口号”，而“少数派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它的政纲今天不被通过，今天不合时宜，若干年后，倒会变成时代的潮流”。<sup>2</sup>

顾准始终是清醒的，他并没有因此将代议制民主理想化。他承认，“议会政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议会里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扰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发言，可以有议员互相抛掷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无关重要的议案，也按正式议事程序，可以有演说者对空座侃侃而谈的奇观。选举时会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请客，地方大亨（杜月笙这一流人物）包办选举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贿赂。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是等于没有‘主义’。而且，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但顾准仍然坚持认为，和“防止行政权发展成皇权”，导致极端专制主义代议制民主这一基本功能和作用相比，“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在他看来，“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性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sup>3</sup>

顾准更要强调的是，“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sup>4</sup>因此，顾准也不会把他自己的民主理念

<sup>1</sup> 陈子明：《六十年来大陆宪政民主运动》，收陈子明主编：《中国宪政运动史》（下），第859页。香港世界华文出版机构，2014年出版。

<sup>2</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4页。

<sup>3</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5页。

<sup>4</sup> 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第362——363页，368页，363——364页。

绝对化，凝固化，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理想的民主之路，他不承认有“绝对完善”的民主模式，而着眼于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但有一些实践证明了的基本观念，他是要坚持的。例如一定要允许反对派（反对党）的存在，以及相应的民主权利，如自由讨论，发表反对意见，自由结社，争取维护自己的自由意志与利益的权利，等等。在他看来，这样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1

### 3. 对“革命理想主义”的追问

这是顾准必须面对的最为痛苦的现实：“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sup>2</sup>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顾准对文革现实的一个深刻的把握与认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以烈士的名义”，打着“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旗号，以“消灭一切压迫，一切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共产主义理想”相号召的，自称最彻底、最纯洁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因此，在运动初期，文革对向往革命的青少年，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是有吸引力的，至少是有迷惑力的，连顾准也不免心存幻想；但随着文革的深入，就逐渐暴露了其“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本质。顾准的这一认识，其实是反映了到文革中后期许多人的觉醒的。

顾准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思考的彻底性：他要追问文革理想主义与文革专制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要把这样的追问，追溯到中国革命起点上的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纠缠关系。

于是，他开始了更为根本的质疑，首先是——

#### （1）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的质疑

<sup>1</sup> 顾准：《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09页。

<sup>2</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7页。

顾准指出，目的论本是西方宗教哲学的概念：“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但“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具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sup>1</sup>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具有浓厚的唯理主义特征，因此，其承接宗教的目的论，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要赋予更多的革命理想的色彩。马克思主义也和基督教一样，“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宣布“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sup>2</sup>——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共产主义观，革命理想中的目的论，在革命者心目中，都是天经地义的，许多人恐怕正是为了这样的理想目标而投身于革命的。而中国的革命者，对此更是十分熟悉。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是以“在地上建立天国”为旗帜的，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当人们都竞相为保卫这样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目标而战（这正是当时党和毛泽东号召的“保卫三面红旗”的实质），顾准却大胆地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有三。

首先，顾准承认，“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sup>3</sup>那样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至善”社会，对于身处重重矛盾，重重危机，真善美被假丑恶压抑了的，异化的社会里的年轻人、知识分子，自然有巨大的吸引力，自然成为他们批判、反抗黑暗现实的武器，投身革命的动力。顾准对此都有同情的理解，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但作为一个成熟的理论家，却要提醒不成熟的革命者注意：“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sup>4</sup>这里所提醒注意的，正是“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至善”理想的乌托邦性，它只存在于彼岸世界，是一个“水涨船高”，可以不断接近，却“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它是天上的北斗星，它的作用在于，也仅在于照

<sup>1</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9页。

<sup>2</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4页，370页。

<sup>3</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4页。

<sup>4</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5页。



亮此岸世界的黑暗，使我们永远不满足于现实，成为永远批判现实黑暗的内在动力。但如果越过这条线，将彼岸世界此岸化，将乌托邦理想现实化，“在地上建立天堂”，那就会造成灾难，制造混乱。因为“地上不能建立天国，（没有矛盾、异化的）天国是永远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如果真的“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相互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得单调可厌”。<sup>1</sup>乌托邦理想既然不能现实化，只能以最为荒诞、丑恶的方式，制造出新的黑暗，即所谓“地上建起的天堂，只能是新的地狱”，号称“通往天堂的桥梁”的人民公社，后来出现的许多问题，包括顾准亲历的大饥荒，就是一个沉重的血的教训。

顾准进一步质疑这种历史目的论的理论预设，即黑格尔的“真善一致”论：“人认识真理，就是认识至善，真与善是一元论的，至善的即至真的，至真的也必是至善的”；以及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改造：“真善一致，即理论与实践一致”，“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认定“历史按逻辑的必然性而发展”，而所谓“逻辑”又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所谓“在地上实现天国”即依据于此。<sup>2</sup>这就是研究者所说的，这是典型的黑格尔命题，认定“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绝对理念’在概念上的演化逻辑是一致的，或者说自然和社会的进程乃精神的外化。它的实质是以逻辑的合理性取代历史的真实性”。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培根式”的改造，<sup>3</sup>不过是将其“客观唯心主义变成了客观唯物主义”，<sup>4</sup>即是用“革命实践”将主观逻辑中的先验的“目的”（乌托邦理想）变成现实，“善的即是真的”，“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事实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指导下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验：这一特征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中，是表现得特

<sup>1</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0页，375页。

<sup>2</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3页，164页，165页，166页。

<sup>3</sup> 顾准：“事实上‘摄取了黑格尔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确实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见《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62页。

<sup>4</sup> 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领导者》总62期，第148—149页。

别明显的。而正如顾准所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现理想的“革命实践”，必然是专制的暴力，但又有很多的伪饰。顾准特意提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还有“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顾准说：“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sup>1</sup>这都构成了顾准思考的现实背景：最美好的革命理想主义就是这样变成了最坏的专制主义，而且善良的人们（包括顾准这样的当年满腔热血的革命者）面对这样的专制主义的恶果，却完全无力制止。顾准说：“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sup>2</sup>

## （2）对“革命的宗教狂热”的反省

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既然与宗教有着血缘关系，就很难摆脱宗教式的狂热，以及宗教战争。顾准指出，基督教认定，“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因此，宗教狂热必然要导致宗教战争，而“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中国没有宗教，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宗教狂热，也没有宗教战争。梁启超当年还因中国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而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悲观。顾准则回应说：“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这样的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

<sup>1</sup> 顾准：《民主和“终极目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5页，372页。

<sup>2</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70页。

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sup>1</sup>顾准没有往下说的，是这样的狂热的宗教战争，在文革中，正在以空前的规模上演：红卫兵不正是以“解放全人类”的反帝反修“战士”自居，扬言要在全世界发动新的“圣战”吗？他们同时在国内发动新的“信教运动”，以“解放”据说被资产阶级“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毛泽东）”的“愚民（可怜的人）”。这样的以革命名义发动的文革式的宗教战争，其破坏力也是空前的。

宗教的传教，还有一个“赎罪”功能。顾准说，基督教“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它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sup>2</sup>顾准说这番话，自然也是有所指的：文革就是一个“救赎”运动。它宣布，每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是有“原罪”的，因此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所谓“改造”，就是通过对“主（毛泽东）”的“信仰”来自我“救赎”。而这样的救赎运动，在文革中还建立起了一套准宗教的仪式，如“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请罪”之类。

顾准对以文革为极端形态的中国革命的准宗教性的发现与揭示，也标示着认识的一种深化。同时，更是一个自我审视。无论是“革命狂热”，还是“精神救赎”，都是他的生命的曾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革命与文革宗教性的批判，也必然是一个自我批判，对此，顾准也是高度自觉的。

### （3）对“斯巴达传统”的审视

顾准在考察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时，注意到“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民主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

<sup>1</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8页。

<sup>2</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8页。

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在后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者中的影响，也颇引人注目。顾准文章里，就提到了马克思的学生李卜克内西组织的“斯巴达团”（按，应为“斯巴达同盟”）。顾准本人大概也深受影响，他因此坦然承认自己“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她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sup>1</sup>

应该说，这一审视是相当严峻的。顾准当然并不否认斯巴达精神里的“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积极意义，它几乎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一切革命者必须具有的信念与品格，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顾准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这样的革命精神却隐含着两个陷阱，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带来灾难。

其一，如果把集体主义推向极端，完全否认了个人欲望，利益，意志，情感与权利，那就会形成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在严酷的革命纪律和奉行一元主义的寡头政体下，实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或许能收一时之效。但不可能持久，最后只能变成“形式主义和伪善”的表演，堂皇的“毫不利己”的“外观”下，包藏的是“绝对利己主义”的“腐败内容”，这是在中国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屡见不鲜的事实。只是人们不愿、不敢承认，现在被顾准一语道破，就成了骇世之言。

其二，如果把平等主义变成绝对平均主义，就必然像顾准这里所讲，“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高的向低的看齐”的结果，必然是降低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甚至导致历史的倒退。这早已是沉重的历史教训，但也只有在顾准这里，才得以揭露和反省，

<sup>1</sup>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9页，31页，29——30页。

也就显得惊心动魄了。

这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顾准指出，马克思对希腊文明的两大潮流都有尖锐的批判：他尽管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但“不满意雅典存在奴隶这件事，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金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同时，“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他既“要克服异化（按，这是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顾准说，“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懂得这一点”。<sup>1</sup>而顾准却是懂得的。可见顾准对马克思主义，是既有尖锐的批评，更有坚定的坚守的：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4）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这几乎成了顾准的名言：“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sup>2</sup>

人们在将这一时期顾准通信中的笔记汇集成书时，就是根据顾准的这段话将书名定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sup>3</sup>以此来概括顾准思想的发展过程，也是大体准确的。

但如果把顾准思想的这一转变与发展，理解为顾准对理想主义的放弃，就可能将顾准思想简单化，导致新的遮蔽。

请看顾准自己的说明：“当我越来越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人要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

<sup>1</sup>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0页，31页。

<sup>2</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7页。

<sup>3</sup> 关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名的确定过程，参看张曙光：《顾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下）》，《领导者》总61期，第144—145页。

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但最终“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危机也就过去了”，“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历史经验也昭示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sup>1</sup>

这里的论述大体包含了几层意思，都颇耐琢磨。首先肯定，由想象的“诗意”转向“散文说理”、“冷静分析”，即由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是必要与必然的，原因即在于理想主义有它“不科学”的一面，如前文所分析，它蕴含着思想的陷阱，存在着导致专制主义的危险。其二，但顾准又强调，他所要批判、摆脱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本身。其三，顾准根据自己的经验，又提醒注意：在批判被庸俗化的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时候，确实存在“无信仰而无所凭依”的危险。这是需要警惕的。最后就归结到：“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也就是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相互补充与结合。所以顾准说他“走向经验主义”，同时又避免了“失却信仰的危机”。

我理解，这里的关键是要分清“彼岸”与“此岸”的界限，认清理想主义的彼岸性与经验主义的此岸性。

理想、信念、信仰，至善的社会，都只存在于“天国”的彼岸，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sup>2</sup>但又是“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目标。<sup>3</sup>既“永远达不到”，又可以“逐步接近”，这就是能够构成人的信仰的真正的理想的特征。它是高悬于此岸现实世界之上的“水涨船高而永远达不到”的彼岸目标，因此可以成为照亮此岸黑暗的不断批判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动力；它又是可以在“无穷尽的试验和反复中逐步接近”的，因此，也就能够成为为理想而不断奋斗的精神力量。

<sup>1</sup>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5，154，155页。

<sup>2</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5页。

<sup>3</sup> 顾准：《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31页。

这样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力量，是人对世界的改造（革命和建设）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理想、信仰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在这里，不妨谈谈作为顾准的同代人，我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我在年轻时候是坚定地以“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信仰的，我理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压迫、奴役和剥削的社会：这大概就是顾准及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信仰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而且我们是坚信这样的理想是可以在中国现实中得到完全实现的。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粉碎了我们的“在地上建立天堂”的乌托邦幻想。我们逐渐认识到，在此岸现实世界，压迫与奴役是会不断再生产的，所谓“完全消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愿望。但我们却又没有因此认同这样的不断产生的压迫与奴役的“合理性”，而陷入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是仍然坚守“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的现象”的理想，只是将其放在彼岸位置，成为一种反抗现实生活里的来自一切方面的、不断产生的各种形态的压迫和奴役的精神资源，从而坚守了一种彻底批判的立场，并绝不放弃反抗压迫与奴役的实际行动。在我看来，这样的对理想主义既质疑，又坚守的态度，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应有的选择，顾准正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但在现实的此岸世界的变革里，顾准又坚定地选择了经验主义。那么，什么是顾准理解的经验主义呢？他大概是强调了以下几点——

“按经验归纳，人所掌握的真理，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近于完全是，相对的”，“经验的概括，总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sup>1</sup>——这就彻底地与唯理主义的绝断论、一元主义划清了界限。这就是顾准所说的，“真正的，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即一方面承认人的头脑（心智）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等一切方法来了解事物的过程，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哪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顾准将其称为“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强调与“经

<sup>1</sup> 顾准：《一切判断都来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54页，155页。

验的主观化”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区别，<sup>1</sup>这也就与一切先验主义划清了界限。

经验主义认定：“没有什么终极目标，有的，只是进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这里，应该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拒绝达到“终极目标”以后的“一切静止”状态，追求“不断斗争向前”；<sup>2</sup>二是拒绝为达到终极目标的彻底革命，而主张“不断进步”，即持续的，逐步积累的，渐进的变革。

经验主义是反对“神秘的唯理主义”的，认定“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这也就拒绝了“将尘世的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的绝对专制政治。<sup>3</sup>也就是说，经验主义不但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同时也是通向政治民主的。这样，顾准也就在这里，将他所追求的哲学多元主义与政治多元主义统一起来了。

我们今天重新面对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命题，依然感到它的生命力：他对理想主义的质疑与坚守，他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的经验主义的立场、方法与态度，都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我们因此想起26年前（1989年）王元化先生第一次读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的感慨：顾准的思考，“整整超前了十年”。<sup>4</sup>在2015年的今天看来，他在1969——1974年间提出的许多命题，依然如此新鲜，那就超前了三、四十年。

更令人感慨与深思的，是他这些超前的思考背后的知识分子精神。王元化先生将其概括为“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精神”，“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以及“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的精神。<sup>5</sup>而今天，在种种高压、收编与诱惑下，知识分子精神几乎丧失殆尽。顾准所建立的精神标杆，就像一面明镜照出我们灵魂的卑琐与平庸，使每个人都无以面对。而我尤为感慨的是，尽管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远比顾准时代开放，我们完全有机会接触更广大的世界文明资源，这都是顾准当年所不能想象的；

<sup>1</sup> 顾准：《辩证法与神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174——175页，179页，178页，177页。

<sup>2</sup>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第370页，375页。

<sup>3</sup>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24页，23——24页，16页。

<sup>4</sup>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v页。

<sup>5</sup>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第iv页，v页。



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远比顾准狭窄：既没有顾准那样的占领民族与人类文明高地的雄心与学养，也没有顾准那样的“人类——现实——未来”的大视野：或逃避，或粘滞于现实，而不能既投入又超越；或以“个人小小的悲欢”为整个世界，既缺乏人类、宇宙、未来、精神的根本关怀，也缺少整体性、根本性思考与把握世界，预测未来，想象、创造新世界的欲望与能力，我们的精神世界已经被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消费主义、实利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压缩得越变越“小”。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就使得顾准这样的真正知识分子，不仅在文革时代，而且在今天以及可望的未来，都是“仅此一人”的孤独的存在：我不知道这是顾准的光荣，还是中国知识界和当代中国文化的耻辱和悲哀？

记得在顾准刚被发现时，许多知识分子都说：“我们有顾准”！<sup>1</sup>这既是自豪，又充满了辛酸。在顾准已经被许多人遗忘的今天，重读顾准，特别是把他置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大背景下，就更感到他的难得与可贵。因为在这一段历史里，充满了屈辱和精神扭曲，像顾准这样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和体制提出质疑，是很少的；而能够提出“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并进行批判性思考与理论提升的，更是绝无仅有。

我们幸亏有顾准！■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sup>1</sup> 参看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顾准寻思录》，第60页。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